

\*文中所述之日、月，除特别指明者外，皆已由作者转换为公元年份。作者在注释中引用史料时，常常将重要日期分别以皇帝年号纪年和公元年同时标出--译者注

## 第一章 岳大将军

岳钟琪将军仕途顺利，官运亨通，而这恰恰成为此节骨眼上的危险因素。岳钟琪乃将门之后，生于1686年。二十五岁时获授松潘镇中军游击，三十二岁升授四川永宁协副将，而三十五岁时更被提拔为四川提督，赐孔雀翎。岳将军的卓著军功包括平定西藏叛乱、征讨并剿平郭罗克三部，在中国西北边陲讨伐青海西宁罗卜藏丹津并大获全胜，以及平定云南东川冕山、凉山等处苗人反乱。如今，时当1728年，年届四十二岁的岳钟琪官居川陕总督，加兵部尚书衔，太子少保，并授宁远大将军印，统领节制西北诸大军。不仅如此，心存感激之意的雍正皇帝更不次拔擢他的儿子以示恩宠。岳将军的长子岳浚目前正出任沿海战略重地山东省的署理巡抚。岳氏的家产也是富甲一方：从边远的甘肃到四川而至南方诸省，岳家广置地产；岳家名下其他产业也不下数十项，包括主要都市中的广厦重院和散布于各地的肥沃良田。无数的家仆奴婢为忙于国家大事的将军管理私产，侍候家人。

尽管官居要职手握重兵，而且家产富裕，岳将军深知其所有的一切完全仰赖于雍正皇帝的恩赐。

一旦皇上疑心他的忠诚，其功名富贵立时可能成为转眼烟云。当今中国的皇帝乃是满族人，当年南侵入关，取代朱明皇朝，建立了大清帝国，并统治神州中原至于今日。从马背上夺得天下的清廷统治者对维护其江山十分小心，处处留意，以确保其祖业特权不为外人所觊觎。

给岳将军带来微妙险境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姓氏了。作为岳姓后裔，岳钟琪将军与六百年以前的另一位岳将军的关系既给他带来盛名，却也惹上了无穷的麻烦。那岳将军便是南宋时统帅汉人抵御金人入侵，并力图收复失土的岳飞。岳飞英勇抗敌，但后来为奸臣陷害，以莫须有的罪名身陷囹圄，乃至被杀。从此之后，北地尽失，中原不再为汉人所拥有。日转星移，岳飞成为人们心目中忠臣良将的典范，其“还我旧山河”的怒吼成为汉族人民面对异族征服的共同抗拒心声。岳飞的故乡建立了祠庙供人凭吊瞻仰，小说戏曲渲染其一片丹心，说书人演义其智慧过人、神勇善战。所有这些都在民间广泛流传，人们对其忠勇的事迹及受诬陷的遭遇无不心有戚焉，更有痛哭流涕，情不自禁者。要知道，推翻明朝，夺得江山的满人正是当年岳飞奋拒的女真族人的后裔。因而理所当然地，对岳飞的怀念便成为当今憎恶满族统治者的一种呼声了。无论岳钟琪将军对当今的大清皇帝如何忠诚不贰，老百姓们普遍相信，他身上毕竟流着祖先的血液，终有一日

他要报仇雪耻，恢复汉家昔日的荣光。岳将军深知这种民间流传和信仰，更明白他的主子、当今的皇上雍正帝对此种坊间传言也早有所闻。

岳钟琪独处书房，开始仔细览阅这封刚刚由陌生的信使呈递给他的“逆书”。信中的许多说辞他是听闻久矣，可谓老生常谈了，譬如称其为“宋武穆侯岳飞之后裔”，敦促他“乘时反叛，为朱明复仇”。投书者并写道：岳将军背弃先祖之志，效忠满族清廷统治者，真有损名节：“以为君且守死尽节于其前，又有俯首屈节尽忠于匪类。..人臣之择主，如女子之从夫。为臣者事非其主而失身，如女子已嫁人而再醮。

不过这位自称夏靛的投书者倒也加了几句有些新意的阐释。他写道：“慨自先明君丧其德，臣失其守，中原陆沉，夷狄乘虚窃据神器，乾坤反覆”，而“中国阴阳合会之地，只应生人之一类，不应复有禽兽并育。”其间的缘由甚为明显：“天生一物，理一分殊，中土得正而阴阳合德者为人，四塞倾险而邪僻者为夷狄，夷狄之下为禽兽。”

信函的其他段落又提及中土在清朝异族统治之下的各种灾象：“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作书者称，这就是为何孔庙日前遭遇火灾，过往的五六年间洪涝旱灾不绝于中国各地，以致农作颗粒无收，寒暑节季失调，竟致“山崩川竭”、“五星聚”、“黄河清”、“阴尽阳生”。

夏靚在信的一些地方表达了他对于社会秩序失衡的思考：“土田尽为富户所收，富者日富，贫者日贫。”作者毫不含糊地把自己同富户豪族分别：“当今日，遭逢今世，无志于当世之利禄以自污。”或者，此人不过是农夫草民而已？夏靚自述道：“与一、二同志闭门空山，养鸡种瓜。如此说来，他虽为耕田人，却留心经典，缅怀古往，颇具沧桑兴亡的意识。在此人看来，宋亡之后的五百年间，学术、政治无一可足以称道者。在此漫长的岁月中，惟有鸿儒一人“秉持撑柱”，作书者敬称此大儒为“东海夫子”。

至于对当朝临政的雍正皇帝，夏靚则表达了极端的厌恶。他列举了雍正的十大罪状，即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谋任佞。于是乎“，天震地怒，鬼哭神号”，不也就顺理成章了吗！

岳钟琪直到傍午时分才把信读完。私下独自先行阅读这封叛逆味十足的信函并非什么了不得的事，不过既然这么多的手下亲眼目睹他接获此信的经过，他就得备加小心地处理此事了。他必须找到一个无懈可击的证人来旁观他审讯那信使的过程。如果他独自侦查这不同寻常的信件，或者私下审讯嫌犯，那么即使他弄出个究竟来，又有谁会相信他？恐怕反倒是掉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十五个月之前的月初，岳钟琪也曾遇到相似的

窘迫处境。当时他作为川陕总督正领军坐帐于成都府。8月4日正午刚过，突然有一人在成都街道上狂奔，此人双手抓着石块，大叫“岳公爷带川陕兵丁造反”，并称城内的秘密会社也将在诸城门同时发难，见人便杀。

(\*雍正三年(1725)五星联珠，此历代视为嘉瑞者，举国庆贺；黄河清在雍正四年、八年分别出现，外臣奏报，内臣举贺，合朝视为祥瑞。此处夏靓信中视此为恶兆，对应清廷异族统治之下的各种灾难，为其批判雍正朝政治及其自身主张背书，其原因在本书第五章曾静的自述中有解释--译者注)

最初报告此事件的城门官们以及负责审问此案的岳将军同僚、四川提督黄廷桂无不认定此人经查实姓卢名宗汉是个疯子。但这并不能令岳钟琪有丝毫的释怀。他仍须上奏朝廷，向雍正报告这起令他难堪万分的意外事件，因为他很清楚，他的同僚们也会将此事密奏皇上的，即使是他的亲信好友也不例外。此类事件看来无关紧要，但是否坦诚地报告任何一件可能对朝廷构成威胁的案件，却直接影响到他的那些同僚以及他自身的官场前途。

在向雍正帝具折奏陈此意外事件时，岳钟琪的苦涩之意溢于言表：“设使疯病果实，又何事不可言，何人不可毁，而必架此大题诬陷及臣？”在随后再次奏陈的折子中，他又连篇累牍地宣泄其愤懑

及内疚之情，自责身为朝廷封疆大臣，有失职守，并揽承了一大堆行政、财政及司法方面的过失，还再三强调身体欠佳，日感虚疲。最后，疏请解除包括川陕总督在内的所有职务。

雍正皇帝于当年夏天对岳钟琪的奏折作了回复。雍正的明谕对于发生于成都的卢宗汉案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他告诉岳钟琪，这许多年来，他收到警告岳有不忠之虞的“谤书”就有一大筐，其所本者无非是广为流布的谣言，声称钟琪将追随其先祖南宋名将岳飞，揭旗反清。雍正自认身为一国之君，他从来就对此不屑一顾。相反，他对将军信任有加，再三擢用，委任于更大的职权。雍正叹道，惟一令他遗憾的是，流言蜚语所伤害的不仅是将军本人，也极大地污蔑了作为西北边陲三军后盾的川陕忠良百姓。

在另一份仅由岳钟琪本人过目的朱批谕旨中，雍正在岳将军滔滔不绝之奏陈的字里行间亲笔御批，温言安抚道，将军在微不足道的小事上自责过深了；他从未由其他臣工的奏折中听到过那些琐事，当然现在也不以为意，盼望岳钟琪恪尽职守，“鼓励精神，协赞朕躬”。倒是岳钟琪的健康不可疏忽了，雍正关切地表示，将派遣深受他信任的太医院太医刘裕铎南下成都，为将军作一番彻底的诊疗。那刘太医后来的确奉皇命去了成都，接连三天为岳钟琪号脉、试药，最后根据将军的病情和身体

状况开了药方。岳钟琪经过此番调养，不仅“宿疾顿除，手足轻健”，更去除了忐忑不安的心病。

虽说如此，成都卢宗汉一案仍可能流言不绝，从而有损岳钟琪的名声，且让人怀疑西北边区的安靖。因而雍正帝下旨刑部派遣专人赴成都调查，向他再作禀报。刑部特使于1727年9月中旬抵达成都后，亲自鞠审嫌犯疯汉以及其所有家人亲戚，并曾与其在客栈同住的旅客，同时再度询问当日逮捕卢宗汉的巡守。严厉的提审侦讯包括严刑拷问也没有查出什么幕后策划者或者任何潜藏阴谋的蛛丝马迹。显然疯汉是因为一个多月来疟疾发作，以至于在心神不清的情况下独自犯下此案。实际上卢犯现在对8月间在大街上的疯狂作为已经一无所知了。细细计算下来，早些时候卢宗汉与一邻居间的土地纠纷，以及为收回部分被迫出售的土地而对当地衙门生发的不满，可能令他日趋疯癫，并最终驱使他走上狂言造谣的不归之路。卢宗汉因为乡县官员拒不重审他的上诉案而跑到了省城成都。或许因为听到过岳将军秉公理案的名声，所以想做下什么事来引起新到任的将军的注意吧。该年的调查也弄清了一些疑点，例如，卢犯两手握住石块是为了驱赶一路尾随的野狗；其神情呆滞、两眼无光是疟疾所致；最后，当他为巡守所擒并押往监狱后，立刻全身虚脱，死睡过去，对外界一切全然毫无知觉。

岳钟琪那次经历可称得上有惊无险，雍正帝并

未因此事而产生疑心，生疏钟琪。然而，在不足一年之内竟又发生相似的奇诞案子，叫他如何具折奏陈才好？他能否仍能获得皇上的信任？看来，若要求得朝廷的谅解，线希望只能寄托于清楚无误的审讯记录，不落任何令人指摘其遮盖案情、幕后交易的口实，只有无懈可击的证词才可采用。以这样的重案而言，地位卑微的官员显然是没有做旁证的资格的。陕西巡抚西琳是本省官位仅次于他的朝廷命官，其衙署也在西安城内。岳钟琪三番两次派遣幕僚敦促西琳尽快赶到总督府，但西琳均称无法赴命，因为此刻他正在城东北的军营考核武举人闹者。西琳是满族出身的官僚，秩位不过仅次总督一等，而且军营又处于西安“满城”中心，在这种情况下，倘若岳钟琪真的摆出官架子，强硬命令西琳前来，显然是极不明智的。那满人堡垒建于 1646 年满人到来之后，是将城东的大片地方围去后，再于城内建成的一个内城，十分牢固，是五千满人守备将士及其一万五千多家眷的永久性营地。西琳以此推托，岳钟琪再要发号施令，便有冒犯之意，当然不便再请了。

退而求其次，岳钟琪只得派人去请驻守在西安城内官居第三的朝臣按察使硕色。按察使衙署位于总督府对街，也就是陌生人等候岳将军回府的鼓楼不远之处。恰好硕色大人得闲，于是就赶到了岳将军府中候命。两人稍作寒暄，岳钟琪向按察使略略



讲述陌生人拦道投书的经过后，就将他安置到大厅的侧房之中，这样硕色既能耳闻审讯的全部过程，又不会被那投书者察觉。一切安排就绪，岳钟琪将军下令把不久前拿下的投书人，这个信函中称之为张倬的汉子，带到大厅，并唤手下奉上清茶一杯。

就这样两人以共同品茶开始了谈话。岳将军和颜悦色地询问信使，从何而来，走了多远才到达西安，走了多久？其业师“南海无主游民”现居何处，如何才能见他？广而言之，是什么因素使夏靓先生给他本人写下这样一封信，又用这样的方法呈递书信？

张倬的回答十分谨慎。他说，他早已立下誓言，绝不透露其老师的行踪。惟一可以告知的是，老师住在广东东南沿海，由一大群追随者保护着。至于他本人的居处，张倬称早年曾居武昌及两湖各地，现在也跟随其师居于南海之滨。一路北上，从广东经贵州、四川，几乎行经半个中国，才抵达陕西省都城西安，总共花了四个月之久。至于为何要投书给岳将军而不是别人，是因为夏靓、张倬师徒听民间广泛流传，雍正三次召岳钟琪进京陛见，岳却拒不奉召。于是推想，岳将军揭竿而起一定是指日可待了。中国南方诸省经济恶化，以及不同寻常的天象征兆更使他们相信是采取果敢行动的时候了。

岳钟琪再三追问三次召他人京的传闻，张倬的故事又添了变数。他告诉将军，他两星期前到了陕

西之后，才知道那是无中生有的事情，皇上从未召将军面圣。他也因此心生犹豫，或者还是不必投书了吧。可想到千辛万苦才到达此地，空手而归实在是于心不甘。左思右想，还是决定拦轿投书。

为了深究这桩阴谋背后的动机，岳钟琪又回到经济状况的题目上来。他问道，他们师生怎么会想到百姓打算造反？难道陕西不是一如张倬亲眼目睹，一片繁荣景象吗？张倬争辩道，陕西在岳将军治下或可称之为兴旺，但他的家乡两湖地区却饱受洪涝及干旱。岳钟琪对此答道：“此乃天灾，何与人事？”此外，据他所知，两湖之天灾仅限于少数地区，况且皇上早已调拨救济钱粮发往灾区。张倬答辩说：“官吏又心急又刻薄，不知百姓苦楚。”

岳钟琪再转话题，试图再次弄清此师生两人的来历。岳钟琪推究道，如果你张倬拒不透露详情，让我如何相信你所陈述的不是编制的谎言，乃至是本将军的仇敌所设的圈套，企图陷我于不忠？这里要补充一点背景材料：同样的事情确实于 1725 年发生在陕西岳钟琪的前任身上。那人正在春风得意的时候却被属下怂恿，有违人臣之礼，擅作威福，终于落得了一个自裁身亡的下场。岳钟琪当时正在军中任事，所以对此记忆犹新。不过张倬也不是省油的灯，他并未落进岳钟琪的圈套，发誓绝不透露他们的真实居处，即死不惜。

那是 10 月 28 日下午，巡抚西琳于武举考核

结束后匆匆赶到。岳钟琪赶忙出衙署迎接，并说自己的审讯落入了死胡同。两人一商量，既然那信使敬酒不吃，那就吃罚酒吧。西琳进入侧厅，与按察使硕色一同暗中听讯。

然而大刑之下，尽管张倬手脚几乎被木夹扯裂，他仍是毫不松口。他一边痛楚号叫，一边重复那些毫无用处的口供，说其师的确居于沿海诸省交界之处。几个小时过去了，审讯仍然一无所获，岳钟琪料想再这样下去的话，张倬必死无疑，那时这事关紧要的逆书将成为一桩无头案。于是岳钟琪下令，将张倬带回牢房，并请巡抚西琳及按察使硕色次日一早，再到总督府老地方暗中听讯。

10月29日一整天，审讯毫无收获。岳钟琪不断威胁用刑，但并未真正动刑。相反，他还是回到前一天的话题，苦口婆心地劝说张倬：你总得证明自己不是仇敌用来诋毁和陷害我岳钟琪的幌子吧。他并称，即使酷刑也是讯问所必须的，否则怎么让人相信你张倬是真心诚意的呢？岳钟琪甚至说出了他那被手下出卖的前任的姓名，说那人就是深受皇恩经略六省的大将军、川陕总督年羹尧。岳钟琪说，据他的观察，张倬等人是在玩同样的把戏，他有什么理由去相信一帮自命不凡的书生秀才呢？张倬则回答说，受了昨天的酷刑之后，要他再相信岳的任何话是难上加难。岳将军反唇相讥说，既然你执意不吐实情，大刑伺候是合情合理的结果，所

谓“尔以利害说人，人亦以厉害试尔”。

张倬一再声称六省传檄可定。岳钟琪问何以是六省？张倬便答说，当年吴三桂于1673年举旗反清时不就是六省响应吗？只要有人起头，这六省自然再会闻风而起，“一呼而定”。

岳钟琪毕竟对各地情况了如指掌这也是他身为总督的职责所在，因此在这个题目的辩论中频频指出对方的漏洞，颇占上风。不过，这样的辩驳来来去去，很快变成兜圈子，毫无进展可言。如果确实有那么一个阴谋，则其踪影仍然极其隐晦，其首领的行踪也还深藏未露。两人辩到最后，天色将晚，张倬竟放出话来，近乎威胁地说，很多人都知道了将军日前拷打犯人一事，风声所及，必然传到皇帝的耳中，而令朝廷发话询问其究竟，那时岳将军恐怕会有更大的麻烦。

岳钟琪对此威胁倒是从容不迫，坦然回答：“从此朝廷知谋反的人都来约我，势必疑我虑我，我何能一日自安？”但信使的威胁之辞倒提醒了岳钟琪一个解决之道。他说道：“今日骑虎之势不得不放你去，倘因外人传言，朝廷觉察，我只说是迂腐儒生条陈时事，语言狂妄，当经刑讯遂释，便无形迹。”张倬既不相信岳钟琪的话，当然不为所动。两人话不投机，岳钟琪只好令手下仍然将信使带回牢房，再作打算。

10月30日清晨，岳钟琪眼见投书案拖延了数

日之久仍无丝毫进展，势必不能再耽延上奏的时日，只得研墨敷纸，向雍正皇帝具奏这一桩新近发生在他管辖之地的投书案。

岳钟琪贵为总督，获得皇上授权，得以密上奏折。密折是由皇帝亲自拆封阅览，而无须经军机大臣或内阁大臣过目。密折必须由内外大臣亲笔书写，不容假手他人。而其行文格式，又颇有规矩：先列标题，概述奏事进言的内容；然后陈列要点，务必有条不紊；最后总说结语，并提出切实建言。奏陈用纸是统一的格式：白色，长十寸，宽二尺，且每页折成窄条形状，以便阅读；须用墨笔恭敬书写，每行之间留出足够的空白，以供皇上在行间朱笔批示；折尾落款日期之后，还得留足更多篇幅，使皇上在觉得有必要时写下长谕。

岳钟琪这份奏折的标题就用得颇不寻常：“冒昧陈奏，恳请恩鉴”。其用辞更是字斟句酌，将10月28日张倬如何投书，逆书的大致内容，以及数日来侦讯的详细经过一一道出。岳钟琪并坦陈此案犯诡谲多变，自己对于此案至今束手无策，尽管深知自身对皇上及国家的职责所在，但仍然感到对破案力不从心。所以，他在奏折的最后恳请雍正皇帝同意，将人犯张倬押送京城，由富于审讯经验的内大臣再行审理，藉此或许能够让张倬俯首就范，交代阴谋的实情。

岳钟琪又补充说，他本应随奏折附上逆书原

件。但此书实在是过于诬谤悖逆，他感到有污圣览，所以暂且搁置；如皇上谕令下达，定要亲览，则再作上呈。在候命期间，逆书原件将密封后由巡抚西琳保管，以确保其机密绝不外泄。岳钟琪并报告说，虽然本奏折由他上呈，但西琳曾在密室聆听第二和第三次审讯，因而足可为本案至今的发展及本陈奏的准确性背书作证。此外，张倬被拘留时随身挟带两本书，一本是《生员应诏书》手抄本，另一本是刻本《握机图注》，也已经密封保存。

岳钟琪将军将密奏交给一个驿卒，即刻飞马递送入京。一如奏折书写有规有矩，密奏的递相传送的方式，也是极有规则的。驿卒通常由封疆大吏的亲信侍卫或军中将校担当，而朝廷则在各地建立了驿站，常驻驿卒传递来往书信。这种递相传送系统精致复杂，如蛛网般地遍布中国各个主要都市和交通转运要径。中央与各地之间的通信速度足可见出朝廷办事的效率如何，因为驿卒一路行来，完全仰赖各驿站的后勤供应：在北方平原多用骏马，但遇到山陵地带则需骡驴的脚力，而西北沙漠地区又要借助骆驼；至于江南沿海，河湖纵横，各种船运系统便成为驿邮的主要手段，根据水路的要求，采用功能不同的船只。驿卒用餐和留宿的店家也是递相传送系统的一部分。岳钟琪将军的奏折中并未提及递送驿卒的姓名和官职，不过我们的确知道那人递送速度极快，10月30日中午离开西安11月5日或

6日已抵达北京，数日之内竟奔驰了850英里。

写完并寄出了奏折，岳钟琪稍微松了一口气，得以静下心来，将张倬投书案再从头到尾细想一番。虽然刚刚送出的密折或许能够表明他岳某的忠君爱国，但那信中叛逆的言辞本身却足以暗示他身为总督及西部三军统帅的一连串失败。他在奏折中向皇上所提的建议实际上也是很勉强的。万一京城的官员也对信使张倬毫无办法，问不出一句供词呢？万一张倬死于严刑逼供之下，那时还有什么办法去破案？归根到底，他的建言对于让皇上安心这一点实在没有多少帮助！

岳钟琪进一步思考之后，一个行动方案在心中渐渐形成。这个信使无论来自何处，在处于孤立无援、惊惧不安，而且肉体上也吃了苦头的情况下，竟挺过三次审讯，坚不松口。也许，换一副友善的面孔能收到严峻刑法所不能之效？岳将军知道一个叫做李元的人，以前是城东的学监，不久前才被提拔为代理县令。因为李元才赴任不久，张倬应该不会碰巧见过他。岳将军立刻命人将李县令请到总督府，并向他勾勒出他的计划：李元脱下官服，换上普通人衣着，假装成岳府的家仆。然后岳将军设法安排李元同张倬见面，伺机突破后者的心防。李元应尽其所能弄清张倬来自何方，同他闲聊本地的闲言杂语，并极力称赞岳将军为人及信誉。于是，岳将军派人在曲里八拐的衙署深处找到一间家具

摆设颇为像样的空房，先把李元安置过去，再命人在晚间将张倬从牢里提出来，送到那房内。李元已经在那里等候；岳钟琪见天气寒冷，又命侍卫给两人送去皮袄、暖酒。就这样，两人对床夜话，饮酒闲谈，在那客房盘桓到第二天。

次日，也就是10月31日的黄昏，天色将暗，岳钟琪再次开审，将张倬从他才过宿的新客房带到总督府大堂。按察使硕色还是被安置在侧房暗中听讯。岳将军以极为真诚的态度告诉张倬，他已把信函的劝说及张倬的话思量再三，已痛下决心，甘冒风险参与谋叛。显然为昨夜的人间温情，寒冷夜皮袄的温暖，以及满耳满脑有关岳钟琪的溢美之辞所软化和迷惑，张倬听信了岳钟琪的慷慨陈辞，虽然他仍然坚持岳钟琪得对天盟誓，永不背叛他们师徒。岳钟琪于是起誓绝不向任何人透露消息。

在岳钟琪坚持不懈且和颜悦色的询问之下，张倬开始一一坦露日前誓死守口如瓶的秘密。张倬的老师，所谓“南海无主游民夏靛”的真实姓名是曾静。曾静现在并不居住在东南沿海地区，而是蛰居于湖南省东南角的永兴县蒲潭村。信使本人的真实姓名叫张熙，湖南衡州府人氏，不过眼下客居其师家中。张熙并提出与谋叛计划有关的其他四个关键人物。第一位姓刘，是湖南地方学宫的教师，以通晓天文、精于军事策划著称。另一位姓陈，自称是刘先生的弟子，其居处不详。还有一个也是湖南人，



姓譙，来自本省其他乡镇，不过张熙对其详情并不知晓多少。最后一位姓严，来自完全不同于前述数人的地区。严先生住在地处江南的工商重镇浙江省杭州，以精通战略及火器而颇负声望。

岳钟琪暗想不可操之过急，否则可能欲速而不达。于是结束了当晚的问话，遣人将张熙仍送回客居安歇，让其和新结识的友人李元继续轻松闲聊，并命手下天明之前不得打搅他们。利用这个间隙，岳钟琪着手撰写关于本案的第二封密折。他大致叙述了如何设下圈套，又是如何假意盟誓以获取信使的信任，以及当晚所套出的部分案情，并附了一份至今浮现的谋反者的名单，包括这六人的姓名和住址。这份奏折的标题与前一份不同，岳钟琪几乎有些沾沾自喜了：“为逆犯已吐造谋之人谨缮密折”。笔墨刚干，他就挑选了另一名得力驿卒，命他连夜出发，争取追上前一名递送密折往京城的快驿。也许赶不上了，但至少能在皇上览阅了第一份折子后，打算采取行动之前，将此份密折送到皇上面前。

岳钟琪并不去打搅张熙的歇息，等到天近黎明才将他传到官署大堂继续讯问。按察使硕色一如往常，仍在邻室听讯。前晚的结果激发了岳钟琪好奇心，以及进一步探察案情底细的急切心情。他将讯问的焦点集中于张熙在初次应审时所谓六省闻风而起，一呼可定的说法上面。他问张熙那种说法的可能性何在？张熙的回答却颇为省约：“但据民情

乃不易之理。”

岳钟琪对此回答显然不尽满意。他进一步反问道，即是就所指六省而言，情形也并非太糟，赈灾物资早已发往灾害严重的地区。这如何让人信服“民情”即可让六省百姓揭旗造反的说法呢？“尔等必有兵有粮，将于何处举动，方自信一呼可定耳？”张熙的回答十分戒备：“我等但有同志数人讲此义理，其他悉非所知。”岳钟琪激将道：“此之所以称尔为迂腐儒生，以为凭一己之勇便可济事。”张熙回应说，其师曾静及昨日提及的刘、严诸先生并非仅仅一介书生，俱有本领韬略，大不可量。但能聘用吾师，何愁不济？即何以使湖广六省一呼可定之法，亦唯吾师有此智略。我后生小子，岂能及见。不过奉命致书，传达吾师面嘱之言。”

不过余后的谈话倒提供了更具实质性的消息。张熙告诉岳将军，一年之前的秋天，他曾赴浙江拜访已故学者吕留良的后裔，而吕留良便是呈给将军信函中提及的“东海夫子”的真名实姓。吕留良的孙子让他阅读了夫子的日记及其他著作，并送给他一些夫子诗作的刻印本。张熙评论说，吕留良乃近世名儒，然而其子孙的才华不过尔尔。

岳钟琪又随意地询问了一些其他的细节，譬如同张熙在浙江交谈的人士的姓名、住址，以及张熙本人家庭的情况，包括其父亲和其他亲戚的姓名和地址。张熙在数日之前还对有关其父亲的任何消息不

露一点口风，可现在却全盘托出：其父张新华居住在湘南安仁县城 40 英里外的一个偏僻小村，同其长子张熙同住。张新华曾是一个秀才，不过因为惹上了一场本地的风波，被剥夺了资格。所以其父现在连长衫也穿不上了。张熙还有一个堂弟，曾随他一路北上到达西安城。不过在他呈递那信函之前，突然害怕起来，竟自逃回家乡了。除了这些家人之外，还有车氏兄弟两人，也是湖南人氏，不过早已离开湘南，眼下居住在扬子江畔江宁府内（今江苏南京）。有一个姓孙的江苏人也居住车府中。此外，有一位沈先生，住在浙江，是严先生的门生。严先生就是昨晚他提到过的那位战略与火器专家。

一时之间，岳钟琪竟然获得了他所期望的所有案情。他将张熙打发回客房休息，再展笔墨，向雍正皇帝具写投书案的第三份奏折。这次，他的密折的标题是“逆犯续吐情”。岳钟琪概述了他同信使之间谈话的全部内容，并不失时机地加入他对案情的思考。他向雍正献策道，虽然他无法列举出吕留良族人的名单及居所，但浙江总督李卫应是追查此线索的不二人选。他记得吕留良乃康熙年间颇为士林所重的浙江大儒；吕的一个孙子曾卷入一念和尚密谋造反的大案，若不是先帝康熙爷感念吕氏乃名重当时的儒林领袖，且并无前愆，遂法外施恩、网开一面，那吕某人恐怕早已被处死了。岳钟琪又禀报说，经过再次搜查信使的行囊，还发现了一些其

他书籍：一本易经评注，一本诗选及一部医书。岳钟琪决定先行留下易经注和医书，密封存档，等待皇上谕旨再作处理；而因诗选系吕留良的著作，所以作为密折的附件，一并呈上以为查案证据。

就这样，岳钟琪在短短的六天之内第三次上奏雍正皇帝，报告案情。他派出快驿日夜兼程，赶往京城。这名驿卒所携带的密件包括川陕总督、宁远大将军的第三份密折，一本吕留良的诗选，一份附加备注的谋反者名单——将这新发现的七人包括在内，目前已掌握的涉及谋逆案人数已达十三人之多。显然，这份密折不可能赶在其他两份之前了，不过，要把这份包括最新案情进展的折子及时送到京城，使雍正得以整合各份奏折的内容而采取统一行动，那将是不成问题的。对岳钟琪而言，谋逆者分布于三个不同的省份，已是无庸置疑的事实。而他确实怀疑，那潜伏于湖广等六省的叛军正在俟机而动。

从那陌生汉子拦轿递信，岳钟琪接信观看的那刻，至于今日，已整整一个星期。案情一度如此险恶，但现在总算峰回路转，呈现一线生机。那信使恐怕没有什么新的口供可吐露的了，骗局也就不再有存在的必要。岳钟琪下令立刻将张熙移出舒适的客房，押入由按察使直接管辖的监狱，置于严密看守之下。投书人张熙美酒轻裘的好日子才不过几天就匆匆结束了。

## 第二章 雍正皇帝

雍正皇帝于11月的第一个周末收到了岳钟琪关于投书谋逆案的第一份密折。他极为仔细地览阅了这份奏折，写下朱笔御批。雍正是一个处事严谨、注重细节的皇帝，对于任何来自内外臣工的密折总是亲自览阅批发，从无滞留，也并不假手于军机处大臣或内阁大臣。当时，虽然只有各省要员，以及其他三品以上的内外大臣才获皇上特准，得以具折密奏，但这些官员仍多达两百人之数，雍正每天总要收到几十份来自各地的奏折。雍正执政十三年间，大多精力和时间就是花在细览这些奏折上面，并常常周详指示，留下了无数的朱批谕旨。如果大臣所奏之事并非过于敏感，他也将奏帖发给九卿王公大臣，谕令他们提出处理意见。

雍正处理政事通常是在两个地点，一处是紫禁城内寝宫养心殿，另一处则是比较轻松随意的圆明园离宫。后者处于北京西北郊外，田园环绕，远眺西山，是圣祖康熙所建并赐给时为雍亲王的皇四子的藩邸。密折直送内廷的乾清门，由内奏事处太监和内廷侍卫负责，直接呈送雍正，不分昼夜，亦不论雍正是居于内宫还是离宫，从不滞留耽延。雍正处理日常政务之处常备笔砚及朱砂，以便随时在公文上批阅（只有皇帝可以用朱笔，其他人一概只用墨笔）。雍正习惯于边观览边在重要行文处加朱圈，或在行间及天头就近批示训谕。通常，他还在折尾

空白处以娴熟的笔墨写下长谕。那龙飞凤舞的朱红御批在具折日期那端庄的黑色字迹的烘托之下，分外鲜明。

受限于急递制度的时间性以及昂贵的费用，各省督抚以下乃至学政等外臣常常将他们自己的密折集为一批，放入其个人专用的奏匣后，一起呈递皇上。这样的递送方法使雍正得以通览来自一地的奏折，并将朱批奏折分别放回同一奏匣，由那进京递送的驿卒将它们同时发还具折人，从而提高了效率。例如，仅仅十天之前，雍正收到岳钟琪的一批密奏，在一个奏匣里共收有二十份奏折（当时称奏帖，是奏折人密折请旨的官方文书，与由内阁而上达皇帝的题本及奏本不同。据李国荣、张书才《实说雍正》（紫禁城出版社，1999），康熙朝只有一百三十七名内外臣工获准具折言事。雍正时实际上具折人多达一千名以上，而雍正帝几乎每天都要批阅数以万字的奏折，朱批动辄数百，多则上千。冯尔康《雍正传》（人民出版社，1995），谓《朱批谕旨》一书所收的具折人为二百二十三人，实际上具折人多达千人以上。译者注）内容包括地方税收和各类轻微匪乱等一般事务，也有西北用兵后勤供应、对甘肃回族人民控制、倘若达赖喇嘛特使经西安赴京城而需作的各项安排这类朝廷要务。因此，岳钟琪 10 月 30 日关于逮捕并审讯信使张熙的密折竟单独由快驿急递赴京，这种做法本身已非常

规，足以令人惊讶。然后又是一份单独递送的奏陈，即 11 月 1 日送出、列出六名初步共谋犯的第二份密奏。毫无疑问，叛逆信函在岳钟琪看来是一桩头等大事，必须立即处理，其他有待处理的事无论其本身多重要，与之相比都显得无足轻重，不必协调安排后同时递送入京。

年届五十的雍正如今登基已经六年了。这期间他曾接获无数关于叛逆谋反的报告，其中也包括涉及岳钟琪本人的案子，如 1727 年的成都疯汉卢宗汉案。他对于各种奇诞怪状、闪烁其词的威胁，以及狂悖的诬谤可谓司空见惯了，而“夏靛”、“南海无主游民”这类称呼也并不令他惊奇。更何况雍正览阅岳钟琪密奏时的心境不同一般，因为他对很多事情早已有了定见，那么多年与众皇子明争暗斗觊觎皇位的岁月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判断。他很久以来就已养成了坚毅固执的禀性。多年来雍正一直坚信许多人企图谋杀他，而他也以牙还牙，下令杀了不少人，其中还包括与他同出一父的三个皇阿哥。这在当时差不多是众所周知的事了。最先死的是雍正的皇二哥、废太子允初。允初为先帝康熙二次废去储君之位后，一直被严行圈禁，雍正继位后，将他禁锢如初。允初死于 1725 年元月。次年夏天，雍正的皇八弟和皇九弟在一周内先后命赴黄泉。雍正从来就怀疑这两人图谋不轨，一直阴谋篡位，对他们非常厌恶，曾迫令两人不得再用原来的名字，

而分别称其为“阿其那（”意为肥如猪）”、“塞思黑”（意为贱如狗）。皇九弟因痢疾而发烧，不久死去。当时他被拘禁在北京城东南外数英里之外的一处监狱，四面高墙，仅够容身立足之地，手镣脚铐，连饮食都要从墙外由吊桶传入。皇八弟不过数日也因染怪病而亡，无人能识病因，但一般都相信他是中毒而死。雍正在两人死后降下谕旨，其家人不得公开吊丧。

诸如此类的事件对于雍正篡位的民间传闻而言，无疑是火上加油，因为看来雍正正力图剪除所有的竞争仇敌。康熙亲政时，喜好往北方木兰秋狝，或巡幸西北边疆及江南；雍正在做皇子时亦偶尔为之。但雍正皇帝即位六年以来，除了几次重大祭祀外，从未远离京城一步。这又加深了民间对皇上嗣统种种秘密的私下猜测。雍正本人的皇家血脉也多遭不测：至年，雍正众多嫔妃所生的九男四女之中，仅仅三个皇子幸存，其余都因各种疾病而早殇。

从雍正的各种上谕可见，他十分在意自己的满族血统。满洲人在八十年前入关，征服中国，至雍正为入关后第三代君王。虽然他本人从未御驾亲征，但他对于随着西北扩边而来的政务，对于安抚被纳入大清版图后原住部族的策略，一直深为关注。他授予前线满汉亲信将帅以大权，但同时又颇具疑心，时时提防，在这些三军统帅身边暗中安插了许多特务，令后者密折具告其主帅的言行举止。



一旦发现封疆大吏有丝毫不忠的迹象，雍正会毫不留情地下手铲除。雍正也并不信任外国人，无论他们是日本商人还是西洋教士，以及为外国人办事的买办、通译，一直派人监视这些人的行踪。雍正认为大多数人都为个人利益打算，所以必须时时提防，留心观察。他也深感整个国家和社会的道德每况愈下，必须以儒教和法治双管齐下，施以挽救之道。雍正坚信天人感应，常常向高僧大德请益，有时还与僧衲讲经论佛；另一方面，由于时感精力不济、身体虚疲，他又招纳游方郎中乃至道士异行之人，期望那些丹药为他治病驱邪。雍正曾命宫廷画师描摹他的十二幅肖像，每幅中的皇帝都打扮成不同的模样：有道士、乐师、武士，也有中亚细亚君王、学者和隐士。

岳钟琪在密折中称，谋逆者的暗中策划与联络竟已濒临东南沿海的浙江，也就是已故吕留良的家乡，并其子孙仍然居住的省份，这一点尤其触动了雍正的心病。雍正多年来对浙江人深为厌恶，认为浙江风俗浇漓，民刁俗悍。浙江人曾令他深受奇耻大辱，虽然他早已将冒犯之人斩尽杀绝，但心中隐痛至今不已（当指雍正三年，1725，案发的汪景祺，雍正四年判决的查嗣庭案。汪、查皆系浙江人。译者注）。为了整治浙江风俗，儆戒绅衿士庶，雍正专门设立了“观风整俗使”这一官职。没有任何其他地方是需要这种特别的官员来纠正道德风尚的，可

见雍正视浙江风俗败坏之深。

不过尽管心中思绪万千，雍正并未在这份岳钟琪 10 月 30 日发出的第一份密折上多加行批和圈点。只是在将尽读完时，看到岳钟琪若不奉命则暂时按下逆书，以免有污天聪的话之后，雍正提笔写道：“犬吠兽号之声耳，有何可介意？送来闲观之。”言语之间似乎还很轻松。

然而当雍正览阅完毕全文后，又觉得胸中块垒不吐不快。尤其是对那个姓张的信使，非得批驳一番不可。在钟琪密折之后的大块空白之处，雍正的朱批洋洋洒洒一路写来，几乎挤到纸边尽头：“竟有如此可笑之事，可恨之人！朕又见此人似内地匪类，就其言论天下时势光景，朕之用人行政，一些未闻之人，非是苗疆内多年汉奸，即系外洋逆党。其语言口声果似湖广人否？人品相貌何如人也？近文近武？不过市井俗人也，可将内闲言语试问便可知矣。”

雍正特别提到，他理解何以岳钟琪对此案极为重视，催逼甚紧，因为谁都知道那直接关系到他本人的清白。不过凡事欲速则不达：“何必当日追问即加刑讯？伊既有是胆为此事，必是一妄命不畏死之徒，便解京亦不过如此。

雍正认为，岳钟琪的当务之急乃是设法从一个宁死不屈的囚犯口中套出口供。雍正在岳钟琪密折尾空白处继续其朱批谕旨，提出四个可行方案。雍

正认为，每一个方案都可能奏效。第一个方案是要岳钟琪缓和气氛，与该信使随意攀谈，而后伺机展开审谏。第二个方案则是欲擒故纵，释放信使后将其置于严密监视之下。信使单独行事的可能性很小，谋叛者的同谋可能会渐渐放松警惕，现身与信使联络。那时便可将彼等一举拿获，严刑审问。第三个方案是岳钟琪假意与信使开诚布公，告诉他仍在细想此事，而不知如何禀报朝廷才好。岳钟琪不妨假装糊涂，认为信使不是疯了，就是根本没有想到会碰上他将军本人，手足无措之下竟然胡言乱语。随后，岳钟琪可以一点一点地向那信使描绘先帝康熙及当今圣上的丰功伟绩，他们为国家带来的安定和繁荣。如果不是有人挑动和误导，那信使又怎么会因毫无根据的恶毒想法就对浩荡皇恩及升平社稷视而不见呢？在此基础上，岳钟琪可以引出同谋这一话题——这么大的行动怎可能只有他们师徒两人参与？然后就说，他想他们一定是上当受骗了。雍正甚至还为岳钟琪想好了盘问信使的话：“据汝所言，似非一二无知之人。必有有见识人将你性命为伊等侥幸之谋也。何不将你送之死地之仇人举出？”

雍正最后写道，如果此三计无一奏效，岳钟琪还可以再出一招：阿谀奉承。夸奖那信使乃英雄好汉，其师夏靚必是异行卓能之士，否则怎么会举臂一呼而六省响应？想想有多少人卷入了这场大计

谋之中！岳钟琪可以劝导说：“何不回去将伊等劝化归正为国家臣子，不但不徒老死于匪类，抑且垂名竹帛矣！”

雍正皇帝的面前还摆了另一份密折，落款日期也是 10 月 30 日。这份密折是陕西监察使硕色具奏。硕色在 10 月末的几天里在岳总督特辟的密室之中花了不少的时间，旁听审讯。硕色报告说，根据其暗中听到的谈话，他自信对那信使已颇为了解：“臣细看其人甚是狡猾。断非一二人所谋之事，必有党羽匪类。”他说此类党羽必定散布于湖南及广东沿海一带。与花许多时间批复岳钟琪的密折截然不同，雍正颇不屑于花费御笔去称道硕色，而只批了一个“阅”字。岳钟琪才是牵动此案的关键人物，雍正显然对硕色的想法没什么兴趣。

雍正览阅岳钟琪这份关于谋逆案的密折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信使张倬，或许还有其师夏靓，都算不上是“汉人”。这个最直觉的想法反映了雍正的一个先入之见，一种思绪。数月以来，雍正一直在同诸内外臣工深入探究两件事情。一是散居于湖南、广西的土著苗民部落中的所谓“汉奸”；这些汉人中的败类原是一些流刑罪犯，现在却在苗民中兴风作浪，剥夺苗人，霸占土地，并诱哄当地人加入伪冒的宗族组织，而对诚心与清王朝地方政府合作的当地人则百般阻挠。其二，是中国沿海诸省与日本之间的非法贸易及移民问题，以及甄别正当

旅行者和借合法理由为幌子从事非法活动者的困难之处例如，前者包括受日本僧众之邀请而由中原前往日本佛教圣地讲经念佛的大德高僧，后者则包括来往中国与日本两岸及吕宋、爪哇、暹罗之间的外国人，他们常暗中走私各种非法商品、火器，乃至煽动性的政治书籍。

这份朱批奏折还没有交到送该密折来京的驿卒手中，岳钟琪于11月1日发出的第二份密折又飞马送到。这份密折报告了设计佯装对天盟誓及由此而获得的案情上的首次突破。面对这种急剧转折的案情，雍正无法再保有那份在览阅首份密折时的从容镇静。当他读到岳钟琪关于盟誓并允诺加入谋反一节时，雍正以朱笔加圈，并在双行间批道：“览至‘盟誓’二字朕不觉泪堕。卿此一念，天祖鉴之矣。此等盟誓乃不得已权变之举，神明有知，断无不消灾灭罪、赐福延禄之理。嘉悦之怀殊难笔喻。我君臣契合之情，盖由前劫善缘所钟，卿系乘愿力而来佐朕治理，国家苍生者，岂泛常所可比拟。朕实嘉悦之至。”

雍正皇帝对于岳钟琪密折的反应显然非常动感情。这缘于雍正本人不久之前的亲身经历，这经历清楚地告诉他，川陕总督这一位置在政治和战略上有多么重要——岳钟琪眼下正官居此要职。正是川陕西北重地让雍正第一宠信的汉大臣、儒将年羹尧野心膨胀，不可收拾。雍正登基以来的头几年里，

他对年羹尧无数、关切备至。君臣之间的关系因为年羹尧的妹妹年氏先是贵为雍邸侧福晋，更因受雍正宠爱而封为皇贵妃，而倍加密切。年贵妃曾为雍正生下三男一女。雍正对年羹尧的信任可圈可点，因而赋予他监视康熙之皇十四子的重任，这可是危险而微妙的使命，因为这位皇子一直被雍正视为对其皇位的一个重大威胁。皇十四子是雍正一母所生的亲兄弟，精明强干，声誉卓著，曾于康熙年间调度节制大军平定西藏叛乱，称大将军王。雍正即位后，怀疑他暗中策划，阴谋夺宫，因而将他流逐到孤城西宁，置于年羹尧监管之下。不久之后，雍正又疑心皇十四子与年羹尧私通款曲，遂干脆将皇十四子押回北京监禁。与此同时，雍正展开了对年羹尧的一连串抨击与整肃，指控他招权纳贿、不忠朝廷、贪婪自图、虚荣自负。在雍正初年上疏揭奏、斥责年羹尧的地方大员当中，便包括了年轻的将领岳钟琪。岳那时正展示其锦绣前程，朝廷授予他的许多职务和权力，正是从年羹尧那里有计划地剥夺的。不过虽然雍正褫夺了年的功名官职，并籍没了其资产，却仍让年苟延残喘，并未取他性命。不幸的是年的妹妹年贵妃竟然于 1726 年夏暴卒，这么一来，年羹尧的命运算是尘埃落定了。年被逮捕关押，议政大臣罗列其九十二大罪，请求立正典刑。这些罪名按类包括大逆、欺罔、僭越、狂悖、专擅、贪婪、侵蚀、忌刻诸罪。雍正谕令年羹尧自裁。

雍正谕令逮捕年羹尧后，朝廷查封了年府。查抄年羹尧家时，搜捕官吏发现了一本名为《读书堂西征随笔》的奇异书稿，系一名叫做汪景祺的浙江举人所撰。汪景祺出身于名门世家，但仕途落寞。1724年初他由京城远游西北，到达年羹尧驻帐的西宁。他或许是想找机会通过熟人的关系求见年羹尧，以谋取一份幕客的差使。《西征随笔》确实被递送到年的手中并留在了官署。该书的题目看起来并无不当之处，又采取了普通的旅行日志的形式，且行文之间不乏机智及卖弄词义，但实际上充满粗鄙恶劣及讽刺诽谤之辞。汪景祺将该日志作为对一个充满暴力、悲苦的世界的写照。他所记载的每日行程，无论行途还是暂宿，都充斥了人们的倾诉和怨言。他写下了许多令人惊奇万分的事情，诸如西部用兵给百姓带来的困苦艰难、战场上堆积如山的尸骨、饱受虐待荼毒的边疆部族战俘，以及妇女被掳掠强奸并配给军官士兵为奴等等恶行。汪景祺在《西征随笔》中收录了《功臣不可为》一文，认为无论年、岳诸将帅多么功勋卓著，皇上并未给予其应得的奖励，甚至从未公开表彰过这些功绩。汪景祺称年、岳完全应该为其所受之不公平待遇喊屈鸣怨。

汪景祺在书稿中又自称其观点代表了西北诸省百姓的共同呼声，并说这些百姓的土地被强征赋税以供无休无止的西边征战之需；百姓大批死于饥

荒与绝望之中，其数目竟不下于被俘虏的部族边民。结果土地荒芜被弃，百姓卖儿鬻女，妻女被迫为娼。土匪强盗猖獗横行，对西北人民而言更是雪上加霜。据汪景祺记载，陕西黄河流域一带的乡里到处是关于绿林传闻，而其中女盗匪结伙成帮打家劫舍的流言更是甚嚣尘上。这些女盗匪盟誓结义、众志成城，因饱受蹂躏而变得坚韧不拔，个个身怀独门武艺，并在江湖上赢得名号。书中载录的女侠有挥舞长枪疾如闪电的“翡翠女”，擅长大刀，其刀影神出鬼没旋如雪片的“小云”，百步穿杨的神箭手“玉女”，以及其同伴惯常身着紫衣背负紫弓的“紫云”。此外还有武功绝顶的女流，或身轻如燕轻功一流，或骑术精湛能藏身马腹，乃至生性残忍，擅长易容乔装者，三寸金莲而疾步如飞者，历历传奇。更有所谓“胭脂女盗”，在当地令人闻风丧胆，以致传言其事者仅敢向汪景祺耳语或比划，神情紧张，环顾左右，生怕为人窃听而置己于不利。

汪景祺在书稿的许多地方嘲笑先帝圣祖康熙及当今圣上雍正，称其父子常常被臣下蒙骗，又锱铢必较，而对用兵征战却乐而不疲。对于身受两朝皇恩、鞠躬尽瘁的大臣的评价更是严酷，并指名道姓地将他看不惯的朝廷重臣指斥为奸滑之徒，公布其籍里、科举年份，指控这些官员残忍、假道学，逼死了无数的善男信女。汪景祺的这份指控名单中



包括以往四十年里朝野景仰的臣工，其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张鹏翮。此公为康熙九年进士，选庶吉士，历任各部尚书，为康雍两朝大学士，又曾出任河道总督及多项巡察御史之职。在汪景祺的笔下，死于1725年的张公可不是个正人君子，而是个纵欲无度、欺君罔上的小丑，一如涂脂抹粉的戏子。他写了一个逸闻，说张公早朝一结束就赶回府邸，直奔卧室，与一丝不挂的侍妾交欢。张大学士匆忙之下连朝服也来不及脱下，就站在床边与侍妾做起床第之事，那女子更把双脚倒挂在身着官服的大学士的双肩，缠绕住他的脖颈。

雍正见到此类不堪入目的记载，亲笔谕批：“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汪景祺全然不顾自身的门第家世，诬谤先帝，实在是“大逆不道”。雍正谕令将汪景祺并十六岁以上的诸子以大不敬律处斩，其余妇孺发遣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年羹尧私藏汪景祺《读书堂西征随笔》不行参奏，也是致其自缢的九十二项大罪中的五大逆之一。

雍正对于陕西地域任何风吹草动的高度敏感，岳钟琪可是再清楚不过了。他11月的密折的内容和基调无一不是处心积虑地向皇上表示忠心，以示他岳钟琪将军决不会重蹈他前任的覆辙。他清清楚楚地向皇上具奏，确实收到了这样一封逆书，毫无隐匿不报之意。凡他岳钟琪节制之下的西北大军决不卷入至今仍未彻底平息的皇室皇子及其同党之

间的政争。所以岳钟琪的第二份密折简明扼要，以便能尽快呈递入京。他岳钟琪早已背弃了与张熙师徒的盟誓，向皇上举报此案，这足以向雍正传递他的一片忠心；不过该密奏的重头戏还是在后面：那份列有六名谋逆犯姓名及乡里籍贯的名单。在该名单之后，雍正写下第二句朱批：“开单留中，朕自命妥协之人前往捕拿料理。将张熙仍，好好设法宽其心而羁留之。”

鉴于逆书案的严重性，雍正一改其惯常的做法，传旨军机处将岳钟琪的两份密折及朱批谕旨分别抄录副本留在宫中，以为日后参考之用，然后再将朱批奏折密封在奏匣之内，交给岳钟琪派来而尚在宫中等候的两名驿卒，令其速返川陕总督府。按照惯例，直接由皇帝发出的急件非比寻常，其奏匣加用皇家专用之黄色绸缎封裹。这天发出的朱批奏折由驿卒们一路急递西行，于11月17日送抵岳钟琪衙署。岳钟琪设案焚香，跪接圣谕。按照大清礼制，见圣谕如同面圣，必须万分恭敬地迎接，不可丝毫怠慢。

岳钟琪恭览雍正朱批圣谕，心中十分宽慰：皇上对他卷入如此大案不但没有丝毫责备之意，反而信任有加；而且皇上用来审案的主意竟与他已采取的策略不谋而合！因而，次日清晨，踌躇满志的岳钟琪已经备齐回复皇上的密折及一干物证，包括由曾静亲书、张熙呈递的逆书，从张熙行囊中搜出的

诸类书籍，以及岳将军本人对于雍正最为关切的疑问的答案：张熙确实是从湖南而来，并非东南沿海或邻近省份人氏；同样可以确定的是，张熙绝非身怀武功之人，一眼望去，即知是手无缚鸡之力，只会对舞文弄墨感兴趣的柔弱书生。岳将军也肯定张熙决然不懂军事，也看不出有什么进取精神，因为每次问到谋逆案的关键性问题，他总是推托到其师曾静身上，从不肯担当任何责任。

不过，在 11 月底收到岳钟琪的这份奏折及其他物证之前，雍正皇帝已作出决定，让更多的王公大臣知悉此案并出谋划策，提供建言。引发雍正决断的正是岳钟琪于 11 月初发出的一连串密折中的第三份。在该密折中，谋逆嫌犯已经遽然增加为十三人，包括在浙江地域内的至少两人，原籍外省但定居江苏的三人，以及居住于湖南境内的其余多人。除此而外，岳钟琪的这份奏折更揭破了浙江已故大儒吕留良的行迹，此人竟对远在湖南的一干逆犯有如此深刻的影响力！岳钟琪所罗列的细节还含有吕留良之孙参与由一念和尚领头的谋反骚动这一关键性事实。一念和尚的谋反案发生在 1707 年，那是二十多年之前的旧事了。老辈的人都对此案相当清楚，一念以忠于前明王朝为号召，聚集民众；其檄文通令皆沿袭前明年号，而拒不按律采用大青年号律制；起事者一律头裹红巾，擎仿明朝旗帜，并歃血盟誓效忠领袖及结盟弟兄。至 1707 年底的

时候，这支叛军的实力已增至数千人之强，并通晓作战之术，击溃了前往围剿的清军骑兵，在浙江山区建立了坚固的基地。岳钟琪提醒皇上，叛军最终为清军击败之后，经过审讯，先帝圣祖康熙顾念那吕留良之孙出身宿儒世家，不谙世事，将他宽宥释放了。

岳钟琪所提供的此类细节为雍正描绘出一幅颇令他不安的画面：士子文人兴风作浪，谋逆活动触目惊心，两者互相纠集，形成一股抗拒朝廷的势力。这使雍正深感处理逆书案刻不容缓。不过在扩大知情者范围的同时，又必须确保本案的高度机密性，绝不使散布在各省的谋逆犯感到任何风吹草动，以便将他们一网打尽。

要在这两者之间寻求适当的平衡可是一件颇为微妙的事情。通常，清政府会将计划中采取的行动以文告形式刊登在邸报上面。邸报，又称邸抄，是由内阁经统属兵部的各省驻京师提塘官而向本省发出、有关朝廷行政和敕令的一种通讯简报，按律只有京官、内大臣及县令以上的外臣有权阅读。但是事实上，泄露之事层出不穷，本该置于机密的消息不是由京城内阁或六科的官吏私下贩售给各地报纸印刷商，就是各省、地方的官员将新近的邸报泄露给街头小贩，牟取私利。由此途径，印得粗糙的政府公文满天乱飞，根本无机密可言了。为了减轻这类泄密带来的危害，朝廷延后了发布官方消

息的时间，但仍是防不胜防，收效甚微。

雍正解决扩大参与和加强保密之间两难的办法是一种直接且机密的通讯途径，称为“廷寄”。雍正一向偏爱机密及高效的行事风格，在他继位亲政的几年后，采用了由大学士、军机大臣张廷玉规划的这套制度。凡事涉紧要机密，雍正认为必须用“廷寄”的，他便直接谕令军机处撰拟、抄写并密封发出，称“寄信上谕”，而不通过内阁以“明发上谕”的形式发出其诏令。雍正通常由他最信任的三个大臣办理寄信上谕。其中两位是汉大臣张廷玉和蒋廷锡，这两人精明强干，忠心耿耿；另一位则是雍正帝的亲皇弟、先帝康熙的皇十三子胤祥。胤祥小雍正八岁，忠敬诚直，清正廉明，曾襄助雍正承继大统，是雍正所有弟兄之中惟一获得绝对信任的一位。胤祥被封为怡亲王，是秩位最高的亲王，承雍正亲命总理事务，管理户部三库、户部事务，统筹全国财政经济，并参与京师守卫及西北军事。雍正发布口谕之后，就由这三位军机大臣草拟谕旨，奏请皇上核准，再由该三重臣督视抄写、缮发，然后视接收对象，分别以“军机大臣字寄”和“军机大臣传谕”的形式，将该廷寄交兵部由驿站递相传送。用廷寄的方法可以使上谕同时寄抵名单所列的各地封疆大吏，而又无泄密之虞。

雍正处于1728年11月11日口谕的那封廷寄就是通过这种方式送抵为数不多的数省地方大员的。

该上谕包括才暴露些许面目的曾静一案的大致细节以及雍正决定的侦查战略。此外，作为附件，雍正转发给每位受命调查办案的大臣两份文件：信使张熙在西安所交待的十三谋逆犯名单及里籍；岳钟琪关于鞠审张熙之密折的抄件。十三谋逆犯名单按地区分列，将是第二阶段侦查的中心。雍正决定，江宁或江苏其他地方内的三个同谋将由两江总督范时绎缉拿并审讯；所有浙江人犯由浙江总督李卫负责搜捕。所有与浙江籍的理学家吕留良之著作有关的人员、材料等的搜证和调查，以及审讞吕氏族人的事项，全部由李卫全权负责。因其所辖之江浙、安徽衔接相邻，范、李两位总督必须精诚合作，确保破案。

搜捕湖南境内八名人犯显然较为复杂且费时。湖南是本案主谋曾静及信使张熙师徒的老巢，又较江浙两省距京师为远；现任湖南巡抚王国栋也还算是老谋深算的臣僚。实际上，王国栋碰巧曾任浙江观风整俗使，不久前才获擢升为湘抚。因此雍正特地派遣副都统觉罗海兰以署理巡察御史之职，前往湖南。海兰出身满洲正白旗，是一名战功卓著的老将，早在1690年代的西北战事中就赢得功名了。海兰肩负亲自携带雍正上谕赴湘，面交王国栋的使命，并将留在湖南，协助王国栋共同办案。

至11月12日傍晚，包括海兰亲自所携的廷寄在内的三封“寄信上谕”都已上路了。来自兵部

的一队快驿持送给两江总督范时绎的密件。范时绎的官署在江宁城中，距北京 750 英里  
交通便捷。浙江总督李卫的府衙设在杭州，虽然距北京达 1000 多英里，不过给李卫发廷寄倒是简单得多，因为李卫不久前才给雍正递了一批密折，报告诸多地方事务，而递送密折的快驿、李卫的亲信田姓副将仍在京城，准备将朱批奏折带回杭州总督衙署复命。因此，由雍正面谕三位军机大臣的廷寄及附件，先是封印裹实，再锁入专送密折入京的奏盒。海兰将军及一名亲信随从、一小队护卫携信件等纵骑南行。数支南行队伍中，海兰这队行程最远，由京师至湖南省府长沙达 1200 英里之多。雍正无法精确地预计各支急递到达其各自目的地的时间，不过按照以往的经验，由于日夜兼程地赶路，大概十余天可抵江宁和杭州，两周或稍久些则可抵长沙。若江、浙、湘诸省各花上一周的时间准备就绪并展开其侦捕行动，然后以相同的时间将最初追查结果往京师报告，雍正预计，将能在一个月之后看到三省的奏折，报告有关案情进展。

然而，随着岳钟琪奉命将曾静逆书原件于 11 月 28 日递送入京，这暴风雨前的宁静在瞬间被打破了。虽说雍正早已从岳钟琪最初密折中对逆书所作的概要，以及岳在同信使张熙辩论时对该书信的一些评说之中，透见曾静原信的一二信息，但乍见逆书全文，雍正仍大受震动，激愤之情无可名状。

这不仅在于曾静对于他作为个人和身为帝王漫加攻击，更由于逆犯对 1722 年先帝遽然薨逝、雍正即位危机期间的种种事件，包括对他及先帝其他皇子的恶意描绘。可恨的是，那些在雍正看来荒诞不经的说辞及论辩，却包装得十分像样，花言巧语，颇能令人相信。事情到了这样一步，如果雍正不愿对其诬谤置之不理，就必须严辞批驳了。

雍正收到岳钟琪送上的曾静逆书原件不过十天，就亲笔写成了一篇详尽的批驳圣谕，雄辩滔滔地综述了他对逆书种种荒谬指控的驳斥。雍正开宗明义说明，尽管面对这许多指控，面对苍天、皇考、亿万苍生，他无愧于心。他之所以撰文驳斥，乃是那恶毒的攻击必定自有由来，且潜藏于为人所不知之处；身为一国之君，若不能对种种谣言追根溯源，向世人揭露其谬误，则由谋逆之奸徒所散布的恶瘴将会左右世道人心。而其反驳的第一步就是要澄清有关他弑父、改诏、篡位这一最大指控的事实。

雍正一落笔便觉得思绪万千，有千言万语要倾注于笔端。他追忆在他继承大统之前对皇考康熙敬爱孝顺，以及康熙于畅春园病重、弥留期间的种种细节，包括康熙龙驭上宾之际祇候于寝宫的王公大臣的姓名及时辰。他还描述了其他一些皇阿哥此期间与此前的种种不端行为，以及先帝对他们的责难和排斥。雍正辩解道，他之所以要圈禁那几个皇弟，并非因一己之私，或出于残忍或报复之心，而是敬



奉祖宗基业的责任所在。且他不仅未置那些不安分的觊觎大位者于死地，反而在他们生病时遣医送药。同样恶毒的谣言说他逼母，又将废太子妃嫔收归己有。雍正气愤地指出，他皇帝本人以及众多目睹他前往后宫问安的太监皆可作证，他对后宫所有的女眷相待有礼，从未逾制。

曾静的逆书又指他贪财，甚至有贩米发卖以谋利的行为。雍正辩驳道：他富有四海，取用不尽，何必贪婪？至于酗酒的罪名，更是无中生有：他的身体状况从不允许他多喝几杯，何况酗酒？这一指控全然出于误解，事出一位提督在上朝时对有关坊间流言的关注，因为那些流言涉及皇上龙体。雍正写道，实际上中国古史曾载，连尧舜都喜好饮酒，而《论语》称孔子惟酒无量。至于性和妇女，他自幼即对色欲兴趣乏乏，自登基以来从未广置后宫妃嫔。“朕常自谓，天下人不好色未有如朕者。‘远色’二字朕实可自信，而诸王大臣近侍等亦共知之。今乃谤为好色，不知所好者何色，所宠者何人？逆书又加之于多疑、诛忠的罪名，但所谓忠臣是指何人呢？年羹尧吗？归根结底，是那些指责他的诸皇弟及其太监，而非他大清皇帝雍正，犯下大逆不道的种种恶行。

曾静又责难满洲旗人憎恨并欺压汉族人民，给中原带来无穷苦难。雍正申斥说，此乃荒诞不经、无凭无据的谬论。难道不是汉人中的匪类李自成之

辈倾覆了明朝，并逼得崇祯自缢于煤山么？而大清官兵虽人数不及十万之众，却剿灭了叛军，替明朝复仇，为中国恢复安定，使人民居有屋、食有粮，渐入升平繁荣之境。善良忠诚的汉人与满洲旗人并肩协作，立下功劳。岳钟琪将军堪称其典范，如今成为国家之栋梁，位极人臣。清军入关之后，历代君主无不谕令祭奠并往视前明皇陵，维系了中华社稷的承传。每逢天灾，朝廷拨款赈灾，救民于水火。雍正指出，曾静等奸徒之辈不惜扭曲事实，甚至将孔庙不慎遭祝融之灾亦归咎于大清，可谓颠倒黑白。曾静、张熙师徒邪恶顽劣自不待说，不过如若放眼历史，则其谬善恶行与浙江不肖文人查嗣庭、汪景祺辈无疑一脉相承，与前明理学家、士大夫妄言是非，自以为深得道统的恶习也是同出一辙。雍正感叹道，毕竟天道昭彰，使曾静等阴谋诬谤暴露于天下后世，不致其蒙莫名之冤，所以反倒要额首称庆，感谢上苍的笃佑了。

雍正严辞批驳了曾静所罗列的种种具体指控之后，将思绪落回到原先论及的更为宽泛的考虑上面。他说，普天之下有苍生亿万，无不忠君爱主，因为这是身为臣民的根本之道。然而，如今竟有曾静等如此一二叛逆之徒“自越于天覆地载之外，自绝于纲常伦纪之中”，为畜生禽兽所不为之事，真是“天良丧尽”。以常理推论，断无人民百姓会相信这类无稽的谬言，然而“，或者百千亿人中尚有

一二不识理道之人，闻此流言而生几微影响之疑者。是以特将逆书播告于外，并将宫廷之事宣示梗概，使众知之”。

雍正的驳难在结语时怒气稍减，而体现出更多的自省深思。这位大清皇帝再次表明，他要与天下的苍生黎民分享关于逆书案的思考：“若朕稍有不可自问之处，而为此布告之词，又何颜以对内外臣工、万方黎庶，将以此欺天乎？欺人乎？抑自欺乎？朕自见逆贼之书，坦然于中，并不忿怒，且可因其悖逆之语明白晓谕，俾朕数年来寢食不遑为宗社苍生忧勤惕励之心，得白于天下后世，亦朕不幸中之大幸事也。”

显然，公布曾静的逆书以及雍正本人的批驳，肯定会惊动涉案的每一个逆犯。不过现在已无保密的必要了。觉罗海兰已有回奏，报告其安然抵达长沙城，并拟定了逮捕曾静及其他一千人犯的方案。那么，现在的这个时候，江浙湘三省的拘捕行动应该已近尾声，严刑审讞也已在进行当中了。雍正立即下旨内阁，令六科官吏根据刚刚完成的批驳意旨，撰写一份正式文件。这份完稿后的文件长达83页之多。12月11日凌晨，雍正颁下圣旨，所有在京满汉文武大臣一律聚会集于紫禁城乾清门外，聆听朝廷正式宣读这份文件。

对于逆书本身的料理到此暂告一个段落。至于下一步将如何行动，雍正皇帝将视江浙湖南三省的

拘捕和鞫审结果而再作打算。

### 第三章 信使踪迹

11月23日下午，兵部派遣的快驿经过近十日的跋涉急行，将内藏雍正上谕、外裹皇家黄缎的奏匣送到江宁两江总督府。范时绎当时正在衙署内视事。范时绎面向北京行过跪磕之礼，接下圣谕。他仔细读毕廷寄及所附其他文件之后，立即着手行动。虽然案情细节尚待查明，但他所面临的任务却十分明确：经过审讯，目前尚在西安的谋反信使张熙交代了一份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十三谋逆犯名单。其中三人，即车氏兄弟和孙姓逆犯，乃江苏人氏，因此属于他的管辖范围，而逮捕这三人的自然是他两江总督的职责。

范时绎汉军镶黄旗出身，坚毅果敢，精力充沛。八旗制度是清王朝军事力量的核心所在，以旗帜及镶边颜色分出正红、镶红，正黄、镶黄，正蓝、镶蓝，正白、镶白，总共八旗；又各按族裔分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入籍汉军是一种崇高的待遇，只有早年追随满洲统治者南征北战，打下江山的汉人的后裔才有资格。直到不久之前，范时绎一直任职军旅：雍正皇帝调他出任文官之先，他曾历任副将、总兵、都统之职，但从未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功名。其祖父是清初最有权势的一位内阁大学士，其父曾任兵部尚书，有一位叔父在1673年抗击大规模叛乱时为国捐躯。而范时绎自己对王

朝的忠诚也是无懈可击的：1725 年 1726 至年间，在他担任直隶马兰峪总兵时，曾向朝廷报告过雍正的皇十四弟的支持者阴谋活动的宝贵消息。雍正对这个同母所生的皇弟一向是既畏且恨的。也许是为了奖酬范时绎的忠诚吧，雍正提拔范出任署理两江总督，管辖长江流域人口众多又最为富饶的江苏、江西和安徽三省。这样一项任命对于一位从无行政经验的军人而言，确是出人意料的。

范时绎的缉捕计划直截了当但十分切实：当日傍晚，他召集了几位亲信下属及军官到总督府内，并将他们分为两队，分别执行任务。其中一队的任务看来相当简单，只需前往城内车氏兄弟的住宅将两人拘捕，并押往总督府候审。另一队的任务稍微复杂些：他们将前往江宁以北 100 英里的淮安县，找到一名叫孙克用的逆犯，将他缉拿归案。

江宁缉捕队很快抵达车府。令他们失望的是，在府中只发现车氏兄弟中的老大车鼎丰；老二车鼎贲前段时间去了另一个县，送他的一个女儿出嫁了。而碰巧那个县就是淮安，也就是第二缉捕队的目的地。为了防备车鼎贲乘机逃脱，范时绎当机立断，下令将车府中所有其他成员拘捕，在严密的守卫之下，直接押往淮安，这样两队将在淮安会合，发现车鼎贲的下落并将他逮捕。

同时，范时绎毫不耽搁，立即传令将老大车鼎丰带到总督衙署审讯。如同岳钟琪初审张熙时就采

用自保方法一样，范时绎也请来其他地方大员旁听，以免将来落人话柄，说他与人犯之间有什么瓜葛。车鼎丰向承审官交待，他是一个读书人，还有点儿功名，是个贡生。如果他愿意的话，本来是可以上京城国子监就读的，不过他宁愿留在江宁与他弟弟一起自习。

范时绎颇有点嘲笑地问，既然如此，那么“所读有何奇特之书？所学有何高远之事？所交有何信密之友？”车鼎丰回答道，他不过是自求其道，拙劣而简约，并无多少意气相投的朋友。范时绎语带讥讽地说，那样的说法可是太过简单了。接着问车可认识一个叫孙克用的淮安人？车鼎丰仍是不慌不忙地回答说，以前倒是有一个姓孙的在他家中做塾师，不过是叫孙用克，不叫孙克用；此人乃安徽桐城人氏，并非淮安人。说起来，这位受聘的孙先生态度倨傲得很，实在不易相处，所以后来只得把他辞掉了。听说后来孙先生又找到了一份私塾教师的差使，东家是淮安县城内姓任的官宦人家。也许因为这个原因，使别人误以为他是淮安人吧。自孙用克离开江宁后，车鼎丰还见过他两次，一次是去年八月车家为老母做寿时，孙先生曾前来拜寿，还迟到了许久；另外就是今年秋天，他由淮安县返回桐城老家，路经江宁时，倒也顺道来府中拜访问候。哦，对了，另外有一位姓张的湖南安仁县人，也在车府的寿筵上露了面。不过他记不清这个张先

生的全名了。

范时绎总督暗中猜度，那位姓任的官员可能是他的一位旧识，本来在福建省任职，不久前才致仕回家乡淮安的。因此他立即派遣衙吏赶往淮安任府，采查孙用克是否仍在那里。考虑到淮安县不算小，而那姓孙的姓名又可能颠倒混淆，范时绎猜想先前派去的两支缉捕队也许一时不易查到这名逆犯，稳妥起见，范时绎同时派出他的一名幕僚前往60英里外的安徽桐城，查明这名无论是叫孙用克，还是叫孙克用的是否确系桐城县人氏。一经查实，立即予以逮捕。

在车鼎贲和孙姓塾师还未归案之前，范时绎决定彻底搜查城内车府。他带上两江按察使亲自前往，把车府上下里外翻了个底朝天，按他上奏皇上的折子所言“，器用、图籍、书信”，无一漏网，以确定是否藏有叛逆材料。他们所获并不算太丰盛，但都非常有用。譬如，发现两札文书，其中有十首未署名的诗作。有一首诗题为“新岁偶书”，称宁乱惟天意等，字里行间含有贬低雍正作为君王的统治权力之意。不过最令人感兴趣的还是那本去年农历八月间，向车府老母拜寿之宾客的签名簿。这本宾客签名簿确凿无疑地证实了张熙的供词：张熙的姓名、表字与籍贯清清楚楚地记载在上面；这与张熙本人供称的去年访问江宁的时间是一致的。那次他是在拜访吕留良家族并购得吕氏遗著之后，

经过江宁的。不仅如此，那本签名簿上出乎意料地竟列有一个月前张熙所供出的两名浙江人犯的姓名：一个是张熙所称的精通兵法火器的严鸿逵，另一个则是自称为严的门生的沈在宽。

范时绎回府又提审车鼎丰：何以这两人会出现在寿筵上？车鼎丰解释说，那是情理之中的事：严鸿逵乃是颇有名望的儒士，这也是车氏兄弟结识他的原由。严车两家向来颇多走动，礼尚往来，严鸿逵应邀前来参加车府母亲的寿庆，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何足惊奇？也因为这层关系，车府还聘请了严先生以前的学生沈在宽为塾师。而那张熙就是另一回事了。车氏兄弟本不认识他，在合府应酬忙碌的那次喜庆寿宴上差不多没见他几面。不过说起来总是湖南老乡，严鸿逵又从中介绍，说他是来江宁购书的，所以多留他住了三日。临走时车府赠送了一两银子作为盘缠，还给了几件家里不穿的衣服。和这张熙的关系就这么多，并无隐瞒之处。

车氏兄弟中的老二车鼎贲于12月2日在淮安被缉拿收案，押回江宁。承审官耐下心来，将鞠审车鼎丰时问过的问题重新一一审过。车鼎贲的供词与其兄所招几乎完全一致。不过即使如此，他的回话在某些地方仍然透露了一些新的线索。譬如，车鼎贲供称，他们兄弟俩是在方苞府中初次与孙用克就是那位傲慢少礼的塾师相见的。任何1720年代的书生，尤其是江宁人，哪怕只是对文学略有兴趣，



都不会不知道方苞其人。方苞是康熙时代最著名的儒生之一，为桐城派散文的开创者，在康熙年间因《南山集》一案被投入大狱，几乎丧命。《南山集》是一本历史著述，后来却被人举发其中包含反叛思想，因而惹上麻烦。偏偏方苞为这个集子作了一篇序，于是一并牵涉进案。方苞最初被判应斩，后宽宥改判流刑，放逐至黑龙江。方苞最终获得朝廷释免，从此逍遥闲散，定居江宁，虽然其祖籍是安徽桐城。那孙用克也是桐城人氏，因而与方苞有同乡之谊。车鼎贲还证实，孙用克确实转到淮安任府担任塾师，不过现在已离开那里，因为他在今年夏末时突然染上了痢疾，无力再胜任教席之职，向东家告辞后回老家调养了。

车鼎贲非常固执，气愤地否认他与信使张熙有任何关系。除了在其母亲寿庆时与张熙有一面之缘外，再无其他瓜葛，既未见过面，也无书信往来，更谈不上策划谋反这种事情。12月6日，承审官员再次提讯车氏兄弟，但两人坚不改口，用刑也无济于事。车鼎贲一再老调重弹，说当今皇上德被苍生，天下皆知，他怎会有谋反的念头，莫非疯了不成？承审官一再逼问，为何他名列张熙所交待的谋反犯名单之上。车鼎贲又激烈抗辩道：“张熙从前来时原是漂流无定之人，实非相与也，无仇无怨。他在四处游荡，今将凡系知道之人，不论名号，任意开写出来。”张熙将孙用克的名字籍贯都弄错，

足以证明这是个颠三倒四的人。车鼎贲并挑战承审官，将他押往湖南与张熙当面对质，以示其所说确实不误。

车鼎贲提供的有关孙用克行踪的消息倒真是不假。孙当时已不在湖南，的确是在桐城，被捕后在严密看守之下，于12月8日被押回江宁。总督府官吏检查孙用克之后，证实他确实身患重病，于是慎重地记录在案。尽管如此，承审官并不因此心慈手软，审讯照样进行。但孙用克的供词并未提供什么新线索。他称自己一向是叫孙用克，从来不知道什么孙克用。他在车府学馆任塾师期间，从未遇见张熙其人，天晓得张熙是如何得知他姓名的。不过他与吕留良的学生严鸿逵倒是相当熟悉，而严也是车府的常客。至于所谓严鸿逵精通兵法火器，他倒是从未听说过。因为与严的门徒沈在宽先后担任车府塾师，所以两人互相认识，不过仅是泛泛之交。承审官拿出那首影射皇上的诗给孙用克看，孙立即辨认出是沈在宽笔迹无疑。但究竟谁是该诗的原作者，那倒不好说了。承审官质问，在他家中抄出大量地形图及天文地理书籍，又作何解释？孙辩解，所有书籍都是公开印刷、市面上有售的，并无特别之处。这些书是大约一年前购得的。

范时绎于12月11日向雍正具折报告案情进展。尽管孙用克与谋反名单上的孙克用不一致，令人有些疑心，但范时绎说，他仍决定逮捕孙用克。

当然，车氏兄弟将继续在押。如果皇上裁定有必要押往湖南与其他一千犯人对质，他将立即奉命行事。范时绎还奏道，车家还有一位长兄叫车鼎晋，曾任福建学政，现已致仕赋闲江宁。因为车鼎晋既不列于名单，又无犯案嫌疑，所以暂时未予逮捕。

雍正亲览这份密折时，未作行间批谕，但在折尾留下朱谕：“知道了。正犯皆在湖南，现任命钦差前往审理。凡有干系两江人犯咨文一到，可作速缉密料理，莫令兔脱生事。”

浙江总督李卫比范时绎晚一天收到廷寄及附件，时在11月24日。李卫的总督府位于东海之滨的商业都会杭州。雍正对两江总督范时绎信任有加，但李卫更是雍正的亲信大臣。雍正将江南各地盗案一并交李卫审理，这使他的权力延伸到两江、安徽的南部，也就是范时绎的管控范围。颇有意味的是，范时绎忙于三省事务，而李卫却只需操心浙江一省行政；这样一来，李卫帮忙帮到邻省同僚头上，倒顺理成章了。

要论到值得皇上信任，范、李两位总督可谓不分轩輊。如同范时绎一样，李卫也是一位精明能干、足智多谋的人物。他年近四十，高个、麻脸，并非科举出身——范时绎、岳钟琪也在此列——康熙末捐资为兵部中员外郎，其后平步青云。雍正登基后不久，李卫因十三爷怡亲王的举荐，得到皇上的赏识，先是外放任为云南盐驿道，次年，即雍正二年，擢

升为云南布政使。雍正不仅命他处理边疆少数民族事务，并且密令他暗中监视云南巡抚，向朝廷密奏其任内的言行举止，因为雍正对该抚台的忠心起了疑心。再一年之后，李卫再次获得重用，晋升为浙江巡抚。当时，正值雍正对浙江士民风俗极为厌恶痛诋，李卫既雷厉风行，又谨守分寸，与新上任的观风整俗使王国栋合作无间，整顿浙江风俗，颇见成效。雍正赏识李卫的干练与政绩，珍惜这个人才，所以有一段时期李卫病重，雍正竟索取他的生辰八字，让北京的相师算一算李卫的寿究竟有多大。那次的算命结果一定让雍正满意、安心，因为过不了几天，李卫又被擢拔为浙江总督管巡抚事，并于次年兼理江苏盗案及参与江苏军政举劾。显然，雍正正是以此不同寻常的提拔表示对得力亲信大臣的奖励。

虽然李卫只须逮捕谋逆名单上的两人而已，其任务却较范时绎更为复杂，因为他的使命不是那么直截了当，倒有点捉摸不定：他要对付的是吕留良批评时艺、托名讲学的传统，海内学子尊其著述的风尚；他要彻查吕氏及其后人散布反满思想的程度，以及信使张熙去年来访时与吕氏家人暗地下有多少交易。在雍正的忧虑中，这些乃是此案最重要的疑问。当李卫定心阅读上谕，稍作评估后，他觉得有稳操胜券的把握，于是召来亲信幕僚作一番布置。

李卫何以会觉得料理吕氏后人及吕氏藏书之事笃定无虞？原来他在两年前就办过类似案件了。1726年11月，他在浙江巡抚任上才一年，就接到雍正的急递上谕。该廷寄称，原籍浙江海宁、出身名门世家的查嗣庭任江西正考官时所出试题甚荒谬绝伦，案发被捕下狱。查系康熙四十七年进士，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查被控以四书中“大学”一章三节中“维民所止”为考题，居心叵测。因为这四字的头尾“维”、“止”二字正是雍正二字上边部首偏旁。换言之，查氏暗示考生朝砍皇帝脑袋这面去想。搜捕官员已经没收查嗣庭所携带的全部书籍及用品，正在分门别类地细细寻找有关罪证。雍正密谕李卫速速赶往查氏海宁祖宅，彻底搜查其中是否藏有叛逆书籍。

李卫立即奉命前往查府。这一趟可谓不虚此行，让他学到了如何对付出乎意料的局面：当晚查府正举行盛宴，到处是醉醺醺的宾客，屋外河边则停泊着客人的乘舟。当然他更实地学会了怎样仔细地去发现罪证：书架书柜、抽屉箩筐、衣里夹衬、橱边床角，乃至瓶瓶罐罐，都可能密藏机关，隐匿叛逆铁证。雍正亲下谕旨褒奖李卫及江西缉拿队搜证有功，查获两部“悖乱荒唐怨谤捏造”的日记。此外还有蝇头小楷的考题及答案，写得密密麻麻，缝在折叠整齐的上衣内角，看来是准备送给浙江举子，使其得以名列科举首榜。查嗣庭的日记充满讽

刺时政的话语，如称国子监培养出来的官吏学无所用，阿谀奉承；又对其官职语不恭敬。总之，长长短短的各式文字充满了作者对所处之学界的蔑视，对今上及先帝所颁之文化、司法政令的讥讽。雍正谕令，将查嗣庭斩首。因查氏已于鞫审期间死于狱中，乃将其戮尸梟示，其子查潭应斩监候，家属流放边地，其家产尽数充公作为浙江海塘工程费用。

查嗣庭案紧接于年羹尧府邸查抄出汪景祺悖谬狂乱的《西征随笔》之后，这更使雍正坚信浙江一省风俗人心确实可恨。为了惩治这些士大夫的傲慢轻蔑，雍正斥责“浙江风俗浇漓，甚于他省”，其地方人士乃“恩德所不能感化者，狼子野心聚于一方”，特设“观风整俗使，派遣光禄寺卿、河南学政王国栋为浙江观风整俗使，以查问风俗、稽察奸伪，劝导纠正其归回正道；又命停止浙江士人三年一期的全国性乡会试，以为惩戒士子生员挟笔墨之微长，忘纲常之大义。雍正言出必行，1727年的会试中无一浙江人中举登科，而上一次的1723年科举考试中，共有三十五人获得进士资格。这样的举措及结果当然令浙江全省士人垂头丧气，但对李卫的官运却有益无损。

查办查嗣庭案的经验使李卫对于雍正眼下的心思非常清楚：皇上已经将吕留良等与一念和尚、文人汪景祺，及考官查嗣庭等浙江人列为一伙，无一不是浙江风俗浇漓的体现。几星期之前，信使张

熙在西安交待，他曾于 1727 年赴浙江吕留良老家购得吕氏的著作，包括《备忘录》、《吕子文集》，以及诗作《钱墓松歌》、《如此江山图歌》等。李卫已有一份岳钟琪密奏的抄件，上面记载了张熙关于吕氏的供词，以及岳将军敦促雍正下令李卫尽快彻查吕氏祖宅及藏书，以免吕氏后人隐匿任何罪证的建议。如今，这些建言已成为来自雍正的严谕，李卫当然不敢有所闪失，使吕家有任何机会销毁上述的吕氏作品及其他类似著作。

1728 年 11 月 24 日深夜，李卫读完皇上急谕后，立即召来三名亲信到总督府衙。其中两名是军官，另一位是管辖位于大运河边石门县的知府，因为吕氏族人就居于石门县。李卫向他们交待任务：要逮捕的两名谋犯分别叫严鸿逵和沈在宽，住在杭州城外西北约 40 英里的一个镇上。虽然严氏号称精通战略火器，也许会增加一点麻烦，但缉捕这两人还不算是复杂的事情。关于沈氏并没有特别交待，只说他是严的门徒。

同时，缉捕队要在不引起一丝慌乱的情况下，设法进入吕氏祖宅。石门位于杭州东北 40 英里外。既然李卫要既捕人又搜书，他就不能兴师动众地命令侍卫、兵马去包围吕宅，否则吕家会警觉到事情有变，必然要毁书——那是很容易的事，水火尽可轻易毁掉藏书。那李卫可担当不起。李卫想出一计，决定以欺骗手法堂而皇之地进入吕家：缉捕官先隐

瞒其身份，假称来自京师内廷史馆，特地前来拾遗补缺。他们还应告诉吕氏家人，将用现银购买珍本，特别是《备忘录》、《吕子文集》两书。在进入吕宅并藏书楼后，继续表示对任何珍藏的珍本古籍的兴趣。只有在掌握全部线索之后，缉捕官方可亮出身份，并将吕氏后人悉数逮捕，押往总督衙署质审。

缉捕队不费吹灰之力就先行逮捕了严鸿逵和沈在宽，而后在带队长官吴统领率领之下，前往石门，干脆利落地完成了余下的任务，立即回秉李卫逮捕的前后经过：吴统领等于11月26日抵达吕宅，受到吕留良的两个儿子、几个孙辈及姻亲的接待。吴统领解释身负修史撰著的使命，而吕氏家人也深信不疑，将他们迎入内室，展示由吕氏家族收集整理并出版的二卷《备忘录》、两部不同版本的《吕子文集》。此外，更有三卷尚未刻版的吕氏其他文稿、几札未发表诗歌、各种礼制论注，以及家礼记述。还有总共六卷笔记和日记。确定他们已掌握所有重要文件，吕氏家人再无机毁坏藏书，吴统领立即宣布其真实身份，没收所有著作、手稿等，查封整个藏书楼。所有吕氏宅内男性成员，总共七人，全部被拘留并押往杭州候审。

吕留良生有九个儿子，而接待缉捕队的正是其仅存的两位。李卫立即开审。每次审讯时都有浙江第二秩位的大臣高斌在座。高斌兼任布政使、按察使二职，虽然官低李卫一级，却在某种程度上与雍



正更为接近：他曾在宗人府任职，出任多项密使，而其女儿又是雍正的一位受宠阿哥的嫔妃。

吕留良仅存两子中较长的一位是家中的老四，时年 68 岁。但此人对案子实在没有任何帮助。他说：“吾年老无子，只在家里的。上半年八月里有湖广人张熙到我家来访父亲的遗书，我九弟吕毅中留他时我也见过的，并没有说谋为不轨的话。”

不过吕留良的九子吕毅中却为承审官李卫等提供了丰富的消息。他证实其父逝世于四十五年前的 1683 年 10 月 3 日，其曾祖父早些年间娶了明皇室旁系的一个女子为妻。吕留良于

1654 年，因为未通过当年考试，而失去了功名。尽管如此，其父亲从未放弃学术，其作为理学家的名声远播海内，非仅限于浙江一地而已。虽然父亲本人科举失意，但却努力教诲诸子，除早殇的二子之外，使他们全部获得了功名。就在吕留良去世二十三年之后，其长子吕葆中于康熙年间考中进士，名列榜眼，为全族挣得无限荣耀。吕葆中随即获钦命入选翰林院任编修，专研儒家典籍。不过吕葆中两年后即因病离世，从此吕氏兄弟再无一人能在科举会考中榜上有名，但于康熙五年即年中秀才。

吕毅中继续说道，吕氏家人非常清楚，父亲名声远播，所以对张熙从湖南远道而来索求吕氏遗书及手稿这种事，毫不感到惊奇。许多年之前，吕留良本人办了一家书店，叫做“天盖楼”，至今仍然

由其后人维持经营。书店刻印并出售各种吕氏著作，虽然那诗稿和日记尚未刻版。不过遇到索求时，他们也向来客展示吕氏的这些未刻手稿。张熙就是属于这类求访者。吕氏家人接待了张熙，并且当后者表示，非常渴望见见跟从吕氏精研宋儒理学的嫡传弟子后，就告诉了他吕氏尚存的一个学生严鸿逵的姓名与住址。当然，承审官知道，严鸿逵就是谋逆犯中的一个要角，已然被逮捕归案。

李卫追问《备忘录》、《吕子文集》，以及包括《钱墓松歌》、《如此江山图歌》在内的诗集的具体出处和流传途径。吕毅中答道，其父亲的著作手稿四十多年来流传极广，并无定踪。当地儒生学子借阅，姻亲抄传，有的另成一册后，内容也被改动，有的更添加序言。所以《备忘录》至少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当地亲友编辑，另一个版本则是由严鸿逵从其老师日记之中钩稽而成，并由他保存在杭州寓所。《吕子文集》是由外人自行出资刻版印刷的，恭敬地冠以“吕子”，有与孔孟朱熹等贤哲大儒并称的意思，这可是吕氏家族所不敢称呼的。

不过上述著作也还有一些手稿本流传。《钱墓松歌》、《如此江山图歌》是吕氏很久以前所作的，曾经编入一本 1670 年代的诗集，该诗集收入名流诗作，由吕氏的一位友人编纂，此人恰巧也是《备忘录》的编者之一。最后，吕毅中对李卫等慷慨陈词：“我家兄弟子侄都在本朝做官进学，并没有一

点异心的，总是张熙来问我家书籍时，不合将父亲的诗稿日记与他看，这是我该死处了。”李卫和高斌对此都不去批驳。

吕毅中的口供所描绘的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书香门第，并在清朝苦心经营，以维护其名声不坠。在继续的审讯中，吕氏长孙吕懿历的供词更加深了李卫等人的这种印象。吕懿历正是康熙年间高中榜眼的翰林院编修吕葆中的长子，刚于 1723 年考得贡生资格。比起秀才资格来，贡生在科举上更进了一步，但得来十分辛苦。他说，他做梦也没想到会获得这份功名，因为在他父亲去世后，他被指控为那个自称前明皇帝后裔并率众谋反的一念和尚的同党，家中在 1708 年间被搜查了数次，并逼问他有关其先祖与明皇室联姻的往事，要他供认其先父是否卷入那场谋反。但他从未招认过莫须有的指控，即使面对朝廷派来平靖叛乱的钦差大臣亦不曾改口。最后他被严刑拷问，并与指控他的俘虏当面对质。但他坚称从未见过那名谋逆者。可幸的是，朝廷相信了他的口供，最终将他免罪开释。吕懿历说，从此之后他只在书斋苦读，并不过问他事。他既不认识张熙，后者前来吕宅拜访时更不在家中：“回来听说是九叔吕毅中见他、留住宿的。两人如何说话，我不知道。”

李卫命人从总督府旧档中翻出了 1708 年关于吕懿历的案卷，发现一名叫做穆旦的满族钦差写的

公文。穆旦记载说，他确信吕懿历并未说谎，下令撤销了对吕的所有指控。李卫从吕懿历最后的话语中似乎嗅出了一丝其对九叔吕毅中的不满，也许是愿意与官方合作的意向吧，因此本能地采取了又一新的行动：他下令一位幕僚押送吕懿历回到石门县吕宅内已被查封的藏书楼，再作一遍仔细搜索。结果，吕懿历在满室的著作手稿中剔爬搜罗，竟又查出其祖父的一些诗作、几卷日记。

除了严审吕氏后人中三名年长的嫌犯之外，李卫又提审了谋逆犯名单上的另外两人，即严鸿逵和沈在宽。严鸿逵从一开始就十分合作。他供称时年七十四岁，至今只是一介生员，但他的两个侄子则高中进士，分别获得朝廷授职。那么其姓名怎会列于谋逆犯名单之上，对此他倒似乎有其合理的解释。李卫在奏折上说，严氏称自己“无子无孙，在家教书行医。向日与曾静从不相识”，而后“，雍正五年八月内有湖广张熙来访其师吕晚村后人书籍，自吕处到伊家求道，称系曾静门人，伊师在楚讲学，有徒二十余人，称为蒲潭先生。张熙以孔子拟其师”。严氏又说，虽然张熙急于向自己讨教，尤其是儒家经典如《周易》、《尚书》等，但他对此人印象不佳：“见其学问平常，未免有讥贬之语。”

严氏继续供称，阴历八月十一日那天，张熙向他辞行，说要往江宁访友。严鸿逵虽然对此人并无好感，但出于礼貌，或许是由于他的离去如释重负

吧仍然向张熙介绍了以前的一个学生叫沈在宽的，那时沈正在江宁一家姓车的府中担任塾师。严氏并告诉张熙，车氏兄弟原籍湖南，才迁居江宁未久，也许会看在同乡份上善待他的。因为心中对张熙粗糙浮饰的学风不以为然，严氏认为让他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治学之道很有必要，而那沈在宽向来以严谨著称，正可为张熙的楷模。严氏称他与张熙之间的谈话从未涉及任何忤逆阴谋，都是中规中矩的。话题多限于讲论儒学典籍，或者略作讨论，不过仅限于张熙所能理解领悟的程度，并不深入。最后，严鸿逵向李卫等求告说，其向来忠于大清王朝，从无贰心。事实上，雍正初年，大学士朱轼曾保荐他赴国史馆修明史，只因突患重疾才未能成行。

李卫做事一向精细周全，虽然他并不怀疑严鸿逵的交待，但还是命令幕僚核实。结果在严氏日记中找到张熙于阴历八月五日前来拜访，盘桓至十一日辞别的记载。在浙江巡抚衙署的旧档中，则发现当时浙抚回复礼部的公文，谓严氏以病重不能赴任。至于严鸿逵精通战术火器的说法，很显然，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他并无真刀实枪的本领。

李卫等接着提审沈在宽，就是颇为其师称道，后又以倨傲被东家辞退的那位塾师。沈在宽供称，确曾于去年八月间在车府担任教席时见过张熙。因为张熙手持严鸿逵的介绍信函，所以他和东家一起热情接待了客人。不过他很快就得知此人并非认真

严肃的求学者：他对古籍精义理解肤浅，并未深得其中三昧，信口所论却无法引经据典。张熙在车府住了几天，宾主之间并不见怎么投机。张熙离开时，他向客人馈赠了一把约值三四两银子的铜板，以及几首他认为张熙或许感兴趣的诗作。

随后沈在宽对被捕并遭审讯提出抗辩，坚称如此浮泛的交往何以证明他与张熙有阴谋叛逆行为？他身为生员，禀奉皇粮二十余年，期望有朝一日效命朝廷，有什么理由去谋叛呢？是的，他确实拥有一些天文地理及医药方面的书籍，但是这乃是他兴趣所在，并非冀图经世致用。显然，沈在宽和严鸿逵一样，深知官方早已彻底搜查其住处，抄走了大量的手稿、日记、诗作，从随手涂抹到精心撰构，无一不包，当然还有吕留良的各类著述。李卫令他将赠别张熙的两首诗一一默出，与其他供词一并存档。

1728年12月2日，李卫审完了这一批人犯，于次日将鞠审所得的关键性证词写成一份密折，交其下属黄副将送往京师。李卫禀报皇上，因为他在学术上尚难称专精，因而对所抄没著述的文学与理学意味难以下判断；不过就他目前所知，似乎不少被指为危害甚巨的文章与过往几百年来的人文撰著，包括宿儒大师的著作，相差无几。也许，最大的分野在于，吕氏家族中的儒生以及那些吕氏的友人或后学，皆以根究理学为幌子，探索、散布异端

邪说，而非鼓励、引导世人追求道德完美。

送出密折三天之后，李卫又做出了一项补充性的决定：他将五名在他看来最具潜藏危险性的人犯置于一队特遣官兵的严密守卫之下，押往北京，以便由刑部官员再作细审。这五名由张熙在浙江和江宁的行踪而牵连出的要犯分别是：吕留良尚在世的二子，吕氏的长孙，吕氏的最后一个弟子严鸿逵，以及严氏的得意门生沈在宽。李卫挑选了一大批从这些人居所搜出的书籍，包括其本人著述的印本和手稿，及各类其他书籍，一并送往京师。不过正如李卫在另一份密折中告诉皇上的那样，要将所有为他所拘捕或锁定的吕氏族亲一同押送京师，那简直是不可能的，因为所涉及的人数急遽增加：一开始确定为七人，随即增加到二十三人，分布于七个不同的家庭；这个数字还不包括早年离家现居于外地的家族成员在内。因此，李卫决定将这些人等及其家属、财产置于看管之下，等候皇上的进一步谕示。同样，吕氏藏书楼卷帙浩繁，根本无法全部送往北京。因而，李卫已命石门县令率领一个四人小组进驻藏书楼，有条理地仔细鉴别所有著述。所有古籍刊本将先审查并封存、记录，然后再检视、登记各类手稿。所有手稿将送总督府由李卫本人亲自阅读、甄别，然后送往京师宫廷，供皇上圣览。

那天，正当李卫随船检视河工，督导水利及防洪事宜的时候，北京的快驿急急送到两包来自朝廷

的包裹。其中一个 是雍正亲赐的来自中国西部的哈密香瓜，另一份则是包缠黄缎的奏匣，内藏曾静逆书全文的副本，其内容、式样与六个星期之前，由张熙呈递给岳钟琪的那份原件并无丝毫差别。雍正皇帝恩赐赏物给亲信大臣以示天恩龙宠，这本是寻常。然而，这份双重礼物却恰如其分地象征了李卫的境遇和使命：一面是皇上对亲信大臣的厚爱与信任，另一面则是叛逆者纯粹而完整的狰狞面目。

## 第四章 湖南查案

署吏部尚书、副都统觉罗海兰将军携带寄信上谕及嫌犯名单，由北京出发，一路行来，至 11 月 28 日进入湖南省城长沙。穿过高大耸立的城门进入内城，海兰直趋湖南巡抚官署。稍作寒暄，海兰与湘抚王国栋进入正题，商讨通缉追捕方案。他们面临的 任务颇为棘手：在一个幅员广阔的大省同时缉捕七名分散的犯人。更为困难的是，一旦离开繁华的长沙城南行，所见的基本上就是一个荒僻的边省了：深谷急流，崇山峻岭，其间则是无数阻绝难通的集镇和孤立散布的村落，还有苗民居住的大片而疏落的耕坡地。根据张熙在西安的供词，主谋曾静及张熙本人的家人都住在湘东南山区，也就是地形最为险峻的地区。这是海兰与王国栋目前所知有关谋犯行迹的惟一线索。

这种地理上的细节因而很自然地成为海兰与王国栋商对追捕方案时的重要考量。一如中国的其



他省分，湖南也划分为一些州、府，其下又各有数目相当的县，由朝廷直接任命的知县管辖。县再分出较小的行政区域“都”，名义上由驻当地的税吏监管。再下就是散布的村落了，各由获当地政府任命的头人负责维护治安。由海兰带往长沙的公文显示，主谋曾静就蛰居于永兴县蒲潭村。巡抚府档案表明，永兴县距长沙陆路为 190 英里；从地图上看，水路较为容易，但河道曲折，因而实际上更为遥远，达 350 英里，还得加上逆水行舟之难，因为湘南的大河都是流向北方的扬子江及其支流的。

永兴县一共有二十个都。虽然蒲潭村本身并未显示在县区级地图上，资料表明，它坐落于山峦起伏的第十九都，位于该县东北角。第十九都距县城 25 英里，路途崎岖难行，但距张熙及家人所居住的安仁县倒相当接近。永兴县只驻有大约五十名兵士，由一名把总指挥。要想扑灭一次武装暴动，这些兵力恐怕太微不足道了，而且还有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之虞：难保这些本地出身的兵士不会把朝廷兴兵进驻的消息透露出去。显然，必须从省属驻军调兵遣将，并与永兴县令密切合作，撒下天罗地网，捕捉曾静。

张熙在安仁县的家较容易确定。在他的供词中，张熙不但向岳钟琪招认其全家居住在安仁县鹏塘村，而且给予了具体位置：鹏塘村坐落在连接安仁县城和紧邻郴县之中心线的东南边，离安仁县城

40 英里，距郴县仅 7 英里。对于制定围捕计划的海兰与王国栋而言，鹏塘村离曾静蛰居处这么近可能意味着其他麻烦：即使曾静或张熙家人尚未得知张熙在西安被捕及受岳钟琪奏折的副本上写得很清楚，张熙的堂弟张勘惊慌之下先期逃离西安。张勘此刻也许早已回到安仁县了，张家也知道了他不告而别这件事。无论如何，在鹏塘村围捕张熙家人而不使风声传到曾静住的蒲潭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反之亦然。

11 月 28 日晚上 9 时左右，海兰与王国栋终于商定缉捕计划，并派定任务。七名逆犯分别分居于该省三个不同的位置：东南地区三人，最南部二人，北部近扬子江的洞庭湖畔地区一人。虽然曾静和张熙家人住得相近，一支缉捕队就可以将此两家一网打尽，但考虑到人犯的重要性，为求妥善起见，海兰与王国栋仍派出两队分别执行任务。因此，总共组成了四支缉捕队。往永兴县缉捕曾静的一队由随海兰赴湘的韩守备率领，湘抚麾下抚标中军游击及另一管辖永兴安仁两县的文官协助；其他三队也分别由官阶相当的湖南文武官员率领，其中前往鹏塘村逮捕张熙家人的一队由长沙知府亲自带队。

接下的四天里，海兰与王国栋十分忙碌：各队必须作好充分的准备，进入行动位置；必须确保所有一切可用以缉捕的资源都充分可用、安全可靠。当然，两人也颇感紧张，这也是很正常的，因为他

俩从张熙的供词中得知，湖南民怨激昂，弊病丛生，而人数不详的百姓又意图揭竿而起。其他危险也四处潜藏，譬如有谣传说，白莲教以获得永生拯救的宗教教义为号召，在本地深得人心；神秘道教组织鼓动信众，其信仰糅合无为和激进，相反相承，因而行动和情绪难以预测；苗民散布于全省各个角落，而品行不端的汉人又杂居其间，寻机生事。

12月1日，缉捕行动准备就绪，前往湘北的缉捕队已经与洞庭驻军彼此协调行动步骤；开赴湘南湘东南的三支队伍也与驻衡州的较大规模省级守军取得了联系。湖南巡抚王国栋的命令十分严厉，不容丝毫差错：务必“多带兵役”，在各地“谨密搜拿”。他并密令人犯所在的四个县及邻近各县的知县，所有兵力进入高度戒备状态，随时准备防范可能爆发的动乱，或对付突然出现的谋叛者同谋。而在所有的县之中，尤其以永兴县最为要紧。永兴县令姓戴，山东人氏，进士及第出身，素以办事干练、善解疑难著称，对破解凶杀案尤其有独到手段。王国栋派出一名扈从前往永兴，特别向戴县令通报了案情，而后者也立即采取行动，以防曾静逃逸。

缉捕行动最终从安仁县鹏塘村展开。至于为何先对张熙家人着手，也许是出于某种史料并未记载的地方上的原因，但更可能考虑到，比起蒲潭村来，该处兵马较易通行。海兰与王国栋决定，于12月

2日先捉拿张熙家人，一旦事成，两天后再前去逮捕曾静。结果，第一步行动相当成功，张家被迅速包围，人犯全部就擒，并未遇到任何反抗。事实上，张熙的堂弟张勘恰巧就在前一天刚刚经过长途跋涉，返回鹏塘村家中，而其族亲应该就他走遍大半个中国的事问过他什么了。不过，即使如此，似乎并未引起人们多大的注意，而他也确实对自己逃离西安后张熙的所有遭遇毫不知情。所有张熙家人被围捕之后，三名主要成员，张父、张勘及张熙的长兄，在严密监护之下经水路押往长沙，其余成员则监禁在县监狱。张家家产被悉数查封，并立即展开仔细搜索，抄没宅中所有文稿及其他财产。

前往永兴县蒲潭村逮捕曾静的缉捕队于12月4日进入行动位置。整个行动同样进展迅速，并未遇到多大麻烦。不过该次行动原本可能不会那么顺利，因为那曾静是所有谋逆犯中惟一个对被捕早就有些思想准备的人，并至少在口头上作了一番抵抗不从的姿态。也许他听到了一些兵丁在本地调动的消息，或张熙家人被捕的风声（尽管官府防范紧密），也许他听说了张勘独自回到安仁县的事，也许是宿命地预想其事终将败露吧。

据一位缉捕官员的报告，当他们闯进时，曾静大叫：“蒲潭先生卒于此！”看来，他决杀身成仁，或许，是有意自杀但为缉捕官兵所阻拦而未能成功。不过，按海兰的具折所称，曾静的企图未能得

逞的原因还是“幸赖皇上威德，天夺其魄”。缉捕官兵还发现，曾静在衣衫上竟绣了一副对句，夹衣上也有几个字，自称“渤潭得道先生（“渤潭”是蒲潭村的别称）。乡间风俗，老人的寿衣上常常绣有姓名故里，以便在阴间易于识别。

蒲潭先生曾静终究毫发无伤。而且，他的全家，包括他的老母和两个儿子全数被逮捕并由戴知县押入县大牢（曾妻已于几年前病故）；人去楼空，曾宅也被官府查封。曾静本人则在严密看守之下解往省府。缉捕官兵花了三四天从长沙奔袭永兴县蒲潭，但回程却得十分谨慎，以防有人劫牢，所以总共用了十一天才将人犯押解回长沙。当然，一路上仍然平安无事。曾静押到长沙时，所有其他人犯已经全部在押，海兰、王国栋等正对他们进行审讯。

既然主谋归案，海兰、王国栋立即中断其他审讯，转而鞠审曾静。曾静面对钦差大臣和封疆大吏，开始了他的供诉：“我年五十岁，是永兴县人，系生员，考了五等，革除。这上书的事是我数年前的想头，立定志向，今年同学生张熙商量做的。张熙典当了屋和塘，设措盘缠。是今年五月初七日起身，那张勘是我叫他同张熙去。”审承官员问，为何叫张勘同去？是否因为他也是一个读书人才让他与张熙结伴而行？曾静断然否认：“那书中讲的话必要有学问的方与他商议，张勘是个没学问的，我如何肯替他讲？他不知道的。”那么张熙的父亲张新

华是否知情？”就是张熙的父亲张新华只晓得他儿子往川陕去上书，那书里的事情他也做不得主。永兴有学问的人少，我在山里住，离县城远，并不相与人。”

既然曾静提到相与交往之人这个话头，承审官顺藤摸瓜，问曾静有哪些人对身居穷乡僻壤的他有影响？曾静回答，有一位刘之珩先生，是他在乡校读书期间的永兴县教谕，学问甚好，精擅性理之学及天文历算，深得他的敬重。不过刘先生是贡生出身，拘泥于儒学义理及礼制，对他颇有些离经叛道的解读很是恼火，曾大大地训斥过他。刘先生目前退休家居，住得很远，所以即使他想跟从先生学习，也难得如此机会了。刘先生有一位姓沈的弟子，学问也极好，目前与先生结庐为伴。

此外，还有一位本地的学者叫谯中翼，虽然素不相识，但曾静拜读过他的文章，颇有深度；曾静万分渴慕能与这样的学者切磋交流宋代大儒如程氏兄弟、朱熹的道德文章。曾静不无感慨地告诉承审官他何以会在偶然读到吕留良的著述之后，深受震动，佩服其对理学硕儒的精辟分析。相比之下，惊叹以往所见之著作的浅薄。“我心里慕他，去年张熙曾到浙江访他的书籍回来，知道湖州严鸿逵、沈在宽是吕晚村渊源一脉，必定有学问的了。”

曾静继续招供说，他和张熙就上书劝岳钟琪造反之事商量了多次，深感一旦事成，若能说动那些

知识卓著的学者共襄盛举，那将裨益无穷。不过实际上他从未与其中任何一人谋面，并无同谋的事，也没有什么党羽。至于曾静在永兴县的那些学生，时时接触，他确是有机会灌输他的想法的，但是“平时讲道理他们知道的，上书的事他们并不曾同谋。总是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肯赖，也不好诬扳别人的。”那么在其手稿《知新录》中提到的儒生呢？曾静承认书中列举的志同道合者虽不在少数，但其实大多不认识，有些线索根本就过时了，譬如那位九十六岁的安徽学者早已不在人世；但也有些线索令人寻味，如文中提到的某个儒者就是曾静购得的《吕子文集》的编者，另有一位对吕留良极为崇拜，曾像张熙一样，远赴吕氏故居购书，竟花了八十两银子。

海兰将军盘问道，既然从无阴谋和事先约定，如何解释“六省一呼可定”之说？曾静答说：“这是我同张熙商量，看见时疫流行像个天心不顺，想来天心是一样的，故如此说，并没有成见。”

不出意料，其他六名因为曾静而被卷入该案的湖南人对曾静本人没有什么兴趣。曾静和张熙曾极力赞誉的从前的老师、于1713年至1723年间任永兴县教谕的刘先生，说他学问精深，通晓军事天文之学。但六十岁的刘先生无论是对自己的学识水平还是对学生的判断力的评价都十分一般：“因幼习《尚书》，略晓得些星象图书，哪里知道天文？

至《八机握阵图》，俱是先贤朱熹成语，之珩篆刻起来教武秀才的，何尝知道什么兵法？”曾静以为读了这些常识便是有专家之才干，行家之能耐，真是极大的谬误。倘若不信，尽可去详究那些著述。海兰等将刘之珩的几本著作取来查阅，果然看不出任何离经叛道的学说，更谈不上谋逆思想了。刘之珩的学生沈氏也断然否定与逆书有任何关系，称对此一无所知。

至于更为曾静敬仰的本地学者谯中翼，对曾静乃至刘之珩都颇具有疑心。他自称年逾七十二岁，曾为贡生二十八年，稟食皇粮，今年因贫病交集，未能通过考试，失去了贡生资格。谯中翼说自己从来不曾为官，也并不喜游历四方，平时只以读书、教书为事，生性又恬淡孤寡，是崇奉独善其身的一类。他并诉称，曾静、张熙师徒在其离家数日之间，竟到他家中取走若干藏书去抄写，真不明白他们何以做出这等事来。而那刘之珩虽略通文墨，却并非学术造诣深厚之辈。他曾应刘氏邀请为其写过几篇序文及应酬之作，仅此而已。最后他说：“若不信，只求拿这些人来与我对质，再着两个人扮作我，叫曾静等认指谁是谯中翼，我这冤就申了。”

尽管这年逾七十的老者再三声称清白，官府仍派人彻查其藏书及其他宅中所有。结果，虽然并未发现任何哪怕是细微的罪证，却搜到一幅画，看起来像是明太祖像，上面题了一首诗。审讯官员质疑



这诗的来历，譙中翼辩称，自己根本就不作诗，而此诗则是数百年前当地一位文人的作品。

与本案最有涉连的则是张熙的三位家人：张熙的父亲、兄长及堂弟，此三人都列于最早的十三逆犯名单上。张熙被捕后的一二天内誓死不吐露其父的姓名住处，后来岳钟琪假意盟誓，才从他口中套出实情。如今，这些家人全部被拘捕，由湖南官吏随意审问了。

张父尽管老病缠身，但对他儿子及曾静等谋逆人犯却有洞察的见解。他说今年六十岁，曾于1695年二十八岁那年获准入乡学就读，后来因考试失利而失去生员资格。不久前他将原名张仕璜改为张新华，张熙是其次子。张新华谈起张熙言语间颇为苦涩，张熙“从永兴曾静读书。近来见他大言不惭，我赶他出去，他就住在曾家。今年回来当了房做盘缠，说要往川陕上书去。我被曾静所愚，儿子做这样不法事，我不能管束，就该死了。”后来海兰和王国栋稟奏皇上说，他们极欲从张父口中获得更多消息，但见他如此孱弱不堪，如果用刑再问，恐怕不是当场死于刑下，就是因绝望绝食而死。考虑到他此时死去对案情并无益处，所以暂且搁下不再鞫审，但置于按察使的严厉监管之下。

张熙的兄长张照回答承审倒是干脆利落。他说：“张熙是我兄弟。这两年通在永兴曾静家住。我只晓得种田，他们做的甚么事我不晓得。”承审官将他的

供词记录在案，并未进一步严词鞫审。但当承审官提审张熙的堂弟张勘时，却获得了许多新的情况。张勘一度称曾静为师父，并对张熙的医药知识颇为仰慕。这年五月，张熙及其兄张照来到他家，以数两银子的代价，请他与张熙结伴前往川陕，并挑担行李。他们允诺他“前头有好处”，但张勘并不明白这话里的意思。不过他还是承应了这件差事。张熙和他于1728年11月16日到了陕西后，张熙就立刻差他到周文王陵墓去采些墓顶生长的耆草，说那用来占卜是最灵验不过的。但张勘十天后赶回西安，却得知堂兄要亲自向川陕总督上书，不禁惊骇万分。他心想这等事情是弥天大罪，他要留在西安必然一同遭殃，于是不敢逗留，慌慌忙忙地抢过铺盖卷，不辞而别。张勘在应审时还加了一句“不知张熙后来怎样了”。张勘一路南行，水陆兼程，三十六天里走了600英里，于12月1日平安回到老家。不过只过了一晚，就案发被捕了。

张勘最后求告道：“这些事总是曾静、张熙做的，我实不知情，求超豁。”承审官们怀疑他的口供尚未吐露全部内情，便加以刑杖，但张勘并不改口。

当所有审讯在进行之中的同时，海兰、王国栋又派出搜查队到所有被捕人犯的家中细细筛寻。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张家在所有的鞫审中，都一再地坚决否认对逆书和曾静的著述有任何牵涉，在张家

中仍然搜到一些重要物证。搜到的罪证不仅包括曾静的两本著作，即《知新录》和《知几录》，以及告天祭祖的短文，更赫然见到张熙在西安所投逆书的底稿！张熙都因投书而下狱了，何以张家仍然将这些大逆不道的文字密藏在家呢？

于是再次提审张勘。面对这些书籍文稿，张勘不得不承认都是他从西安带回湖南的。不过他只是一时糊涂而这样做了：是张熙将它们带往西安的，为了掩人耳目，张熙将书本和信都藏到了他的铺盖卷里。而他在惊慌之下只顾急急逃逸，哪里想到里面还藏着书本什么的呢！张勘说：“书上说的话我不晓得。”并求官府去问曾静，以求撇清。承审官也确实再度提审了曾静，后者全力承担责任，说：“书上的话俱是我做，就把与张熙的，我岂有赖？”海兰、王国栋在呈具雍正的折子中禀奏说，所没收的二书荒谬绝伦，危言耸听，阅读之下既惊且恶，实在不敢径直随折发往京师。他们已将书籍密封，请求皇上恩准，将其一焚了之。不过《知新录》和《知几录》本身并没有透露任何新的逆犯。因为急于向雍正报告案情进展，海兰、王国栋于12月中旬写了密折，派湖南的一名军官送往北京。雍正一收到来自湖南的折子，就将消息传给远在西安的岳钟琪将军：“大奇事。张勘到家次日已被钦差差役拿获。凡张熙开列名单所有之人，一人未曾免脱，皆就擒矣。谕卿喜之。”

从给岳将军的这封上谕来看，雍正对于案情的进展似乎还颇为满意。然而，雍正并未与远在湖南的钦差大臣及湘抚分享这种心情。事实上，皇帝对于湖南办案官吏的审案能力已经有所担心，故于12月3日决定，派遣比年老的海兰将军和前观风整俗使王国栋更精擅于审案的人前往湖南。雍正的人选是镶红旗出身的满族官僚杭奕禄。杭奕禄年轻有为，专擅处理细微交涉，最近才被擢拔为刑部侍郎。雍正在这天召见杭奕禄，向他介绍案情及一套审讯方案，该方案与以前授意岳钟琪的三部曲有异曲同工之处：杭奕禄到长沙后应竭力宣扬先帝圣祖康熙及当今皇上勤政爱民，为国家带来的升平繁荣，以此打破曾静的心防；敦促他解释其所倾心的那种反政府激进方式于国于民有何裨益；但归根结底，最为紧要的是，尽力追查曾静等人犯所相信并加以散布之叛逆言论的根源。审案必须耐心，有条不紊，不放过一丝线索，无论线索是来自人犯的口供还是查获的叛逆书籍。雍正并向杭奕禄传达了给王国栋的口谕：王国栋即湘抚之职甫及一年，何以湖南地方人民竟顽逆至此？着王国栋倾其全力整顿湖南事务，挽其坠入不法，以赎其松懈怠慢之愆！

杭奕禄于12月26日抵达长沙，传达圣旨。三位大臣立即按照雍正所指示的策略，重新开审。曾静再次被提审，而且是在湘抚衙署内看守严密的厅堂之内。杭奕禄等向曾静宣扬皇上的恩德，并威

胁利诱，称曾的生死就操在他们手中，一再施压，要曾静解释其荒诞言行背后的真正动机。在杭奕禄的深究之下，曾静的一些供词似乎有些说服力。他说，《知几录》可以说是给张熙北上西安时之遵嘱的扩展：“当日遣张熙前去，实系独得之秘，毅然而行，既非他人所能参赞，亦不屑与闻他人；且自以为成固有利，止亦无害。故《知几录》内谆嘱张熙一路访问，如所闻与在家所传不合，即回来另作主意，不可轻举。原非预有邀约谋定后行，实无同党，有书可证。”

杭奕禄等得了这个口供，又去把所有被捕人犯以及曾静所著二书中提到的人，无论是谋逆犯还是潜在的同谋，全部再作提审。结果，这些朝臣不得不承认，曾静所供可能并无虚枉。没有任何在审人犯承认其知悉曾静在著述或逆书中所提及的任何事情。

但是当被问及其根本动机以及策划叛乱的确切目标时，曾静的回答虽然在某一程度上令承审官有些满意，但实际上毫无价值。正如在他们的密折中所报告的：曾静“痛哭流涕，叩头不已。臣等见其醉醒梦觉，然后将逆书所载逐条追究，该犯茫无所指，非云齐东之语，即云臆度之私。诘问再四，毫无风影。”杭奕禄等最终发现，必须改换方式，不再口头鞠审，而是当给纸笔，令该犯详细写供。

曾静已经落入惊恐之中，要将其所思所为一一

落于笔墨，实在是一件煞费辛苦的事情。不过，曾静慢慢地定下神来，一点一滴地整理出其思绪，写下了详尽的笔供：

“弥天重犯是康熙十八年生，生在湖南近广东界。祖父以来，历代积善。常言三代行善人家，在弥天重犯的祖父，可称得一句十代积善人家。

“弥天重犯幼承父训读书，粗知仰体朝廷作养人材之意，不肯虚度岁月，自了其身。平常有志于圣贤大学之道，期勉躬行实践，以副朝廷之望。无奈身处幽僻山谷，名人文士足迹不到，而慈父弃世又早，且家贫力单，势不能出外远游，就正有道。弥天重犯所住之地离城市远，无交易买卖，即间有买卖，亦是用稻谷，不惟不使钱，竟少用银子。穷民无所出息，亦无处交易得银子。所使用者只有谷耳。惟富户积得稻谷多，方以谷去卖得银子用。至若钱，则无论康熙钱、雍正钱皆未用。

“陈梅鼎是安仁县百姓，于康熙五十二年老死。弥天重犯的岳父名国衡，是陈梅鼎之弟，亦是个百姓，于康熙四十六年病死。其子贫不能立，于康熙五十七年搬往四川去了。陈梅鼎之子今不知在否？陈元章是茶陵州人，不知是士是民，不在已四十多年矣。陈梅鼎是弥天重犯的岳伯。弥天重犯娶他的侄女，陈国衡之女，十八岁到他家中。

“一日某到，他迎接某，吾岳翁出见，乃大声指某曰：‘此诗礼大家，方正君子。’又曰：‘吾老

三生平做事，惟择婿一椿，眼力高过天下。’又曰：‘贤婿有济世之德，宰相之量。’又生平极鄙薄当今，屡叹先朝文物衣冠。

“因应试州城，得见吕留良所选，遂据僻性服膺，妄以为此人是本朝第一等人物，举凡一切言议，皆当以他为宗。其实当时并未曾知晓他的为人行事如何。直到中年，得知吕留良为文人所宗，而其议论亦间有几处与本心相合者，遂不觉好之，妄引为修身之助。

“自幼以来讲解经书，讲到《孟子滕文公》问为国章，说那井田法制，心中觉得快活，私地暗想以为今日该行。由是屡去问人，却无一人说今日行得。心下听着人说行不得，甚不快活。后看见吕留良此章书文评语，竟以为行得，且说治天下必要井田封建，井田封建恢复了，然后方可望得治平，遂不觉赏心合意。从此遂深信吕留良的说话，且执著这个死法子。

“圣祖皇帝宾天诏到，虽深山穷谷亦莫不奔走悲号，如丧考妣。即以弥天重犯冥顽至此，亦曾废食辍饮，恸哭号涕，被素深山，居丧尽制。然在当时皆起于心之不及觉，发于情之不容已，非有所为而为。

“西游的话，是雍正三年事。当时没有别意，因弥天重犯所住的地最狭僻，在山谷中，左右方圆十余里尽是耕户山农，并没有个读书识字的人相

接。弥天重犯的父亲在日，曾尝有个迁居的志，而不能得遂。复因近来人多田贵，家事单寒，转移不得。后得学徒张熙、廖易在门往来，居宿安顿不得，而张熙、廖易家事亦贫寒，因见这些去四川的传来，以为四川田贱。乃与张熙、廖易商量，思欲去四川寻个安静的所在，以为安耕搬家之计。且与张熙、廖易同住，并可遂读书之志。于是有去四川之行。

“于七月二十五日起身，搭船到长沙上岸。因到长沙城中走一回。盖弥天重犯从未出门，只因考试到过郴州，余并未曾走动。不意到长沙，竟看见有一告示上说‘五星联珠，日月合璧’的话。彼时大喜，以为有好世界来，毕竟会复井田封建。复井田封建毕竟要人，到那会用人时，我辈的行藏就不可得知。且既有井田，则到处可以安身，又何必搬家带属走四川做甚？于是去四川之志就灰了，就要转身来。

“那时并没有一点别的志向，惟有心中打量要来京城上书献策。再三不决者，苦为匪类一篇说话，在胸中狐疑。乃转身到长沙岳麓山一看，由是往湘潭一路回来，并没有会见别样人物，说一句异话。到九月初三日归家。

“惟回来有两年，见得这两年的收到不好，接连水荒，米贵谷贵，百姓艰难，逃荒避水的多，乃翻疑此‘五星联珠，日月合璧’的兆，恐另有别应。

“总之，弥天重犯狂举的心肝肺腑、一丝一毫、



点点滴滴，尽载于《知新录》、《知几录》。此两本书虽然有两个名号，却不是立意著作的书，装点的话。《知新录》乃是仿张横渠先生心有开明即便札记之说，随每日所知所见，不论精粗是非，写放于此，以便自家翻阅，考其所学之得失。议论固未曾斟酌，文法亦未曾修饰，原是随便写出的口语。《知几录》不过写出叮嘱张熙的话，明说与他恐左右人听闻，且虑他未必记得，因写放纸上。到写了多了，遂取个名号，此是暗地递与他的话。今二书俱已搜获，进呈御览矣。

“适值雍正四、五两年，湖广、广东等处百姓搬家到四川，往还有从弥天重犯门首过者，传说西边有个岳公，甚爱百姓，得民心，西边人最肯服他。那传说的百姓也不知道岳公是甚名字，是甚官职。”杭奕禄等三位朝廷大员急于向皇上报告案情进展，因此有点迫不及待，在曾静写供词的同时，也在撰具奏折，将已有的所有材料一一具列，向雍正报告。这些进展和材料包括：曾静所著《知几录》和《知新录》；逆书的草稿；一本稚童所用的古典经籍启蒙小册子；几篇由张熙去年从吕家购得的吕留良著作的介绍和引得；一幅曾静题字的扇面；从前述曾静仰慕的学者如刘之珩、譙中翼等家中抄出的著述；以及曾静被捕，嚷着要杀身成仁时所着衣衫内密藏的几句对句。所有罪证分别细细密封后，放入奏匣，令当地一位姓吴的抚标千总于 1729 年 1 月

7日出发送往京城。雍正亲览密折及证物后批道，逆犯的供词表明其“属可笑之人也”。

尽管如此，在雍正看来，虽然有他的谕旨及杭奕禄的协助，湖南的查案显然尚未下足功夫，因为他们至今还未发掘出曾静向岳钟琪所投逆书及其他著述中罗列的种种荒谬指控的来源。雍正深知，这些湖南的查案大员是可以有更大作为的。最近，雍正收到岳钟琪于1728年12月14日从西安递出的一份冗长的密折，从这份密折中，雍正看到，坚持不懈的严厉审讯才能直抵疑问的核心，获得有用的答案。

那在西安被拘的张熙处于无比绝望之中，涕泗涟沔，深责自己愚昧的举措，且又染上了重病，但岳钟琪并不因此而放松审讯。相反，岳将军不断施压，要张熙老实交待，集中精力回忆听到那些恶意攻击皇上的谬论的准确时间。终于，张熙有了答案：“前自湖南往浙江时，乃由水路，有搭船之人所言如此。”岳将军追问所言之人何种身份，所居何处，姓甚名谁？张熙回答，他们只是普通的商人，行商途中与他恰巧同坐一船而已，他从未有过问其姓名里籍的念头。岳将军又逼问其相貌特征如何？张熙供称：“匆匆答问，但记其言，至其人实不能记忆。”那么是否在云贵也听到过此类悖逆的谣言？张熙又答说，从未到过云贵诸省。但是经四川去陕西的路上又如何呢？张熙回答，这是今年头上

的事。他走陆路，并不曾听到任何人讲过此类传闻。实际上，他倒听到不少百姓讲当今皇上的好话，让他很是困惑。他也曾问起皇帝有哪些好处，老百姓的种种回答又含糊不清，自相矛盾。

岳将军趁机批驳张熙对于皇上及其文治武功一无所知，其顽钝无知真是令古之圣君如尧舜也会丧失耐心。他指责说，若坐船之商人确如尔所供称，竟有如此荒悖言谈，亦由尔辈欺骗众人所致。张熙自辩道，设若将军所言皇上德政懿行皆是事实，则所受欺骗的是其师徒了。如此而言，舟上所闻所言，皆不足论矣。

岳钟琪 12 月 14 日的这份长折向雍正报告了他与在押人犯之间的对话，详尽周全，篇幅颇大。在结尾部分，岳将军揣摩流言传播的基本方式是：某一人就某事有所议论，另一人误会其言再去到处传布，其他人听到这些传言后信以为真，于是流言一发不可收拾。一个明显的近例是，有谣言指控皇上酗酒（曾静的逆书中即列举其为雍正失德的行为之一种）。这种说法起因于京报所引一位大臣所奏，称皇上体认饮酒之于健康颇有害处。臣工对于皇上之英明的称颂一经恶意者传布，竟然成为谣言，谓皇上饮酒无度，怠忽朝政。岳将军言下之意指责其同僚未能精确地奏告重要谈话，以至有此扭曲。至于悖谬的流言本身，“此皆系从前不轨之徒捏造流布。今曾静等既敢谋大逆，则污天蔑日之言何所不

至。臣细讯张熙，既毫无指实，即所供舟中传说者，若果有其人，亦未必非前此造言之余党。”

仅仅九天之后，岳钟琪就亲身体验到了谣言传布的迅捷和可怕：西安城内人人传说岳将军已和投书人秘密结盟！谣言的传布者信誓旦旦地举证说，否则的话，何以解释张熙受审时所获的优渥待遇，以及被拘期间又被释放？又何以解释张熙与岳的幕僚私下间亲密会晤？令人烦恼的是，当地守军中的一些军官竟然相信或有其事。岳钟琪有点惶惶不安，深感事关重大，必须立即具奏禀告皇上。

岳钟琪对于流言传布方式的思考以及来自湖南的密折促使雍正于 1729 年 1 月下旬再次向湖南的钦差及地方大员发出一封廷寄。该廷寄是经由怡亲王下达给承审官员的：“前岳钟琪奏呈曾静张熙逆书，朕览之不觉失笑，不知从何处得此奇幻荒诞之语。但曾静等既为此书，必有奸逆之人造作流言，希图煽惑者。朕不得不一一剖析，宣示于众。”雍正继续写道，他才收到杭奕禄等有关审讯的报告，尚未细细思索所有细节。不过，他对于整个案件的大致发展早已了然于心。倘若作为一国之君的他在行为个性诸方面有任何细小的过失，一如曾静的逆书所描绘的那样，那么举国上下将会不再安宁，人人都会如曾静一样趋于反叛了。所以事关重大，承审官员务必追根究底，查出流言之根源，弄清何者是曾静杜撰，何者是得闻于他人。“即曾静不能确

指其人姓名，亦必略知其来由踪迹。”

于是曾静被三度提审。曾静一开始痛哭流涕，不断地祈求宽恕。然而，一当他明了雍正皇帝谕令的关键所在，便即刻平静下来，开始有针对性地回答审问。他告诉承审官们：“小的书馆在安仁县路傍鹏渚地方，偶听来往路人传言，实未询确姓名住址，不敢信口妄报。惟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七日有一人至小的书馆，据云名王澍，号燕山，系丙戌进士，曾与十四爷同窗读过书来。小的想系职官，不敢深问。于尹称有子现在川陕统兵，疑即系岳钟琪父亲。故《知几录》亦载有此段，令张熙访问等语。此外，实不能指出造言之人。”于是承审官追问，此自称王澍者来自何方，年纪多少，长相如何？曾静答道，他终究未能弄明白王澍的籍贯故里，不过印象里像是江浙一带人士，“彼时有四十多岁，如今有五十余岁了。五短身材，胖胖的，微须。”尽管曾静对于王澍的特征十分清楚，却讲不出任何其他传播谣言者的姓名。

即便问不出更多其他的消息，湖南的大员们心中十分明白，关于这个叫王澍的人的供词已经彻底改变了本案的性质：现在看来，攻击皇上的最为恶毒的谣言来自于文人精英圈子内的人物进士王澍竟是吕留良长子的同年！不仅如此，此人还是雍正死敌、也是其一母所生之同胞兄弟的伴读。这位前大将军、王爷、皇十四子至今仍被圈禁在北京。这

个新进展将会十分符合皇上在新近谕旨中订下的标准：从人犯的灵魂深处挖掘任何有关于流言传布的记忆。

然而出于某些原因，湖南追查案件的朝廷大员们这次并未急于向雍正报告这项新发现。这其中的部分原因可能是他们力图乘胜追击，从突然间开口合作的曾静那里套出更多关于王澍本人、其所述之故事，及他的同伴的消息。另一个原因则是，在雍正的指示下，与本案有关的各种人犯及嫌疑者正从四面八方被押往长沙，所以其口供正可用来同曾静的交待对质。岳钟琪于1月19日将张熙押解出西安，于2月19日抵达长沙；车氏兄弟及塾师孙用克由两江总督范时绎差人从江宁押往湖南，晚至2月26日才进长沙城。这些钦犯一到，急于向皇上表示忠心的官员立即展开审讯。

因此，直到1729年4月7日，湖南查案才告一段落，所有与案子相关的人犯被押入囚车，浩浩荡荡地出了长沙城门，向京城进发。这支囚车队伍可谓奇特，一千人马的命运全与曾静有关：身披镣铐的囚犯，高度戒备的卫兵，负责警卫与后勤供应的湖南官员，两武一文，当然还有监督全队的海兰将军和官气正旺的刑部侍郎杭奕禄。囚车中有主犯曾静，连同被逮捕的他那七十七岁老母及两个儿子也被一同解往京城；染病在身的张熙数周前才从西安南下，解到湖南，现在又得从原路北上了；张熙

的老父、长兄及堂弟也在行列之中；曾静著述中提及的湖南文人学者一个也不漏，全数在押，进京赴审；声称要与曾静师徒当面对质以洗不白之冤的江宁车氏兄弟前不久刚被转押到湖南，如今赫然在列；还有车府的前任塾师孙用克，拖着为痢疾所伤的身子，也免不了身处囚车之中。杭奕禄等在这支队伍出发之前，已向雍正具折，详细报告防止任何纰漏致使人犯逃逸的解押北上计划、曾静的笔供，以及关于进士王澍这一最新线索。雍正在此冗长的折子之尾朱笔御批：“览。不数日汝等即至京也。”

## 第五章 涅槃之歌

在湖南的承审官员们紧锣密鼓地展开侦讯的同时，浙江和北京的朝廷大员对所有吕留良及其门生的著述进行了系统的审查，并将其发现呈送雍正皇帝。雍正一一展读这些新的材料。即使雍正以前曾经视吕氏为一个普通的注经通儒，此刻他的想法也因眼前的文字而完全改观。吕留良的书信日记等私下撰述本身足以勾勒出一个与众不同的形象：一个对自身民族怀有刻骨铭心牵挂的汉人，一个眼见其人民及文化遭受异族摧残而愤慨不已的文人，一个对清朝统治者及其卑躬屈膝的汉族官员深怀仇恨的儒生。

在雍正的眼里，很显然，吕留良是一个沉湎于其所执著的往昔之中的人物。吕氏生于1629年，当年明王朝分崩离析，清军入关，并进入紫禁城时，

他还仅是一个年轻的学子。吕氏去世于 1683 年，当其之时，当今的九五之尊雍正及谋逆秀才曾静则刚满四岁。尽管吕氏身处清朝，并继续学业谋求功名，一度考中秀才，还注解儒家经籍，编纂进士应试文章范本，但这都不足以表明其真正的为人立场。只有从其私下撰述的文字里，人们才能看到吕留良真实的一面，也就是一个鞠躬尽瘁忠心于前朝的形象。吕氏对于清朝征服者的恶意尖锐的评论尽管写于五十多年之前，却足以让人们相信，这位大儒对于雍正时代的种种险恶形势早有完全的预见和了解。雍正越读下去，越感到气愤难抑。

吕留良的文字中有许多篇幅描述了他自己及其友人对于清廷于 1645 年所颁布的一项文告的强烈反感，该文告下令所有中原男子必须依满洲风俗剃发留辫，并改易服饰。在一篇日记中，吕氏记载了一个姓沈的友人反抗清廷命令的事迹，称该文人在清军入关后的十余年间闭门不出，拒客登门，从未改变明代衣着和发式；又禁止其子追求功名，出任官职。由于沈的儿子急于应试出仕，并为寡居的姐姐树立贞节牌坊，乃设法灌醉其父，乘其沉睡之际为其剃发。沈氏醉醒发现之后，悲伤欲绝。沈氏乃倾注其精力于文字以缅怀旧日，打发光阴，其子却担心其父以文字惹祸，竟然又将父亲著述付之一炬。

吕留良在其书信中特别讥讽那些效命于清廷



的汉大臣。他记载一位汉族儒士对其早在 1644 年就加入清朝政权洋洋得意，声称数年间为朝廷起草了发往长江流域的所有文告。此公曾作诗称颂新的统治者，所谓“六合一而泰阶平，礼乐兴而干戈息”。吕氏对此不屑一顾，以为此乃媚词，徒使有自尊心者耻笑而已。同样，吕氏嘲讽某城的汉族居民夹道送别一位治理有方的满人官员赴任新职。在他看来，这显示了人们为了口腹之欲而迅速忘却道德约束。有一位友人撰写了一首诗称颂满人敕平地方上的一次反叛，吕氏拒绝观读，讥刺说必须去掉“敕平”这个字眼，并将“颂”改为“叹”。

吕留良以一幅令人震惊的形像描绘出他自己对于清朝统治的立场。恰如他在一封致友人的信函中所比喻的：“有人行于途。卖饧者唱曰：‘破帽换糖。’其人急除匿；已而唱曰：‘破网子换糖。’复匿之；又唱曰：‘乱头发换糖。’乃惶遽无措曰：‘何太相逼。’”

吕氏最后对友人说：“留良之剃顶，亦正怕相逼耳！”那个时代的汉人都知道，仿效僧人，在家削发修行本是表示对佛教的信仰，但处于那个特定的环境，削发剃顶更是拒绝服从清朝政府有关所有人民剃前额留发辫的命令，因为已无辫可留了。有一段日记说得更是直截了当：“死以山林隐逸，荐则剃发为僧，誓死不就博学鸿词科，坚拒出仕入宦之荐。吕留良认为，在一个连稚童对改变的衣冠服饰都惊

讶不已的时代（吕诗有“稚子谄衣冠”之句，曾为曾静所引用），只有这样的行为才是理智的。

明朝覆灭时吕留良才十几岁，但南明永历皇帝及其幼子于1622年在中缅边境被清军包围并斩杀时，吕氏已届成年。吕氏日记中颇多有关前明宗室四处躲避之困境的评论，而对王朝最后的帝王濒临死地的时刻更不惜笔墨，详尽描绘：当永历皇帝被执时，满汉官兵无不动容，“东宫勒马前行，以鞭梢东指，则东边满汉兵皆跪；西指，则西跪。杀之日，天地晦霾，日月失光，百里之内，凡关壮缪庙皆被雷击。”即使不论整篇文字的基调对前明充满同情而对清廷却不无指摘，仅吕氏称前明罹难宗室为永历皇帝而非“伪永历”，已是死罪，吕留良本来对此就是十分清楚的。

吕留良在日记中以相同的笔调记述了爆发于1673年，直至1681年他本人去世前不久才平息的吴三桂叛乱之每一项重大事件。吴三桂起兵之时已年届六十。吕留良记载当时一般人的反应，称或者亦不必视吴三桂过于年迈，不堪胜任率领乘胜大军之责，并认为吴三桂宣布自即帝位时选定的吉辰显示其聪明过人。

在许多段落里，吕氏以唐突的口吻不谈论剿平吴三桂叛乱的先帝，仅以康熙直呼，而不尊称其为圣祖皇帝。吕氏并以嘲笑的笔墨称康熙生性吝啬，身为一国之君竟侵吞朝臣官俸，贪图皇亲贵胄赠送

其宫廷画师的绛罗绸缎之类的礼物。

雍正细读吕留良的书信日记，发现其中充满各种异像和征兆，并无不用来作为攻击当今皇朝之国计民生的利器。某一处说“京中起怪风三日”，凡被风吹过之人无不面呈朱红；又“有大星如碗，后有细星随之如彗”另一日正午“有黑日如；，日光磨荡，斗状”；某一日，“日有三枚，日旁有一差小者，色白，不甚动。白日旁此一小者，色赤而甚动”

。凡此种种，并倾盆大雨，电闪雷鸣等等，无不在吕氏的日记中各显其能，成为这位通世大儒对国家的未来忧心忡忡的依据。

吕氏日记中有一篇记载尤为详尽，显得非比寻常。该篇所述的征兆是河南的一个村庄突然有凤凰降临，百鸟朝凤。有二朱色巨鸟以其翼遮蔽凤凰。凤凰之羽五色斑斓，炫人眼目；其鸣宛如古时宫廷音乐。村民见后十分不安，以耕牛驱赶，而牛竟慄栗不敢挪动。数日之内，死鸟覆满路途，死金鲤遍布四处。吕留良这个时代的人都知道，朱红是前明王朝的象征，而凤凰呈现又预示世局将有重大变故。正如吕氏在日记后所作的《凤凰铭》所云：“德未尝衰尔，或不来善。以道鸣必圣人生。”

吕留良的文学著述卷帙浩繁，加之学术、隐寓和批判性的文字交织其间，这就是何以浙江总督李卫粗略浏览之下，竟然没有发现任何不轨的段落。几个月前，岳钟琪拿着张熙带在身边的吕诗，也是

看不出个名堂来，还是张熙指点将军从另外的角度去审读其诗如《钱墓松歌》和《如此江山图歌》。如今雍正细细品味这些诗作，确实在其中看到了一些当初曾静、张熙之辈体悟的隐寓讯息。譬如，从表面上看，《钱墓松歌》只是对于长逝已久的文人墓前一棵老枝盘错古松的怀感。不过吕留良以长寿的松树发论，谓此松当自元朝即已存在。众所周知，元朝是蒙古人打败宋朝后，于 1279 年在中原所建立的王朝，中原从此受蒙元残暴统治达百年之久，直到明太祖朱元璋率部驱走外夷，于 1368 年建立明朝，恢复中华统治。就在短短数行描写中原百姓在元朝统治下之困苦生活的诗句里，吕留良暗藏了他的政治立场，任何有反满倾向的读者都能从这首诗字里行间看出蒙满之间的关联，并将蒙元统治与其自身的时代相对照。

《如此江山图歌》篇幅较长，其历史背景也更为复杂。尽管如此，却不难理解曾静、张熙师徒于 1720 年代激情奔涌的时刻，何以会发现吕留良的这首诗具有巨大的鼓舞力量。这首诗中的“江山”乃指画家笔下的景物，是一位生长于宋代、眼见祖国大好江山落入蒙元之铁蹄的画家托景寄情的作品。所以该画既写山水之美，复叹时代变迁。吕留良的这首诗是有感于宋遗民在此画留白处呼应画家悲情的题诗而发的。然而有意思的是，当元朝为朱明王朝取代后，那些丧失了其效忠对象的元遗民

竟也在画上题诗抒发丧国之痛。所以为吕留良所兴咏的这幅画沉淀了历朝数代兴亡之叹。不过所有如此种种哀叹实在也是有点模棱两可，因为作画的确切年代已不可考，甚至这许多题诗的年代亦不清楚。画中于山水间依稀可见的人物的穿着既不像山林隐逸那样竹笠粗服，也不像转而事奉新朝的权贵的官袍。因而吕留良在诗中说，如果画中人物是宋人，那么其必然以丧失江山于蒙元之手为耻；若画中人物是明人，则其必为汉人重拾江山而举杯痛饮，欣喜若狂“，如瞽忽瞳跛可履”；若画中人物是元遗民正为树倒猢猻散而悲伤，则其可谓是非莫辨、良莠不分。

“还我旧山河”曾是北宋屈从女真征服之初汉族英雄岳飞的抗金呼声。从上述吕留良的诗句及吕氏后人让张熙观览的日记中，人们得以理解，曾静等湖南谋逆者是如何形成其“夷夏之防”观点的。1729年春，雍正亲自览读刚收到的《知几录》和《知新录》，吕氏的日记和诗作恰好为雍正提供了理解此二书的那种应承关联。例如，曾静是否受到吕留良的影响，才写道“中华之外四面皆是夷狄，与中原稍近者尚有分毫人气，转远转与禽兽无异”？是否在吕氏著作的激励之下，曾静才教诲其众多弟子，莫以君臣之义比照华夷之大分别，亦即华夏与夷狄之间无义可存？曾静并以此而推论说：“君臣之义一日不可无，天下岂有无君之国哉！孟

子曰：‘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禽兽亦有君臣，蜂犹知依从。如今八十余年没有君，不得不遍历域中寻出个聪明睿智人出来作主。”

曾静在其书中明确表示，明亡之后，中国应由饱学之士如吕留良掌握国政，而非将中原拱手攘于外夷、“光棍”，或者千百年来因循夺取江山逞一时之勇的匹夫。曾静信心满满地宣称：“皇帝合该是吾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周末局变，在位多不知学，尽是世路上英雄，甚至老奸巨滑，即谚所谓光棍也。”而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在于恢复古代的封建制，分封诸侯，而天子以谦谦君子之风临驾天下，攘夷狄于中原之外。按曾静的想法，古之圣贤对于驾御外夷之道，“只有杀而已矣，砍而已矣，更有何说可以宽解得？”而这样做的道理是人所周知的：“夷狄窃天位污华夏，如强盗劫去家财复将我主人赶出在外，占据我家。今我家人在外者探得消息，可以追逐得，如今吕留良不复在世，则他曾静难道就不能乘时势以图恢复三代圣明政制？

不过，给予曾静及其追随者们如此宏伟目标以影响者，并非吕留良一人而已。张熙赴浙江途中，曾经在吕氏的门生严鸿逵家中盘桓数日。严鸿逵以吕氏传人自居，保存了包括吕氏的私人日记在内的许多著作，张熙到访时受到接待并看到过这些文字。严氏本人的日记已于上一年冬天被李卫查获，

其中充满了各种征兆之说及对清朝统治者明目张胆的攻击。严氏被捕后称，时年七十四岁，那么他是生于 1654 年，即明王朝覆灭后的整整十三年之后。可是他和其师吕留良一样，自视为明之遗民，在立场上与新政权为敌。所作所为也如同其师，在日记中记载其浙北家乡附近的人民对于清朝改易服饰发式命令的反响。严氏以称誉的口吻记录一友人终其满族统治之一生不易服饰，依旧穿明朝时样的长袍，还头戴孝巾吊唁明代的末代皇帝。另一友人于 1644 年之后就披麻戴孝，并且不顾危险，拒不依制剃发留辫。至于严氏自己，总是戴一顶依照以前旧时式样做成的“六合一统帽”，这种帽子就像早期的“四方平定巾”一样，寓有不满现状，期望好日子到来的意思。严氏并且以满意的心情看到自己带动了一方风气，并说他读到明末著名遗民顾炎武的著作中也曾讲到过“四方平定巾”，说三百年前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本人就戴过此种方巾。

如同其先辈吕留良及晚辈曾静一样，严鸿逵也沉迷于地方上的各种异象，乐此不疲，其日记中充斥着康熙两朝引起他浓厚兴趣的各种征兆和古怪事件。在某一冗长的篇幅中，严氏记载了某冬日发生于长城以北的一次地震。地震波及方圆 30 英里的地区，乱石飞崩，地生烈焰，百姓惊慌四奔。数天之后，洪水泛滥于清帝的避暑及秋猕的热河地区，淹死两万满族人。严氏写道，所有这些无不预

示明朝的复辟。这次地震的征兆与京城内某宦家中一个丫环的梦是一致的，在梦中她见到有三个神明坐于大堂之上，而后有报说明宗室朱三太子驾临。三神祇起座相迎，但见此人面流鲜血。朱三太子向神明祈求三道黑水，而神明终于答应后，誓言某日洪水将至。

另一些异象看来有据于官方的记载，如严氏叙述了一则起源于钦天监的征兆：钦天监官员们预测到五星联珠，并警告说此乃内战之先兆，国家将以依此线划分为西南和东部两国，军队将于城中哗变起事。以诸珠串之星呈白色（启明星的颜色）来看，统治王朝将以此衰落。严氏还称曾听说驻江南的一位满族大臣与当地反对朝廷的文人心有戚戚。为了强调其所处时代的分裂势态，严氏记下了他听到的各种奇事，诸如公鸡下蛋，狗产小蛇，龟以胎生，蛙食生人。与这些奇谈怪论相掺杂的是严氏与友人的谈话，热衷于古代圣贤言行及山林隐逸拒绝王位等话题。日记中还有关于远道来访者的记载，其中一位便是来自湖南僻远地方的张熙，此人是其崇拜的老师“蒲潭先生”曾静的信使。

值得庆幸的是，在雍正看来，邪不压正，在上天的庇佑下，那些可恨的异象毕竟不能伤害朝廷于分毫。就在这个月，雍正收到西南边省云南总督鄂尔泰的奏报，令他十分欣慰。鄂尔泰称去年正值---雍正五十大寿---阴历十月二十九日圣寿节那天，



于云南圣庙之上，五色卿云，绕日飞翔，历久不散。祥瑞次日又现，绚烂倍常，为无数百姓亲眼目睹。鄂尔泰奏道，此实乃“从来未有之嘉瑞。雍正龙颜大悦，将此奏折转发众内大臣。鄂尔泰原是雍正最为亲信的大臣之一，雍正当日将曾静逆书转批给朝廷重臣阅读时，鄂尔泰名列首位。所以，其他内大臣对于雍正和鄂尔泰君臣的喜庆之意当即心领神会，应声附和，上书皇上，请求将此罕见之祥瑞载入正史。

1729年2月16日，雍正颁下谕旨：“宣付史馆。朕之允行者，非欲夸示于众也。盖以一之理，捷于影响。”数日之后，雍正又下旨恩赏鄂尔泰，将其由头等轻车都尉超擢至满人贵族中更高的世爵三等男爵，并赏拔鄂尔泰治下西南所有县令以上官员。三月中旬，雍正援引古制惯例，下旨新建云神和雷神之供奉庙宇，由礼部和工部联合督导其工程。在当年余下的八九个月中，从云南、贵州、山西、四川等地总共有十六封奏折驰入京师，向雍正报告各种祥瑞。这种“天人感应”的迹象如此频繁，是康熙一朝所未有，也是当朝所仅见。

不过，征兆之事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以为宣布祥瑞纷呈就可以令危险的恶兆烟消云散。皇帝固然能动用强大的国家机器宣扬对他有利的吉兆，但那些不利于皇帝和朝廷的怪象却也总能通过深不可测的流言传布四方。将那些奇谈怪论隐藏于日记中

的，并不必定是朝廷的敌人，而要使流言取信于人，也并非一定得打出其说源于钦天监的旗号。有一个例子说明了谣言如何流传的。福建总督高其倬于1729年4月30日向雍正密奏，与曾静等散布的流言类似的诽谤已经由京城经浙江传到了福建。两名朝廷重臣，漕运总督和浙江观风整俗使的亲信家臣在京城南部偶尔相遇。他俩都刚替其主子送完密折，如今在返回杭州的途中，很自然地两人相约结伴南行。行至山东境内时，又遇上了一位姓马的同行，其主人是福建省某州府的官员。于是三人共行，先是走陆路，然后换乘舟船沿大运河南下。到了扬州，那姓马的家臣讲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故事：在他滞留北京时听说，有一位钦天监官员观察到一个奇异的天象，即其测算表明紫微星将正对福建。紫微星位于七斗星最北，当时被人信为天神所居之处。这可不是个好兆头，为息天庭之怒，皇上决意捕杀福建所有三至九岁的男童。听说朝廷使者正日夜兼程赶往福建执行圣谕。马姓家臣之所以要告诉他的同伴，是出于好意，因为他想这其中至少一位是福建人，家里可能有幼龄男孩。讲过此事后不久，马侍卫与两人分手，继续南行。而这两名家臣认为事关重大，一到杭州就分别向其主子汇报；这两名官员也不敢怠慢，立即上报浙江总督李卫。

尽管李卫正忙于准备北上晋见皇上的计划，并向其副手交代暂理事项，他仍抽出时间与福建和山

东的同僚协调，追查这一奇特的谣言。马姓家臣立即被逮捕鞠审。他对于散布谣言之罪供认不讳，但否认是谣言的始作俑者，说是在往山东途中听一位姓张的人讲的。因为此人曾表明是北方某监察御史的家臣，所以并不难追查到此人的行踪。可是这位张姓家臣也否认他是这桩谣言的源头，指是一个叫俞成的桂林人告诉他的。于是又抓到俞成，结果他供称故事得之于另一个广西人。追查至今仍在继续之中。

在曾静被解递离开长沙的前夜，他已经实供自己相信并传布的谣言源于王澍其人，这些谣言对于雍正皇帝本人及朝廷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据曾静称，王澍是 1706 年进士，曾于 1723 年 5 月在曾静的书学馆滞留。王澍向曾静炫耀说，早年曾是皇十四子的馆师及伴读，其子则提督西南驻军。

像这类故事未必空穴来风，全然无据。先帝康熙要求众皇子在继承满族传统和文化的同时，熟悉汉文及中国古籍。所以大多数皇子都曾研习汉文，也总有汉人伴读相随。例如，当今皇上雍正当年的伴读就是后来恃宠骄横并终于落难的年羹尧将军，年羹尧是 1700 年的进士。康熙的皇三子与 1670 年中榜的进士陈梦雷相伴而读多年，后者协助皇三子在畅春园蒙养斋开馆，编成卷帙浩繁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现任广西巡抚也是皇十二子的家臣出身。皇八子（于 1726 年被雍正密令处死）生前

的王府财政是由他的馆师管理的，此人在 1709 年的进士榜上有名。为雍正所除去的皇九子的先生是极负声望的硕儒、翰林院编修何焯，何焯是 1703 年圣祖南巡时特赐的进士。虽然皇十四子的书斋中并没有极有名的儒士塾师或伴读，但他不乏汉人朋友与幕僚随从，其中一位还被逮捕并处死，因为他竟敢声称其主子才是先帝康熙属意的皇位继承人，而当今九五之尊雍正应被废黜。可是谁能说其他人就没有相同的想法呢？或许现在合该是与皇子们有所牵涉的文人倒霉的时候？

然而问题在于，当北京负责审案的官员彻查之后，发现 1706 年的进士题名榜上并无王澍其人。确实有一位同姓名者高中 1712 年的进士，但此公却是一位模范官吏，堪称财政专才，同时还精通典籍，擅长书法。他从未入侍皇子，也无子任职西南。这位王澍年已六十二岁，不久前才致仕归里，返回江苏安葬父母。他确实有点直言不讳的脾气，但却不像是一个会远赴湖南散布皇上谣言的人。既然声称自己是王澍者并非真正的王澍其人，那么他到底是谁？现在何方？除非是曾静凭空编出这样一个情节这似乎不太可能那就是有人盗用王澍的名姓及其进士头衔带来的某种可信度而编造反满故事。

假如说雍正皇帝也从所有的这些曲折中学到什么的话，那就是，不管是由于误听了他人随意的谈话，还是出于恶意的捏造，谣言必定起于某人；

谣言不脛而走，若不加堵截防范，传播极快。岳钟琪将军说得最明白不过：那些谋逆者的“奇骇之说”，以及其密谋起事的谣言，如今早已“流布在外”。所有这种种的奇谈怪论、恶意诽谤到底对雍正皇帝的治理天下带来什么影响呢？在一封即将发还给其亲信鄂尔泰奏折之尾，雍正沉思冥想，询问鄂尔泰于对付曾静的种种指控有何良策：若按曾静所言，朕将不配做大清国的皇帝，那么朕应如何应对此种挑战？换句话说，怎样使凤凰涅槃之声归于沉寂？

## 第六章 口诛笔伐

吕留良及其门徒令人震惊和不安的著述议论占据了雍正在 1729 年头几个月的注意力，但在四月中旬时，雍正的思路陡然转回到曾静案本身的种种细节上面。因为就在这段时间里他获得奏报，集中在湖南的所有案犯已在押解进京的途中；曾静供认出曾与皇十四子以前的亲信、进士王澍在湖南有不同寻常的活动。这些消息使雍正再度想到去年十二月颁布的那项圣谕，这份长达八十三页的上谕不仅披露了曾静逆书的内容，而且简要但精确地勾勒出当年雍正继位时的惊险一幕。

自从去年十二月雍正下旨，所有在京满汉文武大臣聚集于紫禁城乾清门外聆听朝廷宣读圣谕之后，这件事有些不了了之的样子。虽然雍正明白宣示要将此圣谕传播于四海之内，令人民皆知孰是孰

非，实际上这份长谕从来就没有下发，因为朝廷重臣们担心，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怕倒是曾静的诽谤恶言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兴趣。内廷起居注官员誊录了一份副本，藏于宫廷密档，并不宣示于人。而其中的一小部分，主要是报告张熙向岳钟琪投书的经过，则曾经登载在京报上，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公开承认了确有这么一件事情。不过京报的这点零碎的记录实在并未给无孔不入的谣言制造者提供多少可以进一步发挥的材料。

到底应该从何处着手料理此案呢？雍正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给远在中国西南边陲的云贵总督鄂尔泰送去这份长谕的副本。自从年羹尧被谕令自裁后，鄂尔泰已成为雍正最为信赖的大臣。鄂尔泰出身于满洲贵族家庭，是清军当年征战时期一位英雄的直系后裔，而且其本人精通汉文，是康熙年间（年）的举人。鄂尔泰对于各种实务的建言总是切中要害，又深谙如何振奋皇上的心情和精神他于二月间雍正五十大寿时呈报祥云献瑞的机敏足以证明这一点。凑巧，鄂尔泰的一个亲信家臣保玉这时正在京城，所以雍正于4月20日将长谕的副本封在一个黄缎包裹的奏盒内，令他迅速携件返回，交给其主子。除了密件之外，雍正还赏给鄂尔泰几件礼物，包括两件细白皮毛镶边的皇家式样的长袍，一盒干果，一盒奶饼。保玉也得了十两银子恩赏，作为让他快马加鞭的奖赏。5月12日，鄂尔泰收

到了长谕及皇上的亲笔圣谕：“此因应逆犯曾经之谕，朕欲遍示天下，录来与卿看。俟各犯至京审明，尚另有旨谕。”

然而，雍正有点迫不及待，实际上已经下了决断。4月21日，即在发出给鄂尔泰密信的次日，雍正皇帝就给内阁大臣下达了有关传阅长谕的谕旨：令内阁发六科将去年12月所颁之圣谕仔细誊写百余份，拟送各省巡抚九份（全国共十七个省）。九份之中，巡抚一份，监察御史、布政使及学政各一份，当地驻军将军、提督、守备等各一份。余下两份，或可由各省衙署幕僚转抄，或可由巡抚派送给当地印刷工匠，将长谕翻刻，大量印刷，装订成书。这些新的誊写本或刻印本则分发给全省高低阶文武官员，以符合雍正上谕所制定的“广行宣布，务使穷乡僻壤家喻户晓”的目标。在京各级朝廷官员、监管诸省军事行政的总督，以及朝廷驻地方官员如盐道、河道、漕运、御史等，将另行颁发，务使人手一册。

虽然这种将谋逆案大肆宣扬，广为传播的做法有点不同寻常，雍正及其辅弼大臣们当然知道，他们并非首创。同样的做法早在1380年至1390年间（洪武晚期）就由明太祖朱元璋施行过。当时，朱元璋要全国百姓都了解其政敌背信弃义到何种程度。曾静等湖南谋逆犯及吕留良的门徒们不是视明初的帝王为中华传统道德的楷模吗？那么采用

其所尊崇者当年用过的办法来廓清大清国的一段重要历史，正本清源，平息谣言，乃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至4月底，大规模誊写工程已经展开。每当九本一套的上谕誊写完毕，就或由各省巡抚的驿吏火速送回所属省份（如果他们恰好在京候命），或由兵部派特别信使飞递各省。该制度运作良好，以各大员收件日期便可知驿程的远近：行署驻在华北的河道总督于6月2日就收到了上谕，而远在西南的广西巡抚至7月4日才收到给他的一套上谕。

各省督抚各具奏折向皇上报告其奉读上谕后的感想。毫不足奇，鄂尔泰的回奏最为具体。鄂尔泰首先对皇帝的信任表示感激，对皇上的细致周全深表敬佩，而对曾静的荒唐著述及行为则力陈深恶痛绝之意。随后鄂尔泰向皇上进言说，尽管大多数满族官员公忠体国，足智多谋，以历代贤良方正为楷模，但也不可否认，有一些无知寡耻之辈混迹满人之中：“逆贼曾静捏造浮词，恣意狂悖，暗布匪党，耸动大臣，其所以能如此、得如此者，臣以为其事有渐，其来有因。如诬谤圣躬诸事若非由内而外，由满而汉，谁能以影响全无之言据为可信！此阿其那、塞思黑等之本意，为逆贼曾静之本说也。”

鄂尔泰继续写道，造谣污蔑、诽谤朝廷是任何一个谋逆匪类和无知顽劣都能做的事，但却不可能将流言诬谤喧腾到如此境地。而曾静等更以表达汉



族百姓深藏于内心的想法为其诬谤的托词，手段异常狡诈。不过，鄂尔泰还是精明地看到，尽管清廷统治中国已经八十多年，施政有方，恩及百姓，但国家人民并未真正达到齐心合一的境界，汉人尚有疑心异念，满人治理尚有可议之处，因而曾静辈才有机可乘：“汉人之心思终不能一，视满洲之人物犹未如争光。”鄂尔泰坦陈，想到这些真是令人不安，为之气结。雍正对此深具同感，在奏折的这段话上加圈并批道：“朕亦叹息流涕耳。”

鄂尔泰在其奏折最后的归结却有点宿命论的意味。他说，大千世界，人与鸟兽并存其间，一如皇上曾英明圣断，鸟兽中之邪恶嗜杀，也如同人类中有不良者一样。曾静之辈尽管生为人类，却与鸟兽中最卑劣者无异，“捧读上谕，坦然惻然，自问自慊。不为一曾静，而为百千亿万人，遍示臣民，布告中外”。雍正对此的回应简洁明了，但仍可见出其真情的流露：“为朕放心，丝毫不必愤闷。过此怪物，自有一番出奇料理。卿可听之。”

当雍正皇帝严词驳斥其众皇弟及曾静的谰言正在全国官员中层层下达之际，被囚禁在北京的曾静正被反复提审。通常是由当日解押着大队囚犯一起从湖南抵达京城的杭奕禄主审。因为所有与案件有关的人犯已经全部押解到京城，承审官员们得以日夜不停地交叉审讯犯人，以核对口供。承审官员常常拿这一个案犯的供词来逼问另一个案犯，或是

命案犯与其他证人当面对质。记忆总是可以用各种方法搅动、催醒、激发的。承审官员坚信没有人能够始终掩盖真相，案情终将大白于天下。

大约6月15日至20日之间，曾静终于有了杭奕禄等待良久的新口供。曾静告诉承审官们，除了那个假王澍之外，确实还有来自于其他人的流言。这些涉及朝廷及天子的恶语在不同的时间里出自不同的两类人。有关雍正好色、荒淫无度的说法，尤其是皇上夺前朝废太子允初嫔妃以充后宫的污蔑之词，原是1727年夏发配南方边疆的各式人犯，包括皇八子的太监们沿途散布的，这批人在往衡州的路上曾经过曾静的学馆。其他关于岳钟琪上书皇帝、批评朝廷的谣言，以及各种有关京师朝廷内外风风雨雨的蛊惑人心之言，则是曾静于1723至1728年间从他的邻人处听来的。虽然曾静并不记得那些流戍黔粤烟瘴地方人犯的姓名，却清楚地记得那几个邻居的来历。一位是安仁县生员何忠立，另一位是在永兴县第十八都行医的郎中陈象侯。而这两人当时都说消息来源于茶陵县堪輿陈帝西，此人以为人看风水及算命为业。

雍正一获得这个最新进展消息，马上命军机处拟定廷寄，交兵部由快驿紧急飞递湘抚王国栋。该廷寄于7月初抵达湘抚官署。雍正严旨王国栋同时从两线展开行动：彻查官府旧档，弄清1727年夏经衡州流放广西的各式人犯的姓名；逮捕曾静供出

的三个湖南人。严厉鞠审陈帝西、何忠立、陈象侯，令其写出当日告诉曾静的每一则流言，以及听堪輿陈帝西讲到这些事情时的具体地方和环境。王国栋必须将所有供词详细记录在案，并告知三人犯事情的严重性及其将承受的后果。同时，也让他们得知，如果坦白交待谣言来源，造谣者具体姓名，则他们可能因只是散布道听途说而获得宽释。如若他们拒不交待，则严刑拷问；如仍无所获，则将彼等押解进京，以便与曾静当面对质。

雍正同时向广西巡抚发出廷寄，令其追查当年经由衡州流刑广西的人犯的行踪。雍正特别交代，承审官员必须谨慎行事，不可惩罚那些向官府报告曾听到种种谣言的一般百姓，因为那样只会令人人三缄其口。

在等候有关湖南、广西的新进展的同时，雍正又撰写了三篇分别驳斥吕留良及其两个主要门徒，即严鸿逵、沈在宽的谕旨。此三篇圣谕互相关联，皆以正式上谕的形式向满朝文武公布，一如去年12月发布有关曾静逆书案的上谕。不过其篇幅及深度尚不及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流传的那份长谕。公开而非隐藏曾静案及由此案牵出的其他人犯及其罪行的想法令雍正十分兴奋，因为在他看来，对于目前发生的如此重大的案件装聋作哑，任其繁滋，乃是下策，远不如彻底公布大众，然后将不合意的情节彻底驳倒的效果为好。

这三篇驳斥吕留良一派的上谕中的首篇是针对吕氏的门生严鸿逵的。该上谕根据雍正的旨意，于1729年7月9日公布于朝。雍正力求简捷，无意就严氏著述所涉及的所有思想认识作全面批驳，甚至完全没有重复严氏日记中令人不安的段落。雍正将此一笔带过，称其过于庞杂，绝大部分错误百出，不值一提。自1716年至1728年间的许多描写的荒诞不实，由于雍正本人对事件的清晰记忆而尤为明显。雍正指出，严氏的日记中有一件事倒是接触到了些许真实，那就是1709年的洪灾。所以，他要集中讨论此事件，因为一旦证明严氏在此事上的错谬，将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彰显出严鸿逵不实的作风及更多的错误。

如严氏所记，1709年7月间热河地区确实发生过大洪灾。但其因由并非什么面流鲜血的朱三太子让神祇释放黑水，而是由于豪雨不断，致使河位上涨，而且治河臣工对此早已有预估，河情始终在监控之下。当时，圣祖康熙正在该地区巡幸，所以其大营早已移置高地以免受洪水之害。当河水陡涨时，先帝的随从官员及扈从对此并不吃惊，就是当地百姓对此也已适应，并未惊慌失措。只是少数随圣祖北上的工匠乍见河水猛涨，不知所措，匆忙之下扎了几个做工粗糙的筏子，又争先恐后挤在上面避水，结果其中几只筏子因撞到水下的岩石而沉没，以致有人淹死河中。雍正继续写道，碰巧那个

月他从北京前往热河向父皇问安，随行者有百余侍卫和亲兵。他可以亲自作证，洪水所及的其他地区并无慌乱现象，也无人淹毙。而严氏竟称两万满人死于洪水，这是多么的荒唐！热河地区各民族百姓杂居，并不分满汉蒙藏，何以洪水只冲着满人而来，其他民族的百姓却毫发无损？可见其情理不通。

与严氏编造历史比起来更见荒谬的是其故作姿态，以明代遗民忠臣自居，立志成为其信仰的烈士。吕留良至少出生于明朝，其祖先还曾与明王朝联姻，而严氏其人诞生于1650年代，那时早已是大清的天下，其父、祖父都在清朝安享余年。因此，雍正要问严氏：有何凭何据尔竟与遥遥不相关的明朝帝王及国家如此联成一体？严氏实乃一顽固不冥之徒，否则断然不会拒绝朝廷邀其入史馆参与编修《明史》之请，更不会对来自偏远地方的拜访者如张熙之辈摇尾乞怜；其视朝廷征召如随时可弃之弁髦，而与逆贼曾静等叛乱悖恶之徒，尺书驰问，一介相通，则数千里之外，呼吸相应，亲如同气”。严氏“好乱乐祸于升平宁谧之时”，可见乃一不安分的好事之徒。更为甚者，严氏“拾吕留良之唾余”，人品低劣。雍正下旨大学士、九卿合议严鸿逵于律该当何罪。一天之后，雍正又下谕旨，指严鸿逵的门生沈在宽也以明朝遗民自居，其荒谬较他人更甚。沈氏当吕留良倡其学说之时，尚未出生，而其诗作中竟然充斥毁谤之意，图谋污蔑圣朝。着刑部

严加审问，议定其罪。

雍正将最为重要的批驳留到最后。7月16日，雍正再次下旨，展开对吕留良的批驳。为了显示对于这次行动的充分重视，雍正特意从舒适的圆明园移驾回紫禁城大内寝宫养心殿。雍正的谕旨详细周全，而且矛头所向与日前数谕略有不同。在去年12月针对曾静的长谕及数日前针对严沈两人的圣谕中，雍正似乎还认为曾静与吕留良所犯之罪行大同小异，属于相类的悖逆。但是，显然目前皇帝的心思有所改变，在这份上谕中现出了雍正新策略的端倪。雍正将吕留良与曾静区别对待，告诉臣工：

“吕留良生于浙省人文之乡，读书学问初非曾静山野穷僻冥顽无知者比。且曾静讥及于朕躬，而吕留良则上诬圣祖皇考之盛德；曾静之谤讪由于误听流言，而吕留良则出自胸臆，造作妖妄。是吕留良之罪大恶极，诚有较曾静为倍甚者也。”雍正并指出，吕氏的著述与浙江一省道德败坏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与查嗣庭、汪景祺辈的狂悖诽议一脉相承，是近年来各种谣言，如致使数千百姓纷纷逃离海宁的屠城之说的最大根源，因而吕留良实乃一“好乱乐祸”之人。

雍正进一步嘲笑吕留良以崇尚伦理道德的故明政权之支持者自居。雍正批驳说，吕留良心中当尚存其先祖与明王的一支远亲联姻的故事，但其出生之时，乃“明朝之末季”；清军入关时，吕“年

方孩童。本朝定鼎之后，伊亲被教泽，始获读书成立，于顺治年间应试得为诸生”。当其之时，吕氏对被清军于征服过程中执获的明朝忠臣的遭遇何曾有过任何同情，不过孜孜于学业功名，一心以仕途为念。至 1667 年，吕氏受挫于三年一度的会考，丧失了秀才资格，才突然发现对明朝的尊奉，而作起污蔑大清的诗文议论来。到此时他才发狂言要削发为僧，隐退山林。十余年后，一些读过吕氏著述而仰慕其学者尽管他考试时落榜推荐其赴博学鸿词科，但吕氏誓死不就。雍正质问：谁曾见过吕留良这样“怪诞无耻、可嗤可鄙者”？吕氏著书立说、散布流言，其实他是“卖文鬻书，营求声利，遂敢于圣祖仁皇帝任意指斥、凭虚撰造、公然骂詈”。雍正又指出，他亲自翻阅之后发现，吕氏的著作与其私下撰写的日记一样，无论是传播海内外还是秘藏私室者，无一不是肆为污谤、极尽悖逆之词。

在此上谕中，雍正无意引述令他不安或震惊的吕氏的所有文字。雍正集中精力批判吕留良对于清朝的贬低与辱骂吕氏长于斯朝，得喂养于斯朝，其子子孙孙亦生长于斯朝，而他竟然能对这个朝代如此憎恶！吕氏对大清朝及大清皇帝从不以尊称和敬称，而谓之为“彼中”、“燕”、“北”、“清”等。相反，对于伪朱三太子甚至叛贼吴三桂却礼敬有加。

雍正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辩证吕留良当永历皇

帝被执时，“东宫勒马前行，以鞭梢东指，则东边满汉兵皆跪；西指，则西跪”之说。雍正在上谕中说，事实上伪永历混迹于盗匪之中，徒然伤害无辜而已，众叛亲离，只得藏身于缅甸。最后仍然是缅甸国王将伪永历交给大清军队。所以，整个故事很清楚：根本没有人在任何人的马前下跪表示忠诚之意。吕留良的私藏日记及文字津津乐道于灾象征兆，与其编造历史一样，毫无根据，充满无稽之谈。这些文字显示，吕氏对于自然灾害缺乏常识性的了解。要知道，中国的自然灾害于历朝历代，不可避免地间隙性地发生，并非仅大清朝所独有，也不仅发生于吕氏生活的那个时代。衡量一个王朝的功过是非是看于灾害时期能否真救百姓于水火，而非灾害本身是否发生。雍正指出，圣祖仁皇帝就是一个楷模，其勤政爱民的风范与功绩，无人能出其右。纵观当今之世，抚臣如浙江总督李卫公忠体国，面对一个由于吕氏之辈散布恶言而民心败坏士风堕落的地区，勉力致其繁荣，兢兢业业。相形之下，吕氏之辈口是心非，号称追随儒家格物致治的理学传统，动辄引经据典，实际上心怀恶念，任意诠释自然灾害，真可谓无耻之尤。雍正感叹道：“朕即位以来，实不知吕留良有何著述之事，而其恶贯满盈，人神共愤，天地不容，致有曾静上书总督岳钟琪之举。”

虽然曾静也曾散布流言，并且竟意图策动谋



反，可谓罪不可逭，但谁能说其罪较吕留良更甚，或是较吕氏的儿孙更甚？吕留良的儿孙本应将家中的吕氏著述连同其刻版付之一炬，但他们却视为珍藏，并大肆印刷，广为流布。雍正最后作出结论：“凡天下庸夫孺子，少有一线之良，亦无不切齿而竖发，不欲与之戴天而覆地。此亦朕与为臣子者情理之所必然。”因此，雍正下谕在京百官及封疆大臣会议对已故的吕留良及包括其尚存子孙在内的全体族人及并旁系亲属的惩处办法，尔后具折疏奏以闻。

尽管雍正皇帝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谕令内外臣工提出处置吕留良等人的建言，当夏天快要结束时，竟然没有任何有关的奏疏上达。不过，在此期间，有关途经安仁县及衡州的流放罪犯的消息及动向的报告倒是开始传到京师大内。在湘抚王国栋的协调之下，南方诸省的巡抚、长吏逐渐将有关各种流配犯人的各种零碎消息，诸如所经之路途、所停歇及进食之地方、押送兵丁之举止言行等，拼凑成一幅较为完整的画面。

1729年底，广西巡抚金鉷具折上奏：在曾静供词中所提到的1727年夏季的两个月阴历五月和六月之间，一共有八名人犯由兵丁解押路经衡州。其中两名已故；另外六名之中，有前宫廷茶叶库房看守及其六岁的儿子，到广西后一向恭敬守法；其余四人乃是先前皇子府邸的太监，其行为各不相

同：一个尚算老实，并未听说有胡言乱语的行为，另一个则名声极坏，一贯口出狂言，傲慢无礼，虽然还未见到具体公文，但此人恐怕难逃干系；再两个太监，一个叫马守柱，另一个姓崔，肯定是搬弄是非之徒，他们时常有悖逆的怨言，咒骂审定其罪名的府官。广西巡抚衙门的胥吏也发现了其他两个并不在曾静所供名单上的太监，于 1726 年 12 月和 1727 年 11 月分别被判流刑，有记录显示，这两人也属于尖嘴利舌，口无遮拦之徒。这些太监每每于酒足饭饱之后，信口开河，公开宣称其从前主子皇阿哥的好处，胡说什么其主子受到不良待遇，有冤屈。在接到怡亲王允祥的急令之后，这五名嫌疑重大的太监被锁拿后押往京城。

雍正在广西巡抚金鉷的奏折上明确批示：“料理可嘉之至。留中人犯口供，地方中既被此辈流言蛊惑，已数年矣。但乡愚无知者信疑之间，不可言无。当竭力留心开示。凡有发往人犯处，皆不可疏忽，务将阿其那等不忠不孝不法不臣处一一详细委曲宣谕，务人人知悉，不可草率疏忽从事。况汝先在允初属下，虽任外吏，朕弟兄辈从来情形不可言全不知也。勉为之。”

雍正亲自核查案情，不放过任何细枝末节，终于将各种线索串于一起，形成了他的想法。正如他在随后的一份上谕中所称：“从京发遣广西人犯多系阿其那、塞思黑、允 X、允禔门下之太监。”由

广西巡抚所确认的几个最为悖逆的太监都是与当今皇上仇恨最深的皇子府中的奴才；显然，这几个太监心怀为其得冥诛、获辱名的故主报复的念头，所以才“沿途称冤，逢人讪谤”。押解太监的兵丁和住宿的店家无不目睹，其“凡遇村店城市高声呼喊：你们都来听新皇帝的新闻，我们已受冤屈，要向你们告诉，好等你们向人传说。”甚至有太监叫嚷：“只好问我们的罪，岂能封我们的口？”

当流刑广西之太监的行踪逐渐浮现时，湖南那边王国栋巡抚正为妥善执行雍正谕旨中的第二项命令而煞费苦心：将曾静新近口供中所提到的三个湖南人逮捕归案。王国栋向来办事有条有理，他与驻湘军官及人犯所在各县的县令联络，仔细布置了所有事宜。永兴县郎中陈象侯首先被捕。陈象侯供认，他确实见过曾静，那是六年以前的事了，当时曾妻病重，曾静请了他去出诊。很自然，两人谈得颇为投缘，话题并不仅限于曾妻的病情。在交谈中，陈象侯讲述了从茶陵州堪舆陈帝西那里传出的故事。不过，虽然陈象侯转述了这些传说，他本人并未见过陈帝西。那些传闻，包括岳钟琪将军上谏本，劝皇上修德行仁的话，都是从一个武秀才那里听来的，当时陈象侯曾给此人治病，那是在他到曾家出诊的前一年。

逮捕曾静所指证的第二位人犯、安仁县生员何立忠也完全没有费多少功夫，虽然曾静最初口供把

此人的姓名何立忠误作何忠立。何立忠向王国栋供称，他多年来与曾静有过数次交往，不过称不上是朋友。一年之前，在何氏女婿的葬礼上，两人见过面。当时曾静颇不得体地说，死者生前见识浅薄，何氏就毫不客气地反驳说，当今之世，除了皇上，有见识者本是凤毛麟角。而连皇上竟然也宽贷了不知忌讳上奏本批评朝政的封疆大臣呢！何氏辩解说，这些话不过是闲聊而已，并非他自己造谣生事，都是听一个族人讲的，而该族人又是从堪輿陈帝西那里听到这种议论的。

陈帝西住在茶陵，该县位于安仁县东面与江西交界处的崇山峻岭之间，交通不便。不过捉拿陈帝西仍然相当顺利。当鞠审官向他出示包括陈象侯、何立忠及那何氏族人在内的这一系列名单时，陈帝西回称，他对这几个人都不熟悉。的确，他去年秋天应何氏的请求，到他家中看过风水。当他在工作的时候，何氏的连襟张氏正和其他人聊天，讲到在四川人们纷纷言说，一位叫岳将军的不知忌讳，上奏朝廷，劝皇上修德行仁。这位张氏还告诉众人，许多人都在传说张贴在四川地方一座诸葛亮祠外的一首诗。诸葛亮字孔明，是一千四百年前蜀汉政权的丞相，一位传奇式的政治家和战略家，是中国章回小说和历史中屡屡描述的人物。当时中原曹魏、蜀汉及东吴三国鼎立。诸葛亮力图统一分裂的中原，终于因为强敌当前、内援不足而功亏一篑。

当时张氏还向在座的人们背诵了那首诗，而陈帝西本人对此诗亦记忆犹新，当场将诗一字不差地念给了承审官听：

孔汝仅留二八邦，花木流落在四方。

秦楚士卒千万丈，郊外东方荒又荒。

秦晋兵来燕赵地，秋后鸦雀尽无粮。

四民遍地遭淹没，天下从此动刀枪。

若问人民太平日，除非山山口口藏。

王国栋竭尽全力想找出各口供的破绽，弄清真相，但无论他如何严厉审讯，总是得不到满意的回答，因而无法获得前后连贯的分析。一如他在向雍正呈递的奏折中无可奈何地承认，各种口供相互矛盾，也没有人肯承认是自己最先听到孔明祠中的诗作，或关于岳将军上奏本的传说。原本应是交叉质讯的审问，竟变成在堂堂巡抚大人面前上演的又一回合的同谋犯罪。

雍正在王国栋折子上的朱批语气十分震怒，且显示出对湘抚的轻蔑：“你地方上百姓如此风习而不能觉知，而不肯奏闻。他处发觉，特命钦差来究审，而又不能将此等一类匪物究出！今从京指名交与你数人审究，原为恐奸民间风远扬，方着你就近作速设法诱问。今但将此已经问出口供，而令彼此推卸。耽延时日，总不能体察其出之谁口，亦可于谓才德兼全、忠诚任事之巡抚矣？”雍正最后说，着王国栋将所有人犯解押京城鞠审，若再有新发现

罪犯，亦一概递解进京。

雍正日前已经任命了一位官员到湖南履新，与王国栋共审涉及曾静一案的人犯，这表明皇上对湘抚无能非常恼火。此位新任官员叫李徽，官职是湖南观风整俗使。数年之前，王国栋就曾出任浙江观风整俗使，可见雍正已把湖南与几年前民风败坏的浙江等量齐观了。如今

王国栋和他的新任同僚只有在案情上取得实质性突破，才可能挽回圣心，恢复皇上对湖南的信任。他们似乎是有那种希望，因为有一个湖南人出乎意料地来到李徽的衙署报告，称长沙有一个邮站的管事是曾静的挚友，两人长久以来互通书信。这一消息令人振奋，王国栋、李徽等不及核查细节就向雍正上奏具呈。可是再作深究，发现此事纯属子虚乌有，该邮吏从来就不曾与曾静有任何往来，告密者原是邮吏的手下差役，不过想从告密得到朝廷的好处。于是，王、李两位大员还得赶紧向雍正奏明事情的来龙去脉，请求皇上处分。

王国栋等因为接到皇上的训斥，便再次提审陈帝西，可是结果也好不到哪里去。一开始，案情似乎有峰回路转的可能：陈帝西交待，上次被审时所列出的造谣生事者尽是凭空捏造，他之所以将这些人举发出来，全是由于个人恩怨，有的人在他生病时无情无义，有的人曾对他暴力威吓。实情是，他于1728年夏天第一次听到有关岳将军上奏本的传

言。那年他去衡州城为母亲购买丝线，因为天气酷热，他就在一个小凉亭喝上一杯茶，乘凉歇脚。这时有四个说官话、穿马褂、像是旗人的官爷及一个挑夫模样的人，走到凉亭中。他听这四人还互相议论，说“岳老爷上了奏本，不知忌讳，恐怕不便”。因为自己是平民百姓，见他们语带官腔，举止行为颇像京城八旗禁军，当然不敢询问细节，也没胆量去问其身份、姓名。不过他倒是问了挑夫，这些官爷往何处去，那人回说“，往城里去”。

至于上次应审时陈帝西背诵的关于诸葛亮的那首诗，事实上并非是从家乡的邻居处听到的。那不过是一个谎言而已。陈帝西供称，去年10月，他去衡州买锅，经过同年桥时看到一大群人在围观什么，忍不住也跑去凑热闹。但见人群中央是一个长须白发的老道，身背一只葫芦。这老道看似九十多岁，自称年已过百，桥上挂的招牌是“云水道人，善观气色”。另一个招牌是价码，谓八个铜板为君算一个前程。陈帝西于是也去排队，想让他算上一命。就在排队的时候，他注意到桥柱上贴着一张白纸，上面赫然抄写着那首关于诸葛亮的诗。因为闲着无事，他趁这功夫多念几遍，就背了下来。陈帝西又说，身为同行，他不得不承认这个四川老道确实有两下子，因为老道真的把他算得很准。

这些重新审讯而得来的故事的确古怪。不过雍正正在得到湖南官员的具折后并未给予特别的谕示，

既无责备之意也未褒奖，甚至并不令他去追查那背葫芦的白头发老道的来龙去脉。雍正这次宁可隐蔽自己的意图。毕竟，那个堪輿很快就会被解送到京城了，将会与其他逐渐被逮捕的人犯一起，受到严厉的鞫审。

雍正皇帝也没有忘记另一个重要的角色：那个在 1723 年假冒进士王澍的人。在人口广大、地域辽阔的中国要找到这样一个人不管他为何方神圣无疑海底捞针。不过雍正自有他的主意。雍正谕令掌管官员任命及档案的吏部彻查旧档，检视是否有如今不知去向的候补官员，或者自称廷试中榜且出任皇子伴读的进士？落入这两条标准的人不可能太多。

确实不多。事实上只有一位，一个名叫王倬的苏州人。此人曾在靠近湖南的湖北西南某处担任武职，但康熙末年时因为官僚机构的重整而丢了饭碗。按规矩，王倬应该向吏部备案，申请新的职位。可是此人从此杳无音讯。这条线索立即由怡亲王及其他内阁重臣布置下去，两湖官员紧锣密鼓，通缉王倬。功夫不负有心人，王倬终于被逮捕归案并解送京城，由日前赴湘主理曾静等湖南案犯审问、如今协调全案审理的杭奕禄亲自鞫审。杭奕禄并且亲自将王倬带往关押曾静的监狱，让两人互相对质。结果，曾静这辈子根本就没有见过王倬。王倬并非王澍。



于是浮现了另一个假设：这个假冒王澍者可能真的认识真正的进士王澍，也许还曾替王澍办过差使。但是目前致仕于太湖之滨无锡的王澍实在难以回想出，多年来在其幕僚或家塾中有任何湖南人，或长相与曾静所形容者有近似的人。这年夏天，北京的承审官员们请来了一位画师，让他根据曾静的描述画出一幅人物肖像。这幅假冒王澍者的肖像到处散发，让所有可能与此人有所接触的各色人等辨认，但是仍然没有结果。

这真是一场漫长的追逐战，无数疑问悬而未决。一个口诛笔伐和持续追查的夏天就快结束了，不过雍正对于案情略显松垮的进展并不十分担心，当日曾静案爆发之初雍正的忧心远甚于此。正如他在鄂尔泰密折上朱批所说：“遇此怪物，自有一番出奇料理，卿可听之。”当夏日渐渐来临之时，雍正已悄然无声地把注意力再次转向曾静本人，一步步地将这高深莫测的朱批谕旨付诸实践。

## 第七章 攻心为上

1729年6月，雍正皇帝开展一场针对吕留良等人的批驳，并下令追查、审讯由曾静口供而引出的王府太监并湖南的堪輿、郎中、生员。此外，雍正还收到云贵总督鄂尔泰的密折。该奏折是他收到去年12月有关曾静一案的长谕之后，向雍正所递的，包括其感想及建言。年前的那份长谕是那样的开诚布公，而且流传全国，雍正对此并不后悔。不

过此后采取的一系列行动表明，雍正一直在思考如何有效地反击曾静的指控，廓清至今困扰其政权的种种谣言。鄂尔泰仔细周全的建言也暗示，那份长谕虽然回答了一些疑问，但其所生出的新问题恐怕更多。而且，将曾静描绘成一个被吕留良遗著所愚弄的乡下秀才这一策略，也缺乏说服力，不太奏效。或许，仅仅贬低曾静这个秀才，仅仅揪出谣言根源的做法并非上乘之策。相比之下，何不出一奇招，让曾静深刻检讨，作出自我批判！这样的话，曾静就站到了朝廷的一边，从一个不同寻常的谋逆罪犯转变为一个诚心归向的合作者，一个朝廷的喉舌。要使曾静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必须仰赖攻心战术，而不是依靠惩罚的手段。而攻心当从摆事实开始。

1729年7月27日，雍正皇帝正式起用了这场全新的招数。这天，雍正通过内阁向负责曾静一案处理的杭奕禄、海兰发出谕旨，令他们从当天起向曾静提供有关政府运作的材料。雍正在上谕中写道，在其各种文字著作及口供中，曾静一再宣称，其叛逆之心全起于岳钟琪厌恶并不信任皇帝的念头。所谓的证据则是风闻岳钟琪两次拒绝朝廷令其进京面圣的谕令。因此，曾静改过自新之途的第一步就是要使其重新端正认识，认清雍正、岳将军君臣亲密无间、彼此信赖的关系。雍正特别降谕内阁交给杭奕禄一批朱批奏折，乃数年来岳钟琪的密折及雍正的御笔亲批。杭奕禄则将亲赴关押曾静的大

牢，将这些宫廷密件交给曾静，令其细细阅读体会。一旦曾静读完奏折并写下反省，再将所有文件交到张熙手中，让这位信使阅览。雍正最后说，曾静师徒所看到的奏折也不过是冰山一角，尚不足以让其充分认识他对于岳将军的恩宠殊遇。

为了进一步显示其宽恕大度之心，雍正又发出一道上谕，将曾静的老母及幼子释放。他们自这年春天与其他犯人一起从湖南押解北上以来，一直被关在监狱中。七月的北京骄阳似火，令人难熬。如果曾静的老母幼子继续滞留狱中，极可能就此而命丧黄泉。有些被困的曾静案中犯人已经力不能支，需要医治了。

曾静在狱中读完了那些朱批奏折后，便按照杭奕禄的指示，开始写读后的感想。一开头，曾静中规中矩地忏悔其愚昧的行为，对于朱批奏折所披露的雍正岳钟琪之间的君臣关系深表惊讶。然后，曾静定下心来，竭力仔细地回忆造成他误解雍正岳钟琪君臣关系的原因。曾静重新检讨了其先前有关岳将军的流言来自邻居的口供，并唤起了新的回忆。他说，许多说法闻之于前往四川移民途中经过他家门口的各式人等。这些人主要来自湖南和广东，大部分似乎都听到过西部有一个叫岳公爷的，说他爱民如子，深得百姓拥戴。然而，这些人并不真正知道他们谈论的这位岳公爷的名字和官职。

曾静上禀皇上，当初听到这些传闻后，思量这

和以前获得的关于陕西总督岳钟琪的事迹大相吻合。而这些消息的来源是住在邻近的生员何立忠，时间则大约是在 1727 年底冬天的时候。曾静上次已经把何立忠的名字和湖南的堪輿及郎中的姓名一起供给承审官了。在他看来，何立忠乃是所有谣言的发源地，且其当初所讲的一切，曾静似乎全想起来了。曾静此时下笔如有神助，连篇累牍地将何立忠“在永兴县十九都石村低声告诉弥天重犯的话”写下，呈给雍正。在何立忠的口中，那些传言生动具体，有板有眼，充满了恐惧和阴谋，而讲述者竟对故事主角姓甚名谁不知所以然，更使情节显得扑朔迷离。据何立忠转述，皇上一再传谕该总督进京面圣，意图趁机剥夺其兵权并将其处死。但该总督对皇帝深具戒心，拒不赴命。皇帝无可奈何，只得请出大学士朱轼作保，保证该总督的安全。朱轼原是该总督当初出任官职时的推荐人。结果，总督一到京城就上书皇帝，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皇上看他坦荡无惧，勇气可嘉，态度稍稍有所改变，允他回任。但总督拒不接受任命，说除非有人担保他，方愿成行。但朱轼不愿再作保人，其他大臣也无一肯出面保他，最后还是雍正亲自保证该总督可以安心无虞。然而，该总督才离开京城四天，就有人举发他图谋造反。皇帝派了亲信侍卫吴荆山命他回京，该总督不从命，吴荆山无法向皇上复命，只得自杀以谢罪。总督一回西安，就上书皇上，谴责

其背信弃义。

后来，曾静听住在永兴县十八都的郎中陈象侯转述堪舆陈帝西有关岳钟琪向朝廷奏本的话，茅塞顿开，原来所有这些传闻都指同一人而言，而此人就是川陕总督、宁远大将军岳钟琪！曾静对此不禁大为感奋。他说，因为这些传闻，加上眼见湖南两年来农作歉收，又受到吕留良华夷之辨思想的毒害，自己叛逆狂悖之念由此而获得滋生的土壤。曾静最后说：“除前此所供外，实实未有别人传说。”

在雍正看来，让曾静接触朝廷公文的原件以触动其反省之心的策略是行之有效的。因此，雍正决定让曾静进一步认识国家大政的运作机制，以及他阴谋推翻的皇帝是如何日理万机的。雍正于是又下了一道谕旨，令杭奕禄收集各省数百份奏报给曾静阅读。这批公文来自各省总督、巡抚及其他大臣，内容涵盖各类事务。雍正要让曾静亲眼看一看，皇帝对国家大事的朱批谕旨，了解皇帝与岳钟琪如何精诚合作处理军国大政，更看清其逆书一案及其处理在整个王朝千头万绪事务中所处的位置。曾静一读完这批新的材料，立即提笔写下感想。曾静对于雍正皇帝事无巨细、无不留心的办事作风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雍正批阅各地上奏从不掉以轻心，孜孜不倦，所以连字句笔误、数字不合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曾静还注意到皇帝对各地奏呈的祥瑞明察秋毫，并不枉信如：安徽学政上奏说发现了象征吉兆

的灵芝，山东曲阜衍圣公报称亲见祥云，都被皇上驳回。甚至福建总督高其倬也被雍正斥责，因为前者在一份报告贪墨案的弹劾奏章中犯了疏忽的错失。曾静还看到关于处理福建官员马姓家臣的密折，深受震动，正是此人散布了将在福建全境捕杀男童的恶毒谣言。曾静上稟雍正，这正如他在另一份奏折中所见指控江西巡抚巴兰泰残暴的谣言一样，实属无稽之谈，而自己竟有幸亲眼目睹有关此案来龙去脉的奏章，令他百感交集，因为他过去肯定会采信这一类流言并写入自己的著述。当然，自从离开长沙以来的几个月内，凡事不复相同。如今，铁证如山，令他自叹乃“蝼蚁度天，何处测其高深”。

曾静无意归纳各份奏章，也未对皇上的朱批逐条评论。他竭力写出自己在阅读了堆积案前的奏折及朱批之后所受的总体感受：“今伏读圣谕，而知我皇上浑然一理，泛应曲当。其施之于刑政，见之于德礼者，无一知不处之极其精，无一事不知之极其当。”

曾静进一步发挥道：当今皇上的德政其远可与古之圣王明君相比，其近则接踵圣祖康熙之文治武功。不仅如此，皇上以天下大计为重，夙夜祇惧，不遑寝食，其勤政任事的作风更是令人钦佩：“自朝至暮，一日万机，件件御览，字字御批。一应上任官员，无论内外大小，每日必逐一引见，谆谆告诫以爱民绥抚之。至意事，至物来，随到随应，不

留一毫不周不密不精不当之憾。直到二三更，方得览批各省督抚奏折，竟不用一人代笔，其焦劳如此。”曾静归纳说，如今他总算完全明了自己的罪愆，看清污蔑皇上人格之种种谣言的卑劣，更洞察了吕留良之辈的悖逆本性。

曾静提及了所谓皇上对于“刑”，也即司法问题的处理，这和雍正一段时间来一直考虑的另一个补充性目标不谋而合。雍正极欲使曾静了解大清司法行政的执行过程，特别是他慎重民命、亲自勾决囚犯、宽宥死刑犯的皇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雍正在一道由杭奕禄转交的特谕中告诉曾静，他已亲自列出一系列当年春、夏两季送朝廷三复奏的案子。按照雍正二年四月的上谕，地方秋审情实人犯与在京审为情实者一样，要行三复奏，以慎重民命。所以死刑案必须分别由各地督、抚，或刑部呈送皇上亲自决囚“，往复讲论，至再至三，然后降旨”。雍正早先读了曾静在离开湖南前写的那份长篇笔供后就决定，要让该谋犯知道这些情况。

在那份笔供中，曾静特别交待，他深信皇帝“极好杀人，京城凛凛”。若要有效地铲除这类莫须有的指控，雍正相信，事实胜于雄辩。因此，雍正通过杭奕禄交给曾静十多个死刑案的卷宗，这些案件合在一起，足以呈现清朝司法行政的概貌。雍正令他静心细读，对每一件案子的判决表示意见，特别让他反省，这中间有哪一件可以说明皇上“极好杀

人”？雍正特别颁下旨意，曾静必须完整无误地交待经何人、在何地听到皇上残暴好杀的流言。

所选之案件恰好来自六个不同的省份：位处西南的云南，地处中部的江西和安徽，濒临东南沿海的浙江和广东，及坐落北方的山西。案件所涉及的犯人年龄、职业各不相同，所犯罪行形形色色。其中，年龄最大的达八十二岁，是一名籍贯云南的寡妇。该犯伙同其三子殴打一男子致死后，又企图趁夜焚尸毁迹。云南臬司审定该寡妇为主谋，当斩首；其子以从犯判绞刑。雍正细细披览招供，心存疑问：一个八旬老妇有何精力殴人，又搬来一大堆稻草焚尸？此外，夫亡从子，家中已是长子当家，本该阻止老母犯罪，何以不见阻拦反而相助？显然这是一桩共同谋杀案，没有理由单单将老妇判得更重。因此，雍正下令复审。不过，雍正也表示，并不是说一定要让一个做儿子的去为所有此类案件负全责。在另一件复议的案子中，家中与他人斗殴时儿子出门在外，事后父母招其回家，共同谋事。显然做儿子的是出于孝道，未敢违背父母之命而犯罪，则虽有罪而犹有可逭之处。

在曾静看到的其他几件殴打或谋杀案中，雍正解释促使他改判原议的细微因素。发自广东的案子是讲谢氏家族为了分割一块原来用以提供祠堂开支的田地而发生争执，乃致侄子重伤叔父。按律，这种以下犯上、伤害长辈的行为属于死罪。但其中



到底是谁抡的大棒，是谁先出恶言挑起了武斗，尚未查明。另一件来自江西的案子中，一个妇人的情夫杀死了妇人的丈夫，于是奸妇也因违背伦理而被判处绞刑。不过雍正对此判决有所疑问：妇人事先对谋杀毫不知情；妇人与她情人已相好很久，而非在谋杀之前突然有事；该夫妇长久不合；该夫妇仍共同照顾八岁的儿子。所有这些都表明，该妇人不会因杀死丈夫而获得好处。因此，她缺乏犯罪动机。又如安徽的案子，是说弟弟用沉重的酒坛砸死了兄长，因而处以斩首。同样，也有细节可以推敲：两兄弟向来和睦，这次却为了一笔小钱而起了争执。兄长先捡起酒坛向弟弟打去，但未击中，弟弟便随手捡起酒坛掷回，结果打死了兄长。所以事出偶然失手，并无预谋在先，与一般谋杀性质不同，当可复议。

另一个案子是被害人本身有这样或那样的过失，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案件的发生。浙江呈送三复奏的案子中，曹氏用一块木块殴打其妻致死。问题是其妻本身行为有失妇道：丈夫要妻子端一杯茶来，做妻子的不情不愿，在曹氏的责骂之下，那妇人不但不愧疚，反而用石块掷丈夫。曹氏情急之下才拿起木块殴打妻子。吏司判曹氏死刑，当绞死。但雍正推翻了原判，理由是做妻子的先违背了“夫为妻纲”的伦理道德。雍正写道，判曹氏颈戴重木枷已足够了戴木枷的犯人可以呼吸自如，但难以自

行进食。皇上认为，这样的处罚足以让曹氏获得教训，将来不再动粗撒野，也可以起到警醒其邻里百姓如何搞好夫妇关系的作用。

最后一类要曾静去体会的案件中的罪犯是身触法网而不知者。山西的张某确实聚众抢劫，但并非出于本意。他是受了姓李的瞎子抢夺烧毁地契以偿不公的挑唆，才犯下大罪。雍正因此敕免张某死罪。另一案中，三个囚犯越狱潜逃，按律当加重处罚，乃至处以死刑。但雍正考虑到因其不明后果的严重性而犯罪，从宽不予加罪，维持原判。不过雍正谕令各地监狱，今后将越狱后果及当受刑罚明示在押罪犯，则可对此类案犯不再法外施恩。

虽然张仙的案子与上述数案不同，但也属于不知律令而触犯法网的情形。张仙因私自非法铸钱而被判斩首。但据张犯交代，他以制作并贩卖铜器为业，但因朝廷下令禁用铜器而断了谋生之道。不得已，张仙竟将余下的铜料铸钱。这虽是大罪，但视其犯罪原因，情有可原，雍正令刑部复议。

曾静将案子一一读过，又分别对各案稍作评论之后，向杭奕禄回禀其感受：一言以蔽之，他对皇上印象顿改，至今乃知昨日之非。皇上以德治国，刑名是非之判断皆出于道。所谓律法无情，天道可恕。律令不可随意由人，但道则能因时而变，因地制宜。故皇上宽恕以仁，法外施恩。曾静说，既然知过，何敢再存皇上好杀生、轻人命之心！至于皇

上严谕他交代经何人、在何地听到残暴好杀的流言，则实在是无法确实交代，只得深悔自己愚昧无知、天良尽丧，听信了流言蜚语。

雍正深信，大量的奏章公文应该使曾静对治理国家之难有了相当的认识，但未必令其对国计民生、财政经济有真正深入的了解，而这后者是曾静悖逆思想的滥觞之一。为了达到对国家经济的认识，就必须专注于某些特定的问题。曾静看到的张仙一案所涉及的钱法就是这样一个绝好的例证。张仙案发的时候，那是1729年夏。禁用铜器的政策已经行之数年，雍正颁之天下，视其为帝王以国家大局为重，制定律法，而不惜得罪少数人的一个榜样。禁用铜器的主要原因是，市场上铜器的售价超出了铜钱本身的面值，所以只有禁用铜器才能防止人们毁化制钱以取铜料，再用铜料制作黄铜器物出售谋利。因此，从长远的利益看，铜禁是保护钱法的需要，既保证了足够数量货币的流通，又有利于杜绝私铸钱币，从而使国家经济更健康发展。在雍正看来，铜禁与禁止屠杀耕牛一样，是为了更大的整体利益而制定的律令。禁宰耕牛遭到许多回民反对，视之为针对回民的政策。事实上，禁令的目的是增加耕牛数量，因为只有深耕才能保证农田质量，繁荣农业生产。由于市场上牛肉价高，许多农民为了谋利而宰牛，甚至罔顾禁令如故，结果农田不得深耕，收成自然就差。相同的例子还有禁赌。

禁赌令并非针对个别赌馆而发，而是阻止人民陷于荒废正业、无所作为，乃至摧毁整个社区的道德精神。

因此，在整整一个夏季，雍正又给曾静送去了大量有关这些民生问题的朝廷公文及他的朱批谕旨。雍正有关钱法的辩驳与曾静对于雍正制钱的攻击也有关联。曾静在《知新录》中说，雍正登基以来所颁制钱质量差，铸字模糊，因而人人鄙弃，不愿使用。甚至有谚语唱道：“雍正钱，穷半年。”人们宁愿把雍正制钱弃之沟渠。对此，雍正解释道：铸字是否清晰、图形是否鲜明取决于铸造铜钱时铜和铅的比例。在以往的制钱中，这个比例也大不相同，如 16 世纪中叶时的制钱中铜占到九成，而 17 世纪 20 年代的制钱中的铜却不足三成。康熙制钱按圣祖之意，为铜六铅四，因而外形美观，字迹分明。问题在于，正因为用铜较多，所以人们利欲熏心，竟毁化铜钱私取黄铜，再以锌、锡等金属与黄铜调和，制作铜器贩卖。由是铜钱流布日渐减少，从而造成钱贵银贱的现象，制钱与银子兑换的比率不合理地增高。至 1706 年间，一两银子本应换一千文制钱，却只值七八百文了。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为了恢复正常的钱币流通，雍正才发布铜禁律令，并且今后铸钱一律铜铅各半，使毁钱取铜者无利可图。谣言传说，铜禁是出于宫廷皇家贪得无厌，又说是为了收集黄铜在满洲建立铜铸宫殿，实乃荒唐

无据的诽谤。

雍正指出，铜禁和钱法的实行有助于恢复经济，行之有效。目前钱银兑换已回到一两银子兑换一千文制钱的兑率。这显然比美观的制钱重要得多了。当然，制钱要流通到偏远地区，需要较长时间，但作为硬通货币，因为可以直接交换粮食、燃料，也可以兑成银子，所以最终会广为流行。雍正问曾静：是谁告诉你那些关于雍正钱的故事的？难道你曾亲眼见到有人弃雍正制钱于沟渠？如果确实见过，则是何时、何地、何人？江苏、安徽诸省之中，雍正制钱广为流通，乃至比同样面值康熙的铜钱更为流行，何以在湖南竟会大相径庭？

曾静再次上复雍正年及，他实在无言以对，因为他所记述者，不过道听途说而已，并无真凭实据。他身处穷乡僻壤，几乎不见货币流通，只惯用以物易物的作法，所以他对此类谣言深信不疑。而当他终于有机会一睹雍正钱真面目后，也似乎证实了其较康熙钱制作为劣的传闻。更为甚者，这些字迹模糊的制钱让他相信了听到过的指控：铸钱的工匠因为无法制作更好的钱币而被皇上斩首；铜禁的目的是搜集全国的铜料以铸造铜宫。曾静最后说，假若朝廷命官能在各地，尤其是偏远乡村明白解释皇上的铜禁政策、钱法，那么就不会有如此大的误解。同样，如果按古之先贤所倡，成立由当地乡绅士缙领导的乡约，则朝廷政策可在其每月例会上向百姓

宣讲。可是目前的情形恰恰相反，由于政策宣传不力，乃至“以讹传讹，传妄躁妄”。就其本人而言，只是在见到皇上亲自解释种种律令及制定的原因之后，才茅塞顿开的。

在这个夏季里，雍正通过杭奕禄向曾静连连发问，两人之间关于经济财政的对话未曾间断。雍正有的提问颇为尖刻，比如：何以全国各地即或有灾也是程度有限，唯独湖南风雨失调，屡受重灾？难道不是因为有尔曾静之辈居于彼地，冀图谋逆，招致上天发怒，引发洪水？为何曾静在著述中对朝廷救灾济困的种种努力轻描淡写？朝廷奉皇命调济各省粮米、银两，并非从中渔利，而是为了平抑粮价，互通有无，何以曾静对此视而不见？雍正又质问曾静，尔书中称人民“虐我则仇”，不知其例何在？所谓受虐之人居于何处，所怨为何？曾静只能笼统回答说，这些百姓确实存在，如居于长沙以北洞庭湖畔的农民，在洪涝灾害中丧失家园、无以谋生，其呼天抢地而不应，虽然朝廷略有救济，却无济于事，大部分农民被迫移民他方，而无力移民者不得不自谋生计。

皇上和大逆之徒之间进行书面对话的详细情形，只有少数枢臣如杭奕禄及内阁大学士知道。雍正急于让这种讨论深入而广泛地进行下去，但朝廷上下期待他议曾、吕等人罪行及刑处的谕旨，却久久未有反应。于是在7月下旬，雍正采取了新的策

略。这次，雍正所利用的是陆生楠案。陆生楠是广西人，举人出身，曾任江南吴县知县及工部主事，以无能倨傲革职，并发往军前效力。雍正提醒内外大小臣工，陆生楠发往北疆军中，原意藉此令其收敛，知晓纪律、艰难之意，从而端正认识：“一则令其观满洲尊君亲上之心，如此其谨凜；一则令其观我朝兵营之制，如此其整严；一则令其观蒙古部落熙洽淳朴之风，如此其诚实。庶冀伊等化去私邪，勉于自新之路。”雍正也希望陆生楠得益于由此行而对中国历史有更准确的了解：正是明朝的前代王朝蒙元将中国的统一和秩序带给中原以外的人民，正如两千年前的秦王朝第一次统一中原一样。现在，大清王朝任重道远，既要巩固历朝各代的成果，又要继往开来。雍正对大清的文治武功颇为自豪：“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也。”

雍正在7月的谕旨中斥责说，陆生楠不以前谬为鉴，反而利用在军中的闲余撰写《通鉴论》十七篇，论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封建政制之利，言辞狂悖，诽议时政。雍正指出，陆生楠曾涉及李绂、谢济世科目朋比案，彼等结党互援，徇情瞻顾，更沽名钓誉，不务实政，败坏其家乡广西并京师风气。陆生楠并借已故先帝皇八子阿其那向皇上发难，称“蓄必深，发必毒”，暗示对阿其那因怨恨过深而处理过狠。所以，就其叛逆思想而言，陆生楠与曾静、吕留良同样狂悖恶乱无异。不过，与孤陋寡闻、独

自行事的曾静相比，陆生楠罪恶更大，因为他出身书香门第，又蒙引见，由皇上亲自由一外任知县简拔为六部职官，而他不但报恩遇，反而借古讽今，泄一己不平之怨怒。雍正谓陆生楠“罪大恶极，情无可免”，当斩。六部、九卿这次反应迅速，两天之内完结复议，认定陆生楠确实其罪当诛。判决并未立即执行，以观其是否有悔过之意。但陆生楠不改初衷，毫无悔意，遂于该年12月在军前正法。

从此案也可见出雍正的权谋风格，这一点颇得乃父圣祖康熙真传：虽然他是具有绝对权力的君主，朝廷上下没有任何正式机制可以限制他的作为，雍正每逢重大决策，总是征求内阁大臣的意见，取得道义上的支持。曾静—吕留良案正是需要朝廷内外取得一致意见的大案，雍正在采取下一步行动前竭力想取得舆论的背书：显然，尽管曾静蓄意谋反，他有意宽宥；虽然吕氏都死了四十五年，他却要加以严惩。大臣们对于处死陆生楠毫无异议，反应迅捷，何以对吕留良案就如此不同？这些大臣们为何不能明辨，曾静与那些科甲官员、名世通儒之间是如此地迥然不同？不管雍正如何暗示，就是不见内外朝臣有任何动静。夏去秋来，10月28日这一曾静逆书案的重大日子去年这天，张熙冒死拦轿，向岳钟琪呈上逆书也在无声无息中过去了。

终于，雍正失去了耐心。11月2日，雍正帝降下严旨，纵论种族、罪案、臣子责任，向满朝官



员施加压力。雍正正在谕旨中说，从古至今，所有的帝王为了取得并维护政权，无不既关心民生，又争取百姓信任与爱戴。此即“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的真义所在。雍正引经据典以两千多年前的《书经》所载之“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来证明其立论，认为该经籍的不少段落都显示，帝王之所以得以为国之君王，乃是生民选择有德之人，而不是据其出生之地域。雍正质问：大清开创太平盛世，为中国带来统一，使中国疆土辽阔，何以汉人仍作“内”、“外”分别，称中原之外人民为“夷”、“狄”？不同的衣冠和打仗风格又与治理国家之技能有何必然关系？古之如虞舜、文王，如今被尊为中国的圣王，但在当时诚属“夷”、“狄”，但这何尝有损其圣德？而不少大恶大奸之徒不也是汉人吗！历代以来，无数君王丧失政权，也并非由于其所自何来，是华是夷，而是疏忽德政的结果。孔夫子身处春秋时代，诸侯割据之时，亦尝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因而一国之疆界乃至语言无不随时代之变迁而更改：如今之湖南、湖北、山西都曾是夷人之地；对于不同族裔的攻击和侮辱，诸如南人贬低北人为“索虏”，北人诋毁南人为“岛夷”，是历史上特定时期的产物，而今竟然历代相传，成为万世不移的偏见了。

在此圣谕的其余部分，雍正纵横捭阖，谈论其他种种论题。他列举历史上无数英雄豪杰试图改朝

换代，但毕竟因为丧道失德，即使得逞于一时，而终于自食其果；他思索人类之所以有别于禽兽的伦理大义；他从各个角度考虑汉人百般挑剔外族的傲慢与牵强的逻辑推理，而对外族恢复中原和平、繁荣的贡献却视而不见。明末之际，战火颇仍，大清“出薄海内外之人于汤火之中”，功不可没，而反观明朝军队，却滥杀人民百姓，充数邀功。按照雍正的估计，明末李自成起事反叛以来，整个中原成为战场，至少半数百姓死于战乱，以及战争带来的动荡、饥荒等人祸，四川一省更是死伤惨重，那些幸存者竟有被叛军将领剜目去耳、残足伤手者。对四川人民而言，那场叛乱宛如恶梦，六十年后的今天，老人回忆起来，仍然伤心欲绝！然而，即使事实如此，反清的谣言仍然间有所闻，打着恢复明朝汉人江山旗号的起事者依旧层出不穷，这些人与以往不与朝廷合作、遁入山林的隐士大不相同，野心勃勃。面对此情此景，雍正感慨系之，真有不知何从何往的感觉。

雍正继续揭示道，叛逆吕留良之辈的恶毒正在于此。在吕氏眼中和笔下，宋亡于元后，天地为之变色，匡古未有之恶兆星相接连呈现当朝。这些悖谬思想由吕氏的门生严鸿逵继承，再传于曾静。于是曾静内心“幻怪相煽，恣为毁谤”，以致有“八十余年以来天地昏暗，日月无光”这类狂言。

雍正最后晓喻内外臣工，吕留良、严鸿逵、曾

静之流乃“逆天背理、惑世诬民之贼”，朝廷将其罪逆昭告天下“，晓以天经地义、纲常伦纪之大道，使愚昧无知、平日为邪说陷溺之人豁然醒悟，不致遭天谴而罹国法，此乃为世道之人心计，岂可以谓之佞乎？天下后世，自有公论。着将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悖逆之言及朕谕旨一一刊刻通行，颁布天下各府、州、县，远乡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并令各贮一册于学宫中，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览知悉”。在此谕旨中，雍正并未如上次一样，就如何刊刻印行的具体事务作出圣裁，也无一字提及令诸大臣上奏就此决定提供建言。

而朝中竟也确实无一人再上书奏论此案。11月19日，眼见满朝文武无动于衷，雍正决定重提此案，向臣子们施加压力。他降下一道简短的圣谕，称数月前已指示杭奕禄、海兰复审曾静案的所有细节，并通过杭奕禄向曾静发了问，而曾静也每问必答，详实交代。依雍正的判断，曾静所答“俱是悔过感恩之语”。不过，雍正又说，无论是何人落到曾静这般境地常常掩饰真实想法，或是因为惧死而假意认罪。因此，谕令九卿、六部再次会审曾静，就其是否“自知罪大恶极，愧耻悔恨出于本心”作出最后裁断，然后据实回奏。

雍正的谕旨直接、具体，且皇命如山，大臣们至此乃别无他途，只有遵旨办理。他们用了整整一

周的时间重审、议决，于11月26日上奏雍正其定讞结果。大臣们上奏的题本简捷明了，但这个定拟曾静之罪的题本并非雍正所期待的。曾静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提出了三条理由：蛰居于穷乡僻壤，孤陋寡闻；诸获罪皇子及家奴、太监散布谣言，搅动人心；吕留良著作的煽动。曾静又称数月来得以观览朝廷官书公文，对自己的行为有了充分认识，万分悔恨。如今目睹了朝廷的仁治和宽恕，以及为伤痕满目的中原带来的和平与一统，深知罪恶深重，惟盼皇上垂怜宽宥。

然而，根据朝臣们的意见，曾静之罪行清楚明白，实无可遁之处：听信荒诞无稽的流言，向学生们散布狂悖的思想，撰写逆书企图策反朝廷命官、封疆大吏。其所作所为，乃是惟恐天下不乱，搅事生非。既然甘心于蛰居生活近五十年，何以会突发狂念，策动谋反？显然于理不合，足证其悖逆之心向已有之。验之于中国历史，无论叛官还是恶匪，何尝有过如此乖张的行为？亲耳听闻曾静无止无休的口供，目睹其连篇累牍的笔供，诸大臣们无不义愤填膺。

于是，这些臣工们依据律令提出曾静当受的刑责。按大清律，谋逆罪当凌迟处死；其十六岁以上男丁亲属当处斩首或绞刑；妇孺发配边疆予披甲人为奴；财产没官。显然，大臣们无不认为，没有任何理由拖延此案的裁决：“伏乞皇上允臣等所请，

将曾静立正典刑，以彰国法，以快人心。”

当曾静逆书案发生以来，所有有关此案的上奏都是由个别大臣、有司衙门、或者内阁大学士等具名奏闻的。然而这次具结曾静案的奏请却完全不同：朝臣们显示了颇不寻常的一致，总共有一百四十八名大臣在奏章上署名。这些大臣的官职、姓名整整齐齐地列于奏折之后，阵容不凡，其中有负责京师所有事务的内阁之领侍卫内大臣、大学士；负责政府日常运作的六部之尚书、侍郎；专事弹劾的监察御史；掌收各省题本，保证中央与地方公文流通的通政使司之通政使；精通典籍、备选各级主考官和副主考官的翰林院之掌院学士、侍讲学士、侍读学士、编修；参赞财政规划、税务等经济事务之专门官员等等。曾静的忏悔并未令百官改变心意。律法无情，赦免断非大清律令所能容；皇上或可于法外施恩，但作为朝廷命官，其职责是依法断案。因而，诸臣工众口一辞，将其决断具呈大清雍正皇帝。

## 第八章 法外施恩

数月以来，雍正皇帝一直设法在满朝文武中间营造一种气氛，即引导他们看清曾静因受挑唆轻信而犯罪的实质，以及这种犯罪与真正的罪魁吕留良凶顽不冥、肆意诬谤之悖逆的不同。然而，六部九卿百官的奏章却毫不留情地要将曾静推上凌迟处死的刑场，这足以证明雍正的期待落了空。不过，

对于曾静处罚的意见是否同时意味着群臣也拒绝了皇上对于吕留良悖逆的判定呢？或者说，满朝文武是否试图彻底颠倒皇上的初衷，意欲将吕留良看成无辜受涉连者，而曾静才是祸首呢？至今为止，官吏们对于吕留良涉及逆书案所应定的罪名不作一辞，对于雍正一再催逼定案的要求仍以沉默相对。所以，雍正对臣下于吕留良所持的态度有点捉摸不定。

对于群臣所拟处置曾静的建议，雍正一开始采取了中庸的立场。雍正在 11 月 27 日降旨，向聚集在紫禁城乾清门外的文武百官宣谕，谓其完全明了，此案的严峻性质加上大清朝王法的公正无情令曾静死罪难逃。然而，他仍然决定暂缓勾决众大臣之定议，其理由是：第一，当初岳钟琪将军为了从信使张熙口中套出实情，曾立下盟誓永不背叛张熙师徒。岳钟琪乃股肱大臣，与皇上应视为一体，不可使岳背上失信、不忠的恶名，所以必须遵守盟誓；第二，许多恶毒攻击朝廷的谣言经过数月追查，无不是阿其那、塞思黑的太监和内臣所为。所以严格说来，曾静、张熙师徒只算是从犯，而非主犯。

至于曾静、张熙该如何处置，雍正认为本有先例可循。圣祖康熙年间，吴三桂谋逆造反，从者甚众。但一旦平息三藩之乱，康熙降下谕旨，凡一般妄从者，只要深具悔意、立志重新做人，则一概赦免其罪。同样的原则完全适用于曾、张二人。为了

显示整个案件因涉及方方面面而呈现的微妙性质，雍正命前直隶总督李绂亦到场听宣。李绂曾是雍正亲信大臣，因雍正整治科目人结党，将李绂以固结党援、徇庇师生等罪革职，目前正被关押在刑部看守严密的大牢之中，与曾静、张熙师徒竟为同狱之囚。乾清门外伏听圣谕的百官个个心中雪亮：三年前正是李绂任直隶总督时奉皇命“圈住”皇九子塞思黑。塞思黑于酷暑中戴铁镣、手铐，四面墙垣，仅能以转桶传进饮食，不久病死于保定。宣谕完毕，雍正只称日后将再有旨意，便命散朝。

从各省传来的通报显示，对于曾静逆书案之处理的不安并不仅限于京师内臣。一个突出的例子来自湖北。该省按察使王萧章对于攻击吕留良一事大感恼火，以致雍正都获得了密报。雍正在其朱批中写道，王萧章“含愤激切，一时昏聩，致失检点。不过皇上考虑到其并非出于恶意而决定不加惩于王萧章；况且，按照雍正的逻辑，如果王萧章确实心怀鬼胎，胆敢和朝廷作对，则必然难逃天谴。

另一份奏章是广东布政司使举发广州府同知朱振基平素以“性僻行怪”著称，一向公然供奉吕留良牌位以示尊崇。当他获知雍正于是年夏发出批驳吕留良的谕文后，将那牌位移到家中，而不敢再明目张胆地显示于他人。如果不是当地的四个生员警觉到其上司乖张的行为，并向省府大员举报，难保朱氏不会暗中继续敬拜为皇上所深恶痛绝的儒

士朱氏后来被逮捕查办，受尽刑杖之苦，于该年死去。

还有一份奏折来自浙江署理布政使。据该地方大员奏报，浙北大运河畔的富饶城市嘉兴有一位早已致仕的训导张昌言，不仅刻了吕留良的牌位，而且将牌位请到城内一座著名书院中供奉。这一叛逆的举动被城里另一致仕官吏揭发后，张氏立即被逮捕，当然吕氏牌位也被焚毁了。不过该布政使说，案发后张氏诚心悔过。当然，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张氏受到了严厉的鞭刑。

虽然上述各案可能互不相关，但却清楚地显示出，至少在三个省份之中，身居要职、饱读诗书的朝廷官员深受吕留良影响，其沉迷之深竟到了供奉吕留良长生牌位的地步，而这些官员包括执掌司法大权者和负责督导教育重任的官员，这不能不令雍正心生警惕。当雍正进一步理顺自己思路，以便对一百四十八名官员恳请处死曾静的上奏作出更为详尽的回答时，这些案件真正起到了警示的作用。

于是雍正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于 11 月 28 日下达了新的旨意。这与前一天于乾清门宣读的谕旨只相隔一天而已。很明显的是，雍正不仅仅是回拒京城百官的处理意见，他的言辞倒像是为逆犯辩解、请求宽宥了：“自古凶顽之徒，心怀悖逆、语涉诋诬者，史册所载，不可枚举。然如今日曾静此事之怪诞离奇、X 张为幻，实从古所未见。”此案



犯视大清律法为无物，确实令人发指。不过，调查此案的目的本身在于，查清曾静对皇上及大臣的指控是否确有所据。如若事实证明，其所谓言之凿凿者其实“字字皆虚，与朕躬毫无干涉”，则“此不过如荒山穷谷之中，偶闻犬吠鸮鸣而已”。

雍正正在谕旨中继续写道，诸多大臣可以作证，当他初闻此案概要时，仅想这不过是愚夫所为，不值一晒。但当曾静的亲笔忏悔超出千言万言时，他开始有些相信造逆犯后悔的真心程度。满汉区别、华夷之辨的观念实出自吕留良，这是人所共知的。同样，曾静关于皇帝的谬言乃是受到阿其那、塞思黑及其奴才散布的谣言的毒害。雍正说，案子从张熙呈递逆书至今，一年有余，他前后考虑良久，以为有一事极为清楚，那就是此大案的每一个重大疑点没有一件是源于曾静。因此，依其圣意，“曾静之误听尚有可原之情，而无必不可宽之罪也”。

因此，曾静的思想、行为无不源于各种可以追溯的谣言。为了支持这一论点，雍正洋洋洒洒地将自去年12月第一次长谕后的一年多来收集到的证据铺陈于人们的面前。各种有关案情的消息源源不断地传往内廷，其中最有价值的报告来自新任湖南巡抚赵弘恩。赵弘恩镶红旗汉军出身，是一位精明强干的官吏。显然，他比前任湘抚王国栋能干得多了，王国栋处事不力，令皇上不悦，已被调回北京。来自湖南的新证据印证了因曾静交代而被捕的茶

陵堪與陈帝西的口供，将其凉亭所见的四名旗人锁定为南行的前皇子府中的家将，虽然具体姓名尚待查明，但可确定前往广东无疑。这一证据使雍正得以解释为何曾静并非祸源，有宽宥的理由。从各种逮捕档案、审讯记录及羈押递往京师而审得的口供也获悉许多有关太监的情况。被发往黔粤烟瘴之地的太监所经之地、所居之客栈均已一一查明，其所讲谈闲话对象不无处于掌握之中其中还包括数名日后散布流言、危言耸听的妇人。

在这份九月末所发布的谕旨中，雍正还向诸大臣明言太监有关其十四弟遭遇不公、皇上改诏篡位的攻击。太监指控说，先帝康熙嘱意其皇十四子缙承大位，并立有遗诏。但雍正的一个亲信（隆科多）乘先帝龙驭上宾的混乱之际，矫诏将十四子念为四子，皇位遂落入四子雍正。雍正在谕旨中还转述了其他社会传闻，如“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指雍正）进一碗人参汤，不知如何，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皇太后要见被囚的儿子皇十四子，皇上不允，皇太后头触铁柱而亡；另一位圣祖皇帝的贵妃因其子被囚禁而自缢身死。

那些圣祖皇帝属意皇十四子继位的谣言通过雍正之口，点点滴滴地呈现在众臣的面前：康熙授其为大将军，出征西藏，以使其获得军事经验并在军中建立威望。雍正对这一流言逐层批驳，质问：父皇天纵英明，如何会在其年近体衰之际将中意的

皇子和大位继承者派往西藏？先皇当然知道，其皇十四子不可能在短期内横越半个中国回到京城安排继位之事。至于这位大将军率部兵变，也是绝无可能的：其远在西藏，而其亲信部下的家属皆安居于京师，无疑成了人质，怎么会听从叛乱呢？

雍正以同样的方式追查僻居湖南山陵之中的曾静所听到的其他种种流言恶语：皇上在杭州等地大肆兴建奢华行宫；皇上的贪婪、色欲、酗酒及贪财。追根溯源，雍正将矛头指向他那些心存怨恨的弟兄及其党徒，认为每一项谣言的廓清和批驳都使这几个前朝皇子的罪行日益昭彰。雍正信心满满地写道，其子孙后代将理解他何以采取宽宥之道对待曾静。惟有如此，才使他心安理得，因为“此朕不幸中之大幸，非人力所能为者。即此则曾静不为无功，即此可以宽其诛矣”。

雍正此番话的意思是，正是由于曾静的举动才引发出一连串的阴谋和谣言被暴露和批驳，因而曾静无意中反而立下功劳。不过，雍正指出，他自己并非“矫情好名而为此举”，相反，对曾静法外施恩乃是遵循古人所谓“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的教训。罪与罚可以各因犯罪者之悔过及诚心而改变，这就是何以“过大而能改胜于过小而不可改者”。

雍正继续申发说，除此之外，还有极为重要的一点：“曾静狂悖之言止于谤及朕躬，并无反叛之事实，亦无同谋之众党。”既然如此，何以不相信

其数月间亲笔痛陈的忏悔之心、洗心改面之意，免其一死？雍正深知朝中官僚对其决断并不心服口服，遂警告在先：如果有人视网开一面之举是曾静顺从圣意故作姿态的结果，则这些人不免落入“犬吠鸱鸣”一类，恰如曾静当初在其眼中一样。

皇帝最后告诉众大臣，他决意继续追查有关阴谋逆犯及散布流言者的各种蛛丝马迹，决不使一人漏网。雍正说，他也一直在考虑将曾静、张熙师徒的口供及证词，甚至那封逆书本身印发流通，以便使真相大白于天下，特别是使湖南地方人民了解真实的案情。任何对宽宥决定不满、或企图利用此事达到其非法目的者，皆会受到严惩；一旦曾静师徒返回原籍，其邻里不得作伤害之念。而其子孙亦不得以彼等曾蓄意谋反而重审此案，再作翻案、诛戮此二人，因为此案为其亲自料理审定，曾静师徒可谓“特旨赦宥之人”。

雍正在谕旨的最后说，与此相对照，吕留良案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其父皇从未知悉吕留良大逆罪行，因而赦宥就无从谈起。既然如此，他作为当今皇帝，就完全有权决定如何处置吕氏。雍正并说，假若圣祖康熙留有任何宽恕吕氏的旨意，他必定遵从并赦免吕氏之罪。

雍正这次降下谕旨，披露了许多内廷秘闻，再作详尽驳斥，而并无意于再征求诸大臣意见，这从接下的三天中雍正又颁两次谕旨可知。在那两份谕

旨中，雍正再次罗列其已亡故的和被圈禁诸弟兄的罪逆细节。显然，阿其那、塞思黑及皇十四弟允禵等的不臣之罪才是雍正的心头隐患，相比之下，其他各种案情就无足轻重了；赦免曾静也只是国家大政、内廷事务之外的一个小插曲而已。两次下旨再度申明朝廷纲纪，不仅痛斥阿其那、塞思黑及皇十四弟允禵雍正在历次长长短短的谕旨中早已多次历数他们更将其皇十弟允 X 包括在内。允 X 目前正被圈禁在紫禁城中，身不由己。雍正告诉朝廷官员，允 X 身犯不臣不忠大罪，惟恐掉失性命，竟在被捕后仍行镇魘之术以求逃过一劫。当然，此种伎俩并不能得逞。允 X 的一个亲信太监在获得赦免后，背弃旧主，向朝廷告发了阿其那、塞思黑及皇十四弟乘新皇初登龙廷、竭力巩固政权之际，阴谋策划，希图大位。而允 X 最终也卷入了这场阴谋之中。雍正向朝廷文武大臣坦露心迹，称即使此时此刻，当日诸皇弟结集势力，企图内外发难的情形仍然历历在目，令他唏嘘不已。

雍正皇帝对于处理曾静逆书一案的“出奇料理”，将皇室内部争位夺权的内幕牵扯在一起，上升到为臣之道的高度，这就给意欲发表异见的满朝官员以巨大压力。内外臣工既想作最后尝试，挽回圣意，又不愿因此获罪于皇上，因此惟一可行之道是寻求庇护，在皇帝最为亲近信赖的王公大臣的羽翼之下发出异议。11 月中一百四十八名官员上呈

请求凌迟曾静的决议是以刑部的名义发出的，乃是遵循常规议决的途径。1729年12月5日，众臣附于和硕怡亲王允祥之后上奏题本，作最后一争。允祥是雍正的皇十三弟，是皇上最为信任的内大臣，曾静案爆发后，他曾数次在关键与微妙的时刻向皇上建言，请皇上慎重处事，三思而行。倘若怡亲王敢于公开表示不同意见，皇上或许会重新考量其决定。如此，即使雍正已有警告在先，与怡亲王一同上书的官员也不会获罪。

怡亲王的奏疏标题是“诸王大臣等再疏请诛曾静题本”，并开宗明义揭橥以他为首的朝廷官员的主张：“滔天之罪恶难宽，率土之同仇甚切。祈乾断明正典刑以昭国宪，以快人心。”大清朝法典之所以明确规定何罪定以何刑，目的在于使人民对法律生敬畏之心，百姓因此才会心安，社会乃深安定。皇上有好生之德，宽贷曾静，此本古之圣贤明君所不能相比者。然而，又岂能漠视曾静本人一心追随吕留良、主动策划阴谋这一关键？曾静生长于升平繁荣时代，而竟一意去阅读吕氏逆书，主动去听闻流放太监谣言，更派遣其门生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策动反叛。皇上所言曾静“并无反叛之实事，亦无同谋之众党”，不为虚言；然曾静有谋乱之念，当可无疑。所谓“过大而能改胜于过小而不改者”，实不能覆盖曾静这类弥天大罪。大清朝法律明确规定，谋逆反叛属十大罪之列，不得宽免。曾静之门

徒张熙与其师同罪难逃法网。怡亲王等在题本的最后伏愿“皇上俯允臣等所请，敕下法司，将曾静、张熙按律处决，碎尸悬首，查其亲属、逆党，尽予歼除，以明朝廷之宪章，慰臣民之公愤。臣等无任恳笃激切之至，为此谨题请旨”。

雍正当天稍晚时候就下旨批复怡亲王等的题本。该圣旨简短率直，未作任何言辞上的修饰。雍正明确表示，既然诸大臣不愿为其决定背书，他将按其良心行事，而将此举的是非得失留诸后世评判了：“宽宥曾静等一案，乃诸王大臣官员等所不可赞一词者。天下后世或以为是，或以为非，皆朕身任之，于臣工无与也。但朕亦再四详慎，所降谕旨俱以明晰。诸王大臣官员等不必再奏。倘各省督抚提镇有因朕宽宥曾静等，复行奏请者，着通政司将本发还。”

皇帝开了金口，曾静师徒获得了自由之身。

雍正的最后判语虽然将责任揽于一身，不容分辩，但这次皇上倒不真是孤家寡人，亦不必等到后世才会获得支持。情势的发展出乎意料：有一位京师官僚机构圈子之外的小人物写了一篇文章，坚决支持皇帝的判决，这篇文章最终竟洋洋洒洒地登上了邸报，在官场流传。此人是福建新兴港口城市泉州的书生，姓诸葛名际盛。诸葛际盛一开始作此文是向读书人发一封公开信，但偶然被某位支持雍正处理曾静、吕留良案的上层官员知悉，该大臣决定

将此文在邸报上公布，以便在全国流传。

诸葛际盛在文中写道，读罢皇上谕旨中所引之吕留良日记片断，他深感吕留良蓄意攻击先皇圣祖康熙之可恶。同样明确的是，吕留良之子孙故意藏匿其父祖之逆书，拒不悔改。任何有良知者都不会怀疑吕氏合门上下企图颠覆大清之心。诸葛际盛更以古喻今，称千年以来吕姓一族不乏奸臣大恶，至有受刑斩首者。他也不忘加上一句其本人乃一千四百年前忠事君王的诸葛亮之后，并以此而自豪。诸葛亮的耿耿忠心举世皆知，皇上最近才下旨将其牌位列于孔庙，以表彰其公忠之心。诸葛际盛最后说，既然吕氏已死，最适切的惩罚是开其棺戮其尸。

雍正在其几次长谕中一再申明自己对曾、吕案的观点，又允许至少是默认发表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支持言论，给朝臣施加了巨大的压力，逼使他们接受他的意志。显然是出于同样的目的，雍正于1730年1月24日再次明谕表彰广州四名揭发其上司供奉吕留良长生牌位的生员。雍正称赞道，此举表明年轻学子“深明大义，不为邪说所惑，据实出首，以彰名教。具见士习淳良，甚为可嘉”。为嘉奖四生员所居之地方，雍正着令增加广州一地生员乡试配额四名，此四名生员得用此特置配额参加乡试，若应试完场考绩优良，由该省学政载明，赏作举人，送京城得与今夏之会试。

仅仅过了一周，雍正便获得了另一项道义支



持。1月31日，雍正收到一份来自山东的奏折，并立即传谕百官知晓。这份奏折讲的是，新修孔庙大成殿上梁之际，于北方天空出现的惊人吉兆。新修的孔庙坐落于山东曲阜圣人孔夫子旧宅原址，原孔庙于1724年几乎毁于大火，这在曾静逆书中曾提到并视为朝廷失德所致。奏折称，正午时刻有祥云状如凤凰现于孔庙之上，环日飞翔达数刻之久。上奏者为孔庙督工及署理山东巡抚岳浚（岳浚恰好是川陕总督岳钟琪之长子），两人指称目睹彩云者多达千人。内阁大学士如张廷玉等在接获奏报后也称吉兆现于圣庙修复之时，实为亘古未有之象，足证圣主昌盛之德。雍正在奏折上朱笔御批，称天人感应，现此祥瑞，令其欣慰，但“卿等归美朕躬之词，朕不克当”，其功应推先圣孔夫子。孔夫子或许是以此表示对于朝廷精心关注、不计工本地修复孔庙的嘉许吧！为显示其遂心称意，雍正下旨将当年殿试所取的进士数目从三年前的二百二十六名增加到四百名。次日，奏疏孔庙祥瑞的岳浚实授山东巡抚之职。

对于孔庙呈现祥瑞一事，雍正无法按捺其让刚获赦宥的曾静知晓的急切之心。他再次质问曾静：为何当初在逆书中将孔庙遭祝融之灾视为朝廷失德的一项明证？何以只报恶兆并将其归咎于当今皇帝？难道现在还不是他也开始记录一些祥瑞的时候吗？曾静的回答得体而又令雍正称心：祥云绕

日只说明一件事，即证明当今之世“圣心与孔子之心当为一，即是与天心为

现在曾静还有一件事要做，即以正规的文体重新写下他的悔过历程，并向皇上禀报其如同从恶梦中惊醒的认识过程。曾静竭其所能，突发奇想，前引后证，自圆其说，写下了长达二十七页的文章，名之为《归仁说》。尽管篇幅冗长，其核心思想十分简单明确：在以往的千余年间，中华汉族已产生了无数圣贤之辈，但也逐渐丧失了孕育圣人的能力。而因后世圣贤产生于异地乃是很自然的，不足为怪。清朝历代帝王的作为便是一个明证：其能迅速征服中国，又敕平内乱及有效的治理，无不表明圣人易地而生的道理。华夷之辨于理不通，于情不合。吕留良危言耸听，足见其谬之大矣！前皇子如阿其那、塞思黑等攻击当今九五之尊雍正皇帝，且不思收敛，拒绝悔改，足见其罪之重矣！雍正帝至诚至敬，不啻尧舜再世，且于孔孟之道深谙其中三昧，实为当今之圣贤无疑。如今天下百姓既然对此无不知晓，只须铲除吕留良所遗之悖逆书籍，则“正义永有攸归矣。人人敦悦服爱戴之忱，在在守孝子忠臣之份，各自重夫人伦以全其天理之大”。

从曾静一案引起他关注之时起，雍正就一直在考虑以某种方式将谋逆者的观点及朝廷的批驳一起公布于众。事实上他已经就此做法作了尝试，最先是公开了批驳逆书的谕旨，然后下令广泛流传其

纵论华夷之辨、中国历代变迁的圣谕。如今时当1730年2月初，在雍正几乎已经掌握了有关此案的全部材料之后，他传谕内外臣工：收集证据的阶段至此告一段落。因此，其1月30日有关孔庙祥瑞的谕旨，加上曾静回禀的天心、圣心、孔夫子之心合而为一的绝妙回答，便顺理成章地成为雍正决心编纂的有关曾静案这一著作的最后部分。就这样一部著作而言，以关于孔夫子的讨论来标志一个罪犯最终脱胎换骨的那一刻显然是极为恰当的。同样，在雍正的眼中，曾静本人的忏悔长文《归仁说》也给一个弥天重犯从叛逆到悔恨、认罪，乃至了解政府运作，获得法外施恩并自新这整个过程作了很好的总结。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这本尚在酝酿中的著作被定下书名为《大义觉迷录》。

现在，选编材料、编辑成书并印刷、发行《大义觉迷录》等所有事宜都是皇帝和他臣下的事了。曾静留在京城已无事可做，雍正降下谕旨将曾静遣送回湘。万乘之尊的大清皇帝和刚获赦免的弥天重犯这年都到了天命之年。两人至今仍未谋面，今生今世也再难有见面的可能，但他俩却肯定会对对方至死难忘。雍正已事先作下安排，曾静将在长沙观风整俗使衙门听用。曾静启程离京时，雍正遣了内廷管事的太监御赐了一包衣服及一些其他东西作为礼物。

该上路了。1730年2月中旬，曾静离开了京

城，经过茫茫无际的冬野，向南方一路行去。

## 第九章 黄钟独鸣

曾静的目的地是湖南永兴县老家。去年盛夏的时候，雍正念在曾静的老母和幼子难耐京城狱中酷热的天气，已经将他们释放并送回永兴县家居。然而，曾静并不能径直回家与母子相聚。按照朝廷的谕令，他必须先取道南京、苏州和杭州，以便向江苏和浙江两省的封疆大吏一一报到，并回答有司提出的任何问题。而一旦抵达湖南，他则必须向湖南省观风整俗使衙门报到，听候指示。

张熙并未与其师同行。这位两年前的信使奉命留在京师，等候旨意。但曾静此番南下并非独行，陪同他的乃是杭奕禄，即那位一年来案件的主审官并担任雍正与曾静之间问答联系人的满族大臣。杭奕禄因审案有功，受到皇上的奖掖，如今已兼任满族镶红旗都统。不过，看起来杭奕禄本人并未被曾静的悔过打动，在去年11月上奏雍正请求将曾静按律凌迟处死的题本上就有他以刑部侍郎身份签署的名字。与过去一年多来的审案相比之下，如今杭奕禄的使命算是平淡无奇极了：为南方的朝廷官员们带去曾静获得皇上宽赦的消息，并传达皇上的口谕继续留意“访拿曾静供出诡名王澍播散流言之人”。杭奕禄还随身携带了根据曾静描述而绘制的王澍肖像，将在江南一带散发，希冀有人能辨出此人，出面举发。

2月28日，当杭奕禄、曾静行至长江以北百余英里的淮安时，邂逅了去年才获任命的江苏巡抚尹继善一行。尹继善年方三十三岁，满族正黄旗人，自1723年考中进士以来，官运亨通。当时他刚巡视完毕淮安复杂的水利工程（数条由西向东的河流在此地与南北贯通的大运河相汇，带来诸多问题），准备返回设在苏州的衙署。杭奕禄便乘此机会传了皇上的口谕，并将冒名的王澍的画像及才由曾静处得到的消息告诉了尹继善。此假冒王澍者在1723年遇见曾静时曾提到，当年在一个叫潘宗洛的官员的府中做过文牒一类的差使。经查，潘宗洛当时任湖南学政。既然潘氏担任过朝廷地方大员，又是江苏人，也许身为江苏巡抚的尹继善可以顺藤摸瓜，从中查出些什么有关冒牌王澍的线索。

当天晚上，曾静梦到了这个冒牌王澍：在梦境中，曾静回到了永兴县老家，并与一个远房亲戚闲聊他经历的这个案子。奇怪的是，那族亲倒似乎对案中主要人物一清二楚，告诉他案子的关键在一个姓邓的湖北人身上，此人曾是王澍家的教席！而另一个族亲则知道这个湖北人的住处及其他细节。曾静一早起床便将此梦报告给杭奕禄，而后者也未怠慢，到了苏州再拜见尹继善时，转述了这个梦境。虽然尹继善从曾静提供的关于潘宗洛的线索上并没有获得什么进展，他还是觉得有必要根据曾静的梦境去查一查。正如他后来在向雍正的奏折中所

说：“梦中之语虽难凭信，但如此罪大恶极之人，天理昭彰，无不败露，或者由此跟寻而得，亦未可定。

3月11日，曾静和杭奕禄抵达杭州。一年多前成功地围捕了吕留良之后人及门生的浙江总督李卫仍在任上。李卫不仅亲身涉及审案，又看过关于曾静案的许多通报，曾静二字早已如雷灌耳，然而乍见曾静，却十分惊讶，因为在他看来此人相貌和谈吐都显得十分平庸

。李卫在上呈雍正的密折中说：“观其状貌语言，乃系鄙陋不堪甚属平常者。”不过，如同尹继善的思路一样，李卫补充说，也许曾静的新近报告的梦境透露出什么深意也说不定：这或者是“天地祖宗之灵借此妄人以昭显千古是非邪正之别，而使天下无不咸知造言生事之徒，共相儆戒，诚非偶然也”。李卫令人在其所辖之浙江一带到处张贴冒牌王澍的画像，并安排曾静与地方上的各种人士接触见面，藉此希望这些机会能激起曾静的记忆，发现新的线索。但所有这些都未见什么效果，而且也没有任何人知道姓邓的湖北人，曾静所梦到的那个关键证人。

如此看来，曾静至此已无事可为了。杭奕禄将转回京城向皇上交旨，而曾静则继续南行，先去往长沙，然后就可经由他熟悉的大路回家，与老母幼子团聚了。为了保障这位被皇上宽赦的逆犯的安

全，李卫派了总督府衙的一位满族书吏及一小队兵丁护送曾静，当然，所有费用也从浙江官库支出。然而，命运捉弄人，使一场原本欢喜的团聚变成了悲剧：3月17日，正当曾静准备启程时，长沙派来了一位使者，带来了曾静老母日前以七十八岁高龄去世的消息。于是，曾静在余下的归程里便得披麻戴孝，一路奔丧了。

一如惯例，雍正对于各种关于曾静案的奏折总是迅速而简洁地答复。他在尹继善的奏折上朱批：“览。但梦寐之词何必如此认真也？”在李卫的折尾则批道：“：览。曾静之感服情形如何？”但就在他作下此寥寥数语之前，雍正的心思已经再次转回到吕留良身上：一份来自湖北的密折显示，宽赦并释放曾静并不足于驱散围绕此案而产生的诸多疑云，谣言仍然喧嚣，尘埃并未落定。

这份3月初递进内廷的密折是湖广总督迈柱具呈的，一同递入的还有相关旁证材料。如同雍正的许多其他亲信大臣一样，迈柱也是一位满洲人，正蓝旗出身，经验老到，治事勤谨。迈柱所奏之事令人不安，讲的是一位叫唐孙镐的浙江籍文士，曾在湖北省城武昌不远的通山县任县令的师爷多年。师爷乃朝廷命官的私聘幕宾，许多饱读诗书但未入仕途的士人往往以此为职。他们也常常随东家的调任或连升走南串北，以一份不怎么荣耀的差使赚取一份尚看得过的薪水，维持下层读书人家的体面。

唐孙镐就是这样一位师爷，跟了东家、通山县令井浚详已有数十年之久。

根据迈柱的具奏，唐孙镐一案不同寻常，很有些诡异，似乎完全出于当事人无法压抑的怒火。事件起因于1730年1月的一份邸报，该邸报大约在2月中旬时引起了唐孙镐的注意。按制度，县令有资格收到由本省驻京师兵部的提塘官之报房从六科抄录的邸报。虽然邸报的阅读范围本应只限于朝廷命官，但师爷实际上总能接触到概括京师要闻的这份公文。所以，唐孙镐读到登载了诸葛际盛大肆抨击吕留良那篇文章的邸报，是再自然不过了。而出乎意料的却是唐孙镐看到文章后的反应。雍正收到的材料中有通山县令井浚详当日写给迈柱的报告，其中说，唐孙镐读罢邸报“忽然疯狂大作，詈骂号呼，无所不至。卑职再三劝阻，加以切责，毫不省悟。及至本月初三日，忽欲辞去”。井浚详追问其何去何从，唐孙镐答：“将赴宪轺递呈。”又问所递者为何，唐孙镐递给她东家一份揭帖，正是他花了几天时间写就的文章，其中严辞批驳诸葛际盛对吕留良的攻击，并批评误导皇上看待吕留良及其学说的大臣因畏死而不敢直言的胆怯行为，同时充满了唐孙镐本人对于道德伦理之慷慨激昂的陈辞。

唐孙镐在揭帖中写到，诸葛际盛乃汉人中的败类，华夏文化传统的叛徒。自己虽然只是一个极平



常的书生，并无任何官职，但于是非善恶则不可昧于身为儒士的良知和诚实，隐而不言。古人诗云“黄钟毁弃，瓦釜独鸣”，但他以独鸣之黄钟自任，见不平而鸣乃性情所由，即赴汤蹈火而不辞！他继续写道，诸葛际盛对于吕留良的攻击事关大是大非的基本原则，不可含糊。此人“天良丧尽，枉作谤书，上蔽圣听，下欺士听，几令吾道沦胥，斯文扫地。此诚危急存亡之秋。欲死已得，其所将死之言庶裨万一。愿当事大人少垂鉴察，则死且瞑目”。

唐孙镐倒也并不抹煞雍正治理天下之功，称皇上严惩贪墨之吏，泽及百姓，海内繁荣。随后他笔锋一转，称清朝制度先天不足，深受中央集权制之害，不如远古唐虞之时“君臣交赞，故治化臻于极隆，为千古所莫尚”。反观秦后之世“，皇上曰可，臣亦曰可；皇上曰否，臣亦曰否。上无忧勤之圣，下无翼赞之贤”。

唐孙镐说，吕留良一案就是上述当今朝政制度的最好见证。当吕留良之书刚刚引起注意时，皇上“疑信相参”，仍有意听取众大臣的见解，下旨群臣细研吕氏之书，以此为判断之依据。这表明当其之时皇上尚有据道而治天下、容纳百川之胸怀。然而，莫奈何“内外臣工恐干批鳞之咎，甘作违心之谈，此曰锉骨，彼曰扬灰，此曰焚书，彼曰灭族”。如此众口铄金，皇上如何作正确判断？于是乎皇上以其好恶而判他人之生死，而不再以群臣建言为可

听者。如曾静一案，“纵使百尔臣工皆曰可杀，犹将遍询于国人，以求其一线之生路”。

从来就无人就吕留良一案征求过诸葛际盛的意见，他却一意投书，实在是因其“蛇蝎为心，豺狼成性”，才敢于“擅作檄文，饰奸为忠，希图幸进”。唐孙镐称此种小人行径令他不能不挺身而出，因为如果诸葛际盛得逞其狼子野心，则士人希望何在？真令有道之士死不瞑目了！

唐孙镐批驳诸葛际盛的檄文文理不通，充满矛盾。如果他事先预知吕留良私藏著作如此悖逆，何不检举于先，却要等朝廷通告天下之后才蠢蠢欲动？如果吕留良意欲以其学说影响子孙后代，又何必将其学之精粹秘藏于日记，而此部分在吕子毕生浩瀚的著述中仅是沧海一粟？吕子诞生时大清已经入关多年，其逝世时圣祖康熙尚龙体康健，如何说得通吕子诋毁了整个大清的盛德？诸葛际盛从历史中挖掘出这么多吕姓的败类，以此否定吕留良本人的人格和诚实，如果这种说法可以成立，那么，同样能在历代儒士中找到品行优良、学问卓越的吕姓文人，并以此证明吕留良堪称后世之师表。

诸葛际盛本该多花点时间老老实实在地读上几本吕留良的理学精义之书，尤其是《四书讲义》。对唐孙镐而言，此书“阐扬圣道至精且详，海内文人莫不宗之。圣人复起，不易其言”。以此之故，《四书讲义》本应裨益于当代，教化于众人。可惜

事实与此相反：“皇上日理万机，无暇翻阅此书，而左右近臣又因圣怒未解，不敢冒昧进呈，致使留良家藏之戏笔日暴日彰，传世之嘉言日隐日没。”其结果则是学术风气日堕一日，而奸滑之辈如诸葛际盛者伺机蠢动，随意散布扭曲之言于天下。毁谤之文，言之凿凿，竟致三两有识贤臣虽有良言而不能进达于内廷，虽敢直言而无法开议论之风气。于是乎，皇上耳不聪目不明，直以为普天之下无不盼吕子死者，焚其书，毁其板。

舆论因此而高涨，竟到了有开棺戮尸之说，这种蛮夷行为将令鬼魂夜泣，使饱读圣贤之书、尊崇孔孟之道的儒生为之心寒，“孔孟在天之灵亦应为之流涕。可怜八十余年养士之恩几乎隳于奸贼一人之手，当大事者皆弗能救欤！”虽然，最后尚有存乎一线之挽救之道，即由识大体的宪轅之臣将此揭帖递呈给皇上御览，并协助他赴京师“与奸贼际盛面质于勤政殿前”。他们也可促使朝廷即使焚毁被判为悖逆部分的吕氏私家藏书，也应保留其阐扬孔孟精义的传世嘉言。他们更能劝皇上“斩际盛之头以悬示天下”。

唐孙镐在其揭帖的最末两页中从历史的角度为吕留良辩护。他说，吕留良并非无过。其生于东南沿岸混乱未定、盗匪迭出的环境，明末忠臣义士尚且举旗抗清以图恢复的时刻，吕留良自觉身为遗民，有割不断的血缘联系，不免有同情前明言论流

露于其私藏日记。但吕氏身处动荡的时代而写出了不朽的著作，不仅于经典古籍多所发其深蕴，即于明清两朝之政治典章、文字艺术，亦不无发明“，评选两朝制艺，反复辩论，义理透彻，直能窥圣贤之堂奥，兼可启后世之颡蒙”。唐孙镐承认自己学识不足以评鉴吕留良学问的精妙之处，且本人并非庙堂大器，有影响时政之能，且此书一出，极可能遭杀身之祸，不然也会成为朝野的笑柄。

尽管如此，唐孙镐恳请凡得读此书者，无论其身份、地位如何，了解其之所以为吕留良辩护者，乃是出于相同的道义原则，而非恰好与吕氏同籍。他同吕氏一家素无瓜葛，之所以大声疾呼，乃自感生于升平时代，而孔夫子曾告诫说，如若人人皆因天下太平而怀私心自利，则世道必衰。对唐孙镐而言，他就是一个身处盛世“，当无可如何之际而迫为不得不然之辞”者。

唐孙镐在最后再次表明上揭帖的目的：自知此次上书“感悟天心十之一，身罹法网十之九，然其与无耻之诸葛际盛并生阳世，何如与儒雅之吕氏父子同归阴府也。呜呼！仲山甫之不作，魏郑公之已亡，朝廷已无诤臣，野草复生，孽畜后之。修史者不几笑我朝无人乎！虽然莫谓无人也，犹有不怕死之唐孙镐在”。

井县令胆颤心惊地读完了揭帖。这样的犯上文字竟出于其幕僚之手，而他对此却一无所知！对于

那个时代以学优而仕的人而言，唐孙镐在揭帖结尾处提到的两个典故是再熟悉不过的了。仲山甫乃西周分崩离析时代宣王的大臣，以注重实际及具有向天威难犯的君王建言的勇气而著称，其事迹在《诗经》中尚有记载，当时连稚龄学童也知道他的名声。

《诗经》中说：

人亦有言：

“X 德如毛，  
民鲜克举之。”

我仪图之，  
维仲山甫举之；  
爰莫助之。  
衮职有阙，  
维仲山甫补之。

诗的最后两句写仲山甫是当时惟一敢于针对君主的缺失提出批评意见的大臣。同样，中国的文人也无不知道魏徵其人。魏徵身处西周宣王一千五百年之后的唐朝，是唐代最著名的大臣，以向权高位重的唐太宗直言相谏著称。毫无疑问，仲山甫和魏徵都是唐孙镐心目中可效仿的“诤臣”。

井县令别无选择，只有下令羁押唐孙镐。1730年2月22日，井浚详向湖广总督迈柱寄发了有关其师爷唐孙镐言行出格的报告，并附上了唐氏撰写之揭帖的抄件。迈柱于三天后收到这些文件，仔细阅读之后，又于次日向雍正呈具密折。迈柱在密折

中向皇上禀告说，唐孙镐的狂悖言词和藐视法律的行为令他万分震惊，真未想到太平盛世竟有此辈以儒士身份行走于官场之侧。他称已下令湖广按察使将此人递解至武昌看押并严厉鞠审。迈柱随折并附了唐氏的揭帖抄件，专等雍正谕旨下达后再奉谕行事。

不久前才宽赦了曾静的雍正在迈柱的折尾以草书对这名为吕留良喊冤辩护的文人朱笔圣裁：以此妄类，便令伊杀身以成其臭名，亦属便宜他。可将伊此论密予消灭，不要说曾奏闻，不可令人知有此事。可将伊设法或杖毙，或令他法处死。奏朕之处并浚详亦不可令知。伊此论揭帖并浚详若为之传播，将来必严惩参处。如此说与他。

湖广总督迈柱收到朱批奏折，立即回复：“幕宾唐孙镐作揭狂悖情由。该犯罪孽深重，法无可逭。臣恐杖毙彰人耳目，适该犯在监患病，不数日而已伏冥诛。此诚逆天大罪覆载所不容也。至于该县详文揭稿在司府衙门者，已密谕销毁。出自臣意，毋致泄露。”

雍正决意立即秘密除掉唐孙镐及其所留揭帖，但不久之前他才宽恕了曾静，并将其释放回老家，又决定公开曾静一案的前因后果。这两项决定在表面上看来似乎前后矛盾，但此两案在雍正看来确实不同：曾静虽然是读书人出身，但陋居村乡，与外界几乎隔绝，而唐孙镐则称得上是一个圈内人物，

有官场上的关系和背景；曾静的指控所依据者不外乎道听途说、谣言恶语，而唐孙镐的目标径直对准官方文件邸报；曾静甫遭逮捕，即痛哭流涕，悔恨再三，而唐孙镐桀骜不驯，怒骂不绝。也许还应该加上一点：曾静其实才疏学浅，而这位唐师爷久在官场，见多识广，对吕留良的慕拜出乎内心，对吕留良的学说有真切的认识，其实也算是一位出色的儒士了。以此种种去探究雍正皇帝及湖广总督迈柱的心思，急急地密诛唐孙镐可说是颇合逻辑的行动。

然而，尽管雍正深信此番料理唐孙镐干脆利落，一个师爷平地里搅起的波澜应从此息影无踪，事实却并不如其所愿。雍正不过满意了几天，3月28日就有消息从湘西边陲之地传来，说在山镇沅州的巡察御史竟在书案上一大堆公文中赫然见到唐孙镐的揭帖！这位巡察御史恰巧也姓唐，扬州人氏，是新中的进士，此时奉派在沅州替工部稽查工程。在向皇上递的一份折子中，唐御史字斟句酌地具奏其惶恐之心，称唐孙镐揭帖突现其往来公文之中，实为诡譎之甚，不可思议。但一读之下，因感其内容狂悖已极，只有将此件奉还京师，请皇上降罪。

唐孙镐揭帖再现踪迹，且在偏远的湖南，曾静的老家，这实在令雍正深感不安。在一份写给迈柱的朱笔谕旨中，这位皇帝恼怒地说，揭帖风波不但

未销声匿迹，反而波及远地：“此事海内皆传闻矣！”不过略使雍正心宽的是，即使有人听闻这一揭帖案，也总会有不同想法和解释的，决不至于都赞同唐孙镐的说辞。也许他还应该加一句说，曾静案将决不会出现第二种解释：《大义觉迷录》已经编纂成书，不久将刊刻印行，广布天下。因此，就曾静案而言，不可能再会有其他更多的解释了，大清皇帝的意志就是亿万臣民的意志，大清皇帝的观点将风行天下。

## 第十章 珠联璧合

1730年冬春之际，雍正皇帝特旨选定的一群臣僚将编辑完毕的《大义觉迷录》正式移送武英殿内府修书处。4月4日，雍正获得奏报，全书的第一套刻板已经完成。由雍正亲自裁定后的《大义觉迷录》共509页，分为四卷，各卷单面印刷后从版口对折成正反两面，装订成册。

由于编印《大义觉迷录》一书费工费时，而时间却十分紧迫，所以皇上本人对于该书的贡献直接来源于既有的材料，包括数年来就曾静案而颁发之谕旨，通过杭奕禄向曾静传递的各类质问。雍正选出1729年11月2日就曾静谋逆案发出的那道圣谕作为第一卷的开首之篇，同时也作为全书的引言。在此谕旨中，雍正引征中国历史上的种族观念、夷夏界限的演变，集中辨析种族无关于政府德化之治。因而可以说，该谕旨以一种便捷的方式引介了



《大义觉迷录》的一个主题，即华夷之辨是吕留良及其门徒广为散布的谬论，影响及于曾静，为其误信，入于迷途。

《大义觉迷录》第一卷的引言之后，是雍正对于曾静逆书的批驳，该谕旨最初于 1728 年 12 月 11 日颁布。显然，对于京师百官及诸省大员而言，这项谕旨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对于各省学堂的生员则不同了，本书未来的这些读者肯定会对披露于世的皇室争轧内幕无论是前皇子或当今皇上的细节，还是种种恶毒的指控既兴奋又迷惑。

在此卷该部分的结尾，曾静开始被允许发出声音，所以读者自此看到的并不仅仅是帝王的独白，而是雍正和他的囚犯之间的一系列对话和讨论。雍正在卷一中提出了十三项书面质问，而在卷二中的提问更多达二十四项。曾静则逐条答复皇上的提问，而且常常是长篇大论，简直都像在作文章。虽然《大义觉迷录》编成时，曾静早已远离北京先在杭州和长沙，然后在永兴县埋葬老母，他在皇宫大内毕竟留下了声音供皇帝和群臣探究、采纳。毫无疑问，在这本书中，两位作者的地位有天壤之别，这也反映到了该书的刻印上面：凡曾静的回答是一行印十六个字，而雍正的质问则是一行印八个字，所以两种刻字的大小差了整整一倍；曾静每当自称时从不提自己的名字，而以“弥天重犯”四字代替。但是，这两卷皇上和其囚犯的问答确实给予曾静一

个发出自己声音的巨大机会，让他得以将种种想法展示在国人面前。

《大义觉迷录》的第三卷基本上采取类似的形式，不同的是发问者是一年多前遣往长沙审案后就一直负责曾静全案处理的刑部侍郎杭奕禄。替雍正将其挑选出大量公文送给曾静阅读的也是杭奕禄；在雍正看来，这些公文包括数省案例、岳钟琪奏折、数百份来自其他诸省的折子，以及论及经济货币之材料，足以显示他作为万乘之君的宽仁及治理国家大政本身的复杂性。

似乎为了证实曾静长篇大论式的读后感足以表明其悔悟之心，卷三在第五十二页后转换了方向，代之以皇上和群臣之间为确定曾静的合适刑判而往来的奏折和谕旨。同样，虽然这已是朝廷重臣的熟悉的程序和内容，对于将来要读到这些君臣间激烈争辩的各地方生员们而言，将是一种非常陌生的经验，因为他们对朝廷决策背后的紧张原本是毫不知情的。如同第一卷所披露的皇宫内幕一样，第三卷也透露了许多皇家骨肉之间争斗的惊人细节，其在最低程度上也见出了以雍正选择和认可的方式而呈现的宫廷斗争。雍正最终拒绝朝臣两次严惩曾静之奏疏的决定就是当初那份简捷、武断的谕旨本身，并未作新的修饰。

《大义觉迷录》之一第四卷（也是最后一卷）再次变换方向和所记之事的顺序，将篇幅集中于吕

留良师徒有关的悖逆材料上面，其主要内容是雍正于1729年7月颁发的严辞批驳吕留良、严鸿逵的圣谕。圣谕中引述了两人的一些言词，因而使其著作中对于皇上的诽谤、攻击及煽动性的言论再次公布于天下。有意思的是，满朝文武至今尚未就如何判定吕、严之罪有所定议。但这已无关紧要，该卷收录了曾静后来在狱中认识并批判吕留良给予其影响的评论，这已清楚地表明了未来雍正批驳吕氏思想的方向。

《大义觉迷录》以曾静深思熟虑而写成的长达二十七页的《归仁说》作为尾声，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雍正为《归仁说》亲笔写了一个简短的介绍，评说曾静邪恶的过去及彻底悔悟变化之心。雍正写道，曾静在道德伦理上的脱胎换骨印证了古圣贤的智慧，即人恶虽大而莫不能改。曾静已经抛弃邪恶而归向于仁人之路。因而，曾静的忏悔之言《归仁说》为《大义觉迷录》全书带来了一个完满的结局。

至于曾静本人，其新生可以以他自称本名作为象征。在《大义觉迷录》最末一页即《归仁说》的最后第三行，曾静第一次用了“静”称自己，而不像在所有其他地方仅以“弥天重犯”这个字眼自贬。所以，当他写下《归仁说》的结言时，仿佛已是一个信心满满的新人了：“今日之正义永有攸归矣！人人敦悦服爱戴之忱，在在守孝子忠臣之份，各有重夫人伦，以全其天理之大公，复我所性之固有，

常以静之至愚不肖、误听误惑为戒。四海同化，九州一德，各安有道之天，长享无疆之福，斯不枉为圣世之民，而为生人之大幸耳。是为说。”

《大义觉迷录》是第一次将曾静的种种观点聚于一处，使读者得以整体、连贯地见到这位湘西南山村秀才的想法。人们不免揣测，曾静为了迎合皇帝，为雍正宽赦其谋逆大罪背书，当然会作出这样一篇文章来。不过，实际上《归仁说》只能视为森林一木，如果要想求得对于曾静在许多事情上的更加全面的想法，见到完整的曾静其人，就必须着眼于《大义觉迷录》全书。

断章取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态度是不可取的。这种诚直的风格也是雍正冀望于《大义觉迷录》一书的读者的。他在年 月 日的圣谕中该圣谕现在正是该书的序言雍正辨析了中国文人所有的“佞”。雍正引征了《论语》中的有关章节，因为那是所有读书人一望即知的典故。当孔夫子的学生子路做了官后，命所辖地方的一个年轻人辍学为官。孔夫子对此不以为然。子路问：“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夫子答曰：“是故恶夫佞者。”所谓佞者，即巧言令色。雍正评论说，当今之世，世风浮饰，文人多尚巧言令色，于圣人经典不求甚解，断章取义以自用。他以为只有撷取圣人精义，弃巧言诋毁之风尚，才能有益于世人。细心的读者不难从这段引证和议论中发现，皇上在此是有所指的，其

心中无疑是在指向他所憎恨的浙江士人，正是这批士人以巧言令色为学问，明讥暗讽，玩弄文字，败坏了士林风气。

有一些从曾静而来的新材料是以自叙身世（自传体）的形式出现的。曾静在早些时候著作中的一些说法及在湖南应审时的自述交代，都引起雍正的详细责问，而曾静则再度一一回答。这些答词常常透露出其观点或想法。例如，雍正问：尔何来引述亲家陈氏的话，称尔“有济世之德、宰相之量”？曾静答称此说并不任何政治含义。陈氏并无希望曾静成为新朝辅宰之意。之所以会有这么一说，缘于曾静家庭本身的一场风波：曾静本与兄嫂同住，后兄嫂反目。其兄竟将妻改嫁到了陈氏的邻居。曾静以其违背伦理而与其兄争辩，而这位嫂子后来也告诉陈氏曾静援助她一事。陈氏因此对曾静有“厚重淳笃不佻达耳”的好评。

曾静还说，其岳丈的兄长陈梅鼎说过几次尊崇前朝衣冠的话，但同样没有政治的意思，和吕留良辱骂清朝衣冠是不同的。陈梅鼎说这话时时在1700年前后，已是年过七旬的古稀老人，只是叨念童稚光景罢了，”陈梅鼎是个农家乡人，没读过什么书，也不晓得别样说话。“曾静称自己只是在张熙1727年从浙江回到永兴，又带回吕留良的几首诗之后，才知道吕留良也有过关于清朝服饰的话。

上述这些细节有助于读者认识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至少是曾静所想要人们去认识于他的这样一个普通老百姓。从此出发，人们也比较容易理解曾静所发的堂皇之言。《大义觉迷录》的许多片段无不显示，曾静坚持中国需要变革。虽说这一观念的基调仍是复古，但两千多年来多少文人志士，包括吕留良在内，都持有同样的信念：曾静在书中有一段回忆雍正的话，称他受吕留良影响改变思想的时期是在 1727 年末和 1728 年春之间。以他看来，德乃治之本，有德之君上天庇佑、万民拥戴。中国者，阴阳会聚之地，五行调和则智、德、礼、信应时而升，德治而民化。曾静又写道，当今之世阴阳五行俱已失调，明证历历，而贫富不均仅其一例而已。古时均田，而今世则因富人巧取豪夺而致贫者益贫、富者益富。如此之太平盛世实不足称道者也！

雍正于是驳斥曾静贫富之见不无简陋之鄙：贫者若辛勤劳苦、善理家产，自能逐渐改善，其道理同富者因懒散不当而失财是一样的。如同《大义觉迷录》一书自始至终所贯彻的，曾静对于皇上的反驳实在无法再有任何辩驳的可能了，毕竟，这本书的目的不是展示皇帝和囚犯的持续辩论，而是展现曾静如何为谬误所迷惑，又是如何为雍正皇帝晓谕之大义所觉悟的。

不过曾静对于政制的看法仍然不改初衷，惊人

地坚定。正如他在一篇答复中所说，他自年轻时读到《孟子滕文公》所主张的井田制之后就对均田制度心向往之，“心中觉得快活。井田制将土地平均划分为相同大小，各人拥有其中一份，而井田中间则是公田，其生产所得用以纳粮交税。曾静坦承，日后发现吕留良竟对井田制同样感兴趣，而且认为可实施于今世，实在令他惊喜，乃愈发敬佩吕氏。不过，其提倡均田制度的想法毕竟源于孟子而非吕氏。曾静说，他也想过，如果朝廷实行均田制，他也就不用为生计而去动拖家带口移民四川的脑筋了。后来，他曾在长沙看到关于五星联珠的揭帖，为孟子之说所鼓动、吕留良学说所证实的想法就更加牢固了。

在《大义觉迷录》的另几处，曾静又说他通过阅读古籍而一直相信中国之治的良方莫过于封建制，即分封之诸侯各自拥有疆域，实施独立的管理，即使其上还有天子统治、协调。秦始皇统一中国，成为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君主之前的春秋时代诸侯立国就是一个例子。曾静相信，古代风行而有效的封建制度对于今世之中国的外御内治仍有益处，值得效仿。

曾静是这样解释他的想法的：“只见得天下之大，一人生目所及，心思所系，海隅之远，必有遥隔不到之处。而天生人材有圣有贤，有贤之大者，有贤之小者，类皆有治民文之责，以圣统贤，以大

统小，错坏以居。事虽分于众贤，政实颁于一人。此古之王者所以有封建之制。且其中礼乐征伐虽出于天子法而抚民之任、治民之责分属各国之长。”他辨析说，与此相比，秦朝（建立于公元前 221 年）之后的统一政制则完全不同，国家行政划分为州、府、县等辖区，官员由朝廷任命，迁转无常，既无益地方之建设，对未臻之事亦互相推诿了事。因为视百姓为无知者，也就无心勤政爱民。

雍正对于曾静的这套说辞所作之评论显示他并未被说服。雍正指出，时代变迁，历史的发展本身指明了新的方向。古代的封建制若实行于今日社会，必定带来内乱和外患。但曾静并未放弃，将论题转到具体的地方管理上。他说，乡约之制度提供了很好的答案，该制度由 11 世纪时陕西的一个儒士提出，经宋代大儒朱熹发扬光大。曾静自称熟读有关乡约的史料，确信此制度足以恢复地方道德，稳固社会关系，养老扶幼，息争执于调解而不以诉诸公堂。乡约“准古酌今”，是当今基层地方理想的行政制度。各乡村设立乡约，选富于经验又正直诚实之老者为约正，以具良知又能书写的青年十二人为辅助，每月一轮，专司簿册记录。记录簿册分为三种，其一为乡约宣讲之签到和记录，其二专记地方上当月善行，其三记恶过。乡约每月宣讲一次，宣讲开始前有设香案敬天地祖宗的仪式，然后始开读乡约规则，随之以讨论、褒善记恶于簿册，“许



各人就约所质疑问事、讲办道理、区画家计，以及论文习射”，日落而散。

曾静补充说，他希望皇上重视其实施乡约制度的建言，以其天聪圣明加以改进，并将成功的例子传布全国。皇上应谕令各地督抚尽快建立乡约，即使穷乡僻壤也无遗漏，并保证无论士、农、工、商，人人得以参与。建立乡约当不太难，因为州县地方每逢朔望已有官绅会集，宣讲康熙颁布之“圣谕十六条”、雍正解说十六条以及《圣谕广训》，何不在此基础上扩大为乡约制度？乡约当亦能为解释朝廷律令、政策，并为改善乡村道德提供良机。

曾静强调说，他在湖南时州县地方的宣讲只限于市镇繁荣之地，而“小民不知上之教德者，由于居乡之日多，到县城之日少，或又不通文义，不能仰会上意”。因此“圣谕十六条”及《圣谕广训》的传播一般而言少有成效：“宣讲亦不能依期奉行，在官固视为泛常，而民之听之，或作或辍，有来有不来。况居乡者多，在城市者少，乡民远离，无人督率，虽有宣讲，如何听见？即如弥天重犯，所居离城市远，县中讲约读法之事，生平并未撞逢一次。如所颁《圣谕广训》及我皇上斟酌取士之法，以前不惟不曾目见，并未曾耳闻。”曾静最后的结论是，如果采纳其建立乡约之言，使其深入各地构成较大行政区的小社区，则人人得知朝廷律法成规，亦无人会动辄犯法。“不惟无上行而下不效之患，且君

民一体，呼吸竟可相通矣！”

从《大义觉迷录》中许多论辩的形式来看，显然雍正对于曾静引经据典以立论的方式最感兴趣，因为那给了他重新推敲经典原文之深意以驳斥对方的机会。当然，雍正亦藉此炫耀一下自己虽然出身满族，贵为皇帝，而对于中华古代典籍有深刻理解与学养。举例来说，曾静曾在其著述《知新录》中花了许多篇幅讨论管仲其人其事，称管仲的事例清楚地证明了“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的原则。这个结论明显地受吕留良评论管仲的影响。不出意料，雍正对此提出质问，令曾静讲清楚、说明白。于是曾静就又获得了重述并发挥从前之认识的机会。

曾静当然无须重复管仲的故事了。任何读书人都读过管仲，皇帝和曾静也不例外。管仲是一个历史人物，生于公元前世纪（比孔夫子还早了二百年），先后臣事能干但残暴的君主公子纠、公子小白。管仲先事长兄公子纠，后公子小白弑兄夺位，并要求管仲继续为相，而后者也并不拒绝。

管仲此举深受孔夫子同代人的病诟，以其臣事二主，是为不忠。但孔夫子的态度有所不同，显得复杂不定，此事在《论语》中有所记载。如同《论语》中其他篇章，孔夫子的评论也是以其与弟子论辩形式出现的。其弟子视管仲不忠，理由有二：一是公子纠被弑，其余大臣皆自杀以尽忠，惟管仲苟

活；二是管仲既臣事弑君者，复以其治国之长才辅佐公子小白（此时的齐桓公），使其国力大增，兼并邻国。

这两项指摘大概都能被许多前明遗民包括吕留良在内用来解释其于满洲入主中原后不做贰臣的道德信念。而孔夫子对其弟子的回应在前明遗民看来似乎也是支持其立场的，虽然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出发。孔夫子是这样说的：“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曾静时代的人都知道，披发是东夷的风俗，而左衽则是所有夷人的习惯。按照曾静在《知新录》的诠释，孔夫子称赞管仲的原因是，当时齐国受围于四夷，而齐国的强盛拯救了中原人民陷入夷人之手，此即管仲之功。衣冠发式在此成为一种文明价值的象征虽然并非惟一的象征。曾静从孔夫子的评论作出的结论是，孔夫子视保存中华文明免遭夷人侵蚀的能力较无条件地忠君事主为重要：“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

管仲到底是否应该及其何以臣事二主，自古以来争论不断，众说纷纭。但雍正对于曾静之立论的回答却是斩钉截铁。雍正称君臣之义乃中国儒家传统中五常之首，是衡量中国人伦理关系的基准：“君臣为五伦之首，断无有身缺一伦而可以为人之理。”他质问道：曾静既在书中称华夷之间无君臣之别，则其视谁为皇帝？时至今日，曾静是否仍认为君臣

之义与讨论各种“蛮夷”无关？在经历如此重大变故之后，曾静是否坚持与外族的关系不必讲君臣之义的定见？既然皇上的口吻是这样的不容置疑，那么再论辩下去是不可能的事。曾静极其谦卑地向皇上低头，说都是因为读了吕留良论管仲的书才误入迷途。如今，敬读皇上关于中国疆界随时代而变迁、华夏之人本意亦屡有更迭的精辟之论，才知道自己才疏学浅，从前所见所说，竟是管窥蠡测。

在与曾静的另一次论辩中，雍正以不同的引述经典为自己的论点背书。这一次是质难《新知录》中“天下一家，万物同源”与其华夷之辨说的自相矛盾之处。曾静在书中说：“中华之外，四面皆是夷狄，与中原稍近者尚有分毫人气，转远转与禽兽无异。”雍正驳难说，天地之间怎会有如此道理？

《中庸》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国虽然在国人眼中幅员辽阔，但天下富有九州四海，中国不过其百分之一而已。既然天地养育万物，其理为一，何以中国和四夷会各拥天地呢？圣人既说“万物育焉”，难道所谓的夷狄在曾静看来是被排拒于万物之外的吗？莫非中华之外的人民就得不到土地之养育吗？

雍正大可在古籍经典中选择许多圣贤之言为其进一步论证作依据，但这次他所引用的是儒家五经之一、最古老的典籍《易经》中的第六十一卦“中孚”。其卦辞曰：“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

贞。《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刚得中。说而巽，孚乃化邦也。”显然，雍正引用此卦辞向曾静阐述这样一个观点：“《易经》言信及豚鱼，是圣人尚欲感格豚鱼，岂以远于中国而云禽兽无异也！”当雍正置曾静于如此讨论之中时，实则上视曾静因其叛逆的禀性而连禽兽尚不及。既然辩驳已至此，雍正说他倒很想看看曾静有机会“可能如豚鱼之感格否”？要他“据实说来”。

曾静于是上稟说，他仅于幼时读过《易经》，而对于信及豚鱼之说未加领会。至其撰写《知新录》时，又率意引用，并未反复考核经文原意以纠正谬误。前车可鉴，今后他必切切牢记教训：“今蒙皇上开示，到此弥天重犯便是豚，便是鱼，亦当感格，何况人性未泯，尚有知觉乎？”

曾静引孔子论管仲语为其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虽然为雍正驳斥，但看来仍较皇上更有说服力。不过雍正引述《易经》中孚卦立论，倒占了上风。而且雍正选此卦的巧妙更在于，历来对中孚卦的注疏涉及的相关主题颇与曾静目前的困境相合。这些注疏的核心是，中孚卦上下各为阳爻，中间为阴爻，象征中空之舟，其特性是浮于水，浮则轻灵、易适，因而固执愚昧如豚鱼亦可感化。进一步引申，则人民百姓之愚而自用者也能受仁德君主的启蒙和教化。

历代《周易》的注疏者并指出，中孚卦紧接于

第六十卦之后，也内含深意。第六十卦为“节”卦，乃节制之意。所以“，《象》曰：泽上有风，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魏王弼在《周易注疏》中说：“信发于中，虽过可亮。”唐孔颖达疏于《正义》中进一步解释说：“泽上有风中孚者，风行泽上，无所不周，其犹信之被物，无所不至。君子以议狱缓死者，中信之世，必非故犯过失为辜，情在可恕，故君子以议其过失之狱，缓舍当死之刑也。”由此“，虞吉，有它不燕。”即君子宽恕、仁慈而导致系心于一、志未能变的风尚，也即是仁主忠臣的道德规范。很显然，雍正在此力图以这些古人的注疏来印证其宽赦曾静的合理性和内在的深意

1730年4月4日，雍正获得《大义觉迷录》的第一套刻板全部完成的奏报，立即谕令内阁筹划将此书分发全国各地的可行方案，该方案必须符合其早先将《大义觉迷录》广为传播的构想。六天后，内阁呈送了拟就的计划，而雍正也立刻谕批准行：北京内廷修书处先印行五百套，分发在京文武大臣及幕僚；第二批印成后发送各省封疆大臣及其他要员，供其个人阅读。此外，各省督抚还将收到另一套书作为其所在省之印书馆的范本，以便翻制出一套新的木刻印板。各省将先行据此印制一百套新书，以供应本省低阶官员以及各县之知县、教谕及之乡之教官（大多数省都有六十多个县）。各地方官员将负责统计其所辖之乡、镇的数目及生员人

数，以计算出所需《大义觉迷录》的数目。估计这将是一个极大的数字，因为在曾静的早期交代中曾说仅他所在的永兴县就有两千左右的秀才，每年参加各级科考者多达二千四百人。根据朝廷的旨意，各地的儒士、乡绅等将负责乡镇所需书籍之印刷装订乃至额外刻板的费用。各县印制的书籍在本县分发，并在每月朔望两日的地方宣讲上讨论。在州县中一月两次宣读《圣谕广训》是朝廷制度，曾静曾在回答皇上发问时建言以此宣讲为基础，建立乡约。现在，宣讲、讨论《大义觉迷录》也应是该集会的内容。

京师的印订工作进展神速。离雍正下旨内阁讨论如何快速而有效地分发《大义觉迷录》不到两周，内阁官员在通政使司及兵部快驿的协助之下，已经开始将新书发往各地。第一个收到《大义觉迷录》的是在北京外围某地驻守的一位守备，该武将报告内阁说，已于4月27日收到新书。正在西边紧张筹办用兵的岳钟琪于5月5日在西安衙署接奉两份《大义觉迷录》，并立即按指示交付刻印馆转刻新板。地处东南的广东提督于6月4日接获兵部驿卒送到的此书。因为当地发大水的关系，湖南巡抚赵弘恩于6月末才收到寄书，而直接寄给湖南按察使和观风整俗使的两本虽较早到达，却为雨水浸湿，字迹模糊，不堪阅读了。好在现在巡抚有了本子，赵弘恩立即下令当地印书馆同时刻出三副模

板，所以赶工刻印尚不太晚。至盛夏到来时，连湖南永兴县东边最贫瘠孤绝的数县中的生员也拿到了新刻印的《大义觉迷录》，开始阅读、体会了。

雍正皇帝在如何运用此书方面并未给各级官吏、遍布全国各地的各类书生多少选择余地。雍正正在《大义觉迷录》序言的结尾中说得十分明白：“并令各贮一册于学宫之中，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览悉知。尚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查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

就这样，当曾静在为其母守百日之孝期间，奉雍正的谕旨，上自各省州府县，下至集镇乡村，并驻地军营，各级官员纷纷向内阁报告收到《大义觉迷录》，并复制数以千计的新读本以应各乡镇乡约及生员之需求的计划。至 1730 年 11 月底，甚至远在台湾的官员也上奏朝廷说收到了寄书。虽说台湾因收复未久而并无许多百姓移居，学宫数目有限，台湾府的官员仍估计至少得印 1230 本新书才能符合皇上“使人人观览悉知”的谕令。

多少年来，曾静一直在为他的言辞寻找读者。如今他终于达成了目标：《大义觉迷录》堪称他与雍正皇帝的珠联璧合之作，而其读者规模之大，却是他曾静连做梦亦未能料想到的。

。

## 第十一章 探蹟索隐

曾静于 4 月 12 日抵达长沙。在此之前，湖南



诸大臣已经接获曾静即将返回的消息。杭奕禄派遣密使送达的这个音信正是雍正皇帝当日下达的圣谕：“奉旨：尔带曾静由江宁、苏州至杭州，由杭州差人将曾静送至湖南巡抚衙门。令伊回家料理家务毕，着伊自行提到观风整俗使李徽衙门听用。如伊欲他往，不必留阻。”但曾静之母突然去世却为湘吏实行皇上圣谕添了新的因素：因为雍正并未明确指示曾静“料理家务”的期限，而一般而言，儿子为亡母守孝的时间应为一百天。所以，曾静滞留家乡的时间并非湖南巡抚赵弘恩可定的了，命运已经作出了决定。曾静于次日就戴孝上路了，只花了一天时间就回到了家中，十六个月前他就是在此被捕的。

为母亲办理后事并不怎么麻烦。5月中旬，曾静已经办完了丧事，备下棺木，并将棺木暂厝于一个山坡。将来曾静还必须为母亲选一块永久性葬地。至此曾静还留下一点时间去料理其他事务。

就如曾静日后给巡抚赵弘恩、观风整俗使李徽的报告中所解释的那样，其被释放恰与奔丧碰在一起的感觉真是很难一言道尽。办理丧事期间他所遇见的每一个人，无论亲友、邻人，还是一面之缘的旧识，无不对其返乡惊讶不已，而当他们听说了他在京师的际遇、尤其是皇帝亲自下旨将其开释的经过，更是目瞪口呆。这些乡人亲眼目睹了皇帝在曾静离京时赠送的衣服和其他礼物，简直是着了迷。

同时，他们对于那个冒牌进士王澍极为愤慨，就是此人在当地散布了恶毒谣言，带来无穷的麻烦与不安。

曾静料理家事完毕，百日丧期还剩差不多两月有余。对于如何善用这段时间，曾静是仔细考虑过一番的。他作出了忠孝两全的决定：一方面继续为亡母寻觅合适的墓地，另一方面也要报答皇帝的恩惠，尝试着能否穷本追源，发现恶毒谣言的始作俑者的来龙去脉。要找到线索，第一步就是弄清楚那名冒牌进士王澍七年前拜访了他的学馆，逗留两天，留下一个烂摊子给他后，到底去了哪里。

开始几天，曾静四处查询但一无所获。不过到了5月下旬，他的采访有了突破。一位邻人告诉他，听一位姓曹的讲过一个故事，可能对查问有些帮助。曹氏也是永兴县人，早年曾中过秀才。尽管如此，他在永兴找不到什么差使，所以在桂东做了一个学馆教师以谋生。桂东坐落在湘赣边界的崇山峻岭之间，距永兴约60英里。曹氏的故事讲到在1723年秋天的时候，有一位不同寻常的访客路经桂东，该行客来自京城，举止文雅“，大有才学，讲说京城事务及谈文论学，皆历历凿凿”。曹氏并说，有传闻此人于该年末卒于桂东县界处。

曾静对此线索大感兴趣，急于追查个究竟。不过，曾静本人最近的际遇让乡人们有些忌惮。他后来在写给湘抚的报告中说：原本可能提供一些证据

的人听到他的名字后“，人人缄口，掉头而不敢言”，显然，许多人“系读书守法、避嫌畏事之人，恐有话不肯直言直吐，有迹不敢直露直呈”。眼见如此情形，曾静决定找一个人同行，并隐去真名实姓。曾静选中的同伴不是别人，正是其弟子、信使张熙的长兄张照。至于何以张照会同意曾静的邀请，曾静并未解释。或许张照对投书一事向来是知道的，但是其自称仅以农耕为业，并不过问兄弟所作所为的说辞骗过了审讯官；或许张照当日所说厌恶曾静也是实话，如今与曾静结伴寻人问事，只是看中了曾静许诺：一旦发现真相便会得到丰厚酬赏的好处。无论如何，曾静和张照达成了协定，于 月 日从张 家所在的安仁县出发，一路沿山路往东南行去，并于月日抵达桂东。

曾静等二人在桂东没有找到曹秀才，但遇见另一位叫钟三极的当地士人，获得了有益的线索。据钟氏回忆，他于 1723 年夏末秋初遇见过一位行藏诡异之士，此人“圆头团面，十指尖尖，微须，口称姓王名澍，到彼地书堂中歇”。钟氏后来听得此人在邻近数县走动，拜访士人，参观藏书，不过此人所到之地只逗留一二日而已，并不长住。后来这个自称王澍者又回到桂东，并客死在本县大岭山的一个茶馆里。钟氏还说，他的一位族人钟湘一开始很有些欣赏此人的健谈，但后来对其是否真有学问

渐生疑心，不过最后还是钟湘出了一小笔钱，置了一口像样的棺木，在大岭山那个茶馆附近找了一块墓地，将此人安葬了。

桂东地方上的其他人见钟三极将往事告诉了来访的两人，也便纷纷开口。这些人中有士人也有百姓，有富户也有穷人，但他们都证实，确实有这么一位行藏奇异、蓄微须留指甲的人物，于1723年来本地四处走动，访问藏书，如果受邀也会吃上一顿饭，并闲聊京城掌故。如同钟氏一样，大多数人发现，此人虽然夸夸其谈，言涉学术文字，但从未亲手写过一字。不得已要书写时，也是由随行的那人代劳。

1730年6月中旬，曾静的追查又有了重大进展。他得知此冒牌王澍者曾于1723年5月20日那天，在耒阳县南下至永兴县的大路旁、两县交界处一座名叫“祝融庙”的佛寺落脚。传来这一消息的人还告诉曾静，他听说此人在庙里留有些许墨迹，佛寺至今仍保存着这些片言只语。这在时间上颇为吻合，因为仅仅在十一天之后的5月31日，一位自称王澍者来到了永兴县，拜访了曾静设于大路边的学馆。曾静是知道“祝融庙”的，并且也认识该小庙的住持弥增和尚。不过也仅此而已，两人并非知友，弥增一向享有专心佛教、远避俗务的清誉。为了免使弥增惊吓，曾静请了他的一位远房亲戚做中人，先去弥增处，一方面请他出示收藏的王

澍笔墨，另方面也让他安心，只要如此行事，决不致连累他。和尚被说服了，曾静这才前往“祝融庙”。只有在此时，除了无数的传闻逸事以及他个人的记忆之外，曾静才第一次手握真凭实据：冒牌王澍者确有其人。

王澍总共留下五张纸片。一张五十两的银票，是王澍赠送给弥增购置田地，以收取地租维持这个小庙的。银票落款日期是 1723 年夏，由耒阳县县令署名，湖南省布政司使担保，并签有“皇子允祐”字样。允祐是雍正的皇弟、圣祖康熙的皇七子。在银票的末两行和允祐的签名上面是一个字迹潦草的印章和一个划押。划押算是王澍的签字了。第二片纸是红色长幅，上面写有二十一个字：“北京皇城内正阳门上问荫棠府中书舍人即要通报。”这是经由正阳门进入紫禁城外城再入“荫棠府”的通行牌。荫棠两字与康熙之皇九子允禩同音。允禩是个富庶的皇子，当日曾联合众皇子竭力反对雍正登基。这张通行牌上也有皇七子允祐的署名，王澍的划押也同银票上的一样。弥增解释说，这牌子上的字是由这位陌生人口述，由随其旅行的那人写下的，也是王澍的赠礼，说万一和尚到京城去用得着。不过这位访客也没有忘了加一句说，他也知道住持和尚乃方外之人，长途跋涉远赴京师的可能性并不大。弥增又记起那访客喜谈宫廷内幕及早些年在陕西边地的行军生涯。此人尤其钦佩皇十四子允禵，

并夸口“十四爷”文武圣神，与他志同道合，大事全靠他两人把定。设没有他两人在朝，天下一日难安”。

剩下的三张纸显得零碎不全：一张看似考究的红色纸笺上写了几句咏自然之美的诗句，署名荫棠；另两张像是庙中贴纸的印花笺，各写了几个字，一张上是“笑傲烟霞”四字，一张上面是“见苦方知乐，见忙始爱闲”的联句。曾静知道，有关王澍到访祝融庙并留下笔墨之事断难隐瞒，便往县府衙门拜见耒阳县令，并写下密报作为官方存档。两天之后，耒阳县令查到随王澍走访各处并为其代书的那人的下落，立予逮捕。曾静本人则请他那位当初担任中人的远亲再赴佛寺，将弥增带往县衙候审。

至此，曾静的百日丧期将满，他必须赶赴长沙。7月14日，曾静抵达长沙后，于次日在西湖桥边的一处佛寺沐浴斋戒。16日，气象一新的曾静按照皇帝的谕令，向观风整俗使衙门报到。雍正只说令曾静协助办案，并没有详尽规定其职责。于是曾静就遵奉旨意，在最初几天里将过去两月中查访冒牌王澍下落的经过及结果细细写下，蝇头小字挤得满满当当，但尚可辨读。写完之后，曾静将长长的报告递交给湘抚赵弘恩及观风整俗使李徽。

毫无疑问，曾静追查冒牌王澍的努力颇富成效，确实立下了功劳。不过一旦将事情报告给官府，就没有他的事了。如今继续查案将是湘抚赵弘恩的

职责所在。不过当他忙于政务而无暇过问细节时，案子由湖南按察使具体经办。凡为曾静记录与王澍一案有过证词者，无论在耒阳还是在桂东，或任何地方，都被提到长沙细细讯问，刨根究底。慢慢地，与王澍接触过的证人的圈子更加扩大了。8月末，赵弘恩等觉得对案情已有充分掌握，可以向雍正上奏具闻，便奏呈在湖南一地王澍案的详情，连同曾静报告的原件，一同驰寄京城。

整个夏天，雍正都在为痛失其皇十三弟怡亲王允祥而哀伤。允祥是他登基以来最亲密的股肱大臣，当年他初登大位后朝廷内外纷争不已，政敌觊觎，图谋作乱，全赖允祥足可信任，委任大事。这段时期内皇上的谕旨充满了他对遽失允祥而产生的失落感，常常在圣旨中历数怡亲王对他的忠诚和支持。雍正也对失去怡亲王而对西部用兵产生的影响深表忧虑，因为雍正基本上依靠怡亲王调度西征事宜，尤其是粮草等后勤供应。尽管如此，一如往常对待曾静案有关的奏折，雍正仍抽出时间翻阅了湘抚的奏章及曾静的报告，并在折子上写下长篇朱批后，以廷寄发回湖南。雍正告诉湘抚，必须弄清事情的全部真相，湘抚等应将“可疑之处一一穷询。为此，雍正亲自将两份报告中令他有所怀疑之处逐一点出，令赵弘恩等廓清他提出的问题，再作具奏。

赵弘恩接获圣谕，不敢掉以轻心，再度提审一千人犯。第一个被重审的犯人便是当年替冒牌王澍

者代笔的曾盛任。曾盛任与曾静同姓，但并无亲戚关系。他交代说，他卷入冒牌王澍一案全属偶然。1723年他在耒阳县一户人家担任塾师时，突然有自称王澍者来访。此人告诉他的东家，正在寻找一个叫曾静的儒生。因为自己知道曾静的所在，所以自告奋勇提出带此人前往曾静的书馆。于是两人同行，并在去永兴县路上的祝融庙歇脚。住持和尚很好客，他们就多住了几天。根据王澍的口述，曾盛任一共写了五幅字条，权作送给和尚的礼物。王澍本人只用毛笔划过两个花押而已。

官府根据这一交代，找到将当年雇曾盛任为教席的那户人家，而后者也说曾盛任确实领了那来客去永兴县找曾静。不过雍正后来一读湘抚的奏报，却大起疑心。皇上质问：

一个在耒阳县好好地做着教席的人，何以会突然间抛弃自己的事务，说走就走，自愿带一个陌生人走这么遥远的路途？其中必有蹊跷。赵弘恩接到朱批便三度审讯曾盛任。这位当年的教席的交代于是有所不同：他之所以愿意和陌生来客一同前往永兴是因为妻子病重，他急于去请一位姓岳的郎中，而郎中就住在去曾静的书馆的路上。这回赵弘恩没有含糊，立即斥责其言荒唐：既然你急于为妻子治病，何以取到药后不径直回家，反而还往曾静家方向走？

曾盛任这回的答复总算比较令人信服。他说，



是那自称王澍的招他，而他也确实不满“教这三两银子的书”，所以一拍即合。而且此人许他富贵荣华，自然令他情愿随他去。赵弘恩又追问，何以对此许诺深信无疑？曾盛任称此人大谈与皇宫中关系，与圣祖皇帝的皇八子、皇九子的友情，随皇十四子在西边征战的经历，以及目前在此地的秘密使命。后来，他和弥增和尚都质疑过银票及其他文字上署名的真实性，王澍便乞求他们万万不得背叛他的宏伟大计，因为他几乎就要成功了，而此事关系至为重大，皇室前程安危在此一举。

曾盛任最后说，最近在一次乡约集会上听到宣讲《大义觉迷录》，才悟到以前听信的故事是多么荒唐。确实，他问过王澍何以随身竟不带行囊。王澍答说，身负秘密使命，为了免人怀疑，不便多携行李。事实上他的挑夫都在耒阳境内停泊的一艘船上等他呢。拜访过曾静之后，曾盛任随王澍又走了几处，然后就有一天，王澍说要和他分手了：“他说还要往安仁地方去，叫小的且回罢，他过些时再来找小的。过后再没见他来。小的也到过耒阳河里寻船，并没见船，小的也就止了念头，各务生理去了。至于他的底里，小的并不知道。”

对于弥增和尚所讲述当年之事时含糊其辞，雍正也大感不解。王澍送他银票时，弥增为何不追问以释疑心？难道他确实认为这样一份银票上该有皇子的签名及湖南布政使的担保吗？既然王澍有

如此身份，却不带一个侍从，难道他不感到有些不寻常？还有，他是否对王澍的衣着打扮起过疑心？在其最初的证词中，弥增称他从未真的相信过这个自称叫王澍的人，理由很简单：虽然此人言必称京师皇宫，但其言语明显带江南口音，而他自称是北方人。因此之故，他也并未真心想过要兑现银票，或者用它去买地。当承审官转述了皇上的疑问后，弥增承认，他并没有把王澍及所述故事完全不当一回事。事实上，他开始相信他所讲的一切，尤其是王澍和众皇子的关系，随皇十四子征西，及行李载于泊船之上等他这些话。在弥增看来，这些事情前后连贯，并无什么漏洞。弥增确实记得当初这个冒牌王澍来时的穿着：上身一件紫色短夹袄，外套一件蓝布袍，头戴一顶黑色毡帽，穿缎袜，蹬缎鞋。现在想来其打扮的确不伦不类，可是在当初看来，这一身穿着却与其谈吐相当吻合。至于王澍的脸型身相，弥增说与官府所示的画像极为相似。

赵弘恩质询当年与冒牌王澍有过交往的文人，其中大多数人所说不出乎已告诉曾静的那些话。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钟湘，即最后出钱安葬了冒牌王澍的桂东县文人。钟湘是个捐纳贡监，比当地其他文人如秀才等地位较高些，而其他人忘记的细节在他却是历历在目。钟湘解释道，他最初遇见这个王澍是1723年夏，穿着基本上如弥增所述，但戴的是宽边竹笠。王澍长脸，肤色略紫，微须，年

纪看似三十上下。此人两手空空，甚至连铺盖卷也没带一个。王澍自称是 1705 年入榜的举人（并非对其他人自称的进士），自诩精通艺文，颇以才学自负。为了表明其言不虚，王澍吟了一首诗，称乃其随意之作。可是钟湘只听了几句就将他识破了，因为那诗竟是他所认识的一位衡州府文人的作品！尽管如此，钟湘还是留这个陌生人住了一宿，次日送他上路，还赠了一百铜钱。至于那画像，则与他所见的王澍毫无相似之处，实在没有什么用处。

钟湘继续说，1724 年初春，清明节后不久，他听一位路人说，一个叫王澍的行客死在大岭山了。大岭山距钟湘家约 6,7 英里地，他毕竟不忍见此尸曝尸荒野，就凑了一小笔钱将其安葬了。他并未参加葬礼，后来也从未去过墓地。不过墓地就在路边，很容易见到的。钟湘替自己开脱说，若是他与王澍相善，总要留他在家，死在家也无妨，决不会将他送出门，致他倒毙途中。

赵弘恩细读证词后再审，结果钟湘也无例外地同前几个证人一样，承认上次所述有许多不实之处。他为何不说真话呢？因为说了实话就会惹上麻烦，官府一牵涉进来就可能让他失去辛苦得来的功名。在修正过的证词中，钟湘也描绘出桂东县地方上秀才及其他文人所构成的小圈子，这些人通过友情、联姻等互相间关系十分密切，往来和谈话从不间断。正是由于这种关系才产生了他遇着那冒牌王

澍的机缘：有一次他去拜访一位文友，此人还是钟家的姻亲，听他提到了王澍其人其事。钟湘还提到地方上私家藏书的重要性以及像他这样的年轻的捐纳贡监面对货真价实的儒士时的不安全感。而这种心态就令他成了冒牌王澍的下手对象。

钟湘现在承认，当时冒牌王澍同他讲了许多有关他与圣祖康熙之皇八子、皇十子和皇十四子之间密切关系的话，这些事情的重大干系与复杂背景只是在读了《大义觉迷录》之后才知道的。他说，冒牌王澍是闪烁其辞的那种人，一会儿说只求一件远避俗务的差使，一会儿又神秘地称在从事一桩惊天动地的大事。此外，他不止一次见过冒牌王澍，后者于 1724 年 4 月又来他府上拜访。那次冒牌王澍是由一个人陪着，看上去气色极差，似乎已染重病。他没有留他，差不多是赶他走的，只给了一点点礼物。有一天，就见那跟从来报说，其主人死于客途。他就凑了一点钱葬了那人。

赵弘恩对于钟湘透露的新线索极感兴趣，立即下令全力搜捕于 1724 年跟随冒牌王澍的那个人。他并下令桂东县衙找到冒牌王澍客死的那家大岭山茶馆、冒牌王澍的墓地并开棺验尸。于是桂东县衙派出大批衙役前往 10 多英里外的大岭山地区搜查、寻找。经过一番努力，搜索范围缩小到既沿大路又近坟场的几处茶馆，最后确定了他们要找的那家。

衙役们很快就发掘出那具白木棺。棺木一寸半厚，五尺半长，宽高各约一尺。棺内是一具约五尺高的尸骸：皮肉尽腐，只剩骷髅而已。已经无法据此确定死者生前的模样和年龄。但确实见有蓝色棉布长袍和曾是紫色短袄的残存碎片当然这些是无法作为证据的，因为棺木打开后，衣物见风即化，变成一堆黑黄的粉尘了，惟一剩下的只有光滑的牛角扣子。那头骨下枕着一双棉袜，紧紧地顶在棺木上的双脚上隐约可见一双缎鞋的残片。当地的地保们因未按律将此访客之死上报而受到斥责，但他们并不认错，辩解说：此人“实系患病身故，并非身死不明，所以不曾报的”。

要找到冒牌王澍当年的那个跟从花了更多时间。惟一的线索是见过那人的描绘：“有些胡子，不高不矮，江西声音，常在桂东一带走的。”推究下来，此人在冒牌王澍死后仍在当地走动。衙役们也终于将他捉拿，送至长沙巡抚衙署审问。那人向赵弘恩交待，自己姓罗名一奎，距湖南不远的江西信丰县人。罗一奎曾在赣西一带乡镇以贩盐谋生。他也记得初次遇上冒牌王澍的那个日子。这是很容易记的：雍正二年二月二日。那天他正在湖南边界处的龙泉县做生意，眼看快要下雪，他走进高慧村的一家杂货铺（以当地附近同名的寺庙命名），就见到有个行客正在从脚上脱下袜子换钱买食物。当时罗一奎看他是读书人模样，就趋前问此人根由。

那人自称叫王澍，江南人氏，要去湖南，但断了盘缠，不得已以袜易食。罗一奎看天将下雪，此人赤脚必会冻伤，便生了同情心，借了二十六个铜钱给他。两人于是攀谈起来，王澍说自己要图大事。王澍听说罗一奎是个行贩，便邀他同行，做个跟从，为他挑些行李，并许诺将来事成后付他酬劳，每天按三十个铜钱计算。

就这样开始了两人简短的同行生涯。白天，他俩沿着井冈山麓，穿过一个又一个小村庄，一路向湖南行去；晚上，他们在任何可以遮蔽风寒之处歇脚。王澍开始吐血，一日较一日衰弱。在回到桂东县境前的酃县边界处，他俩遇到一些考完地方科试、正在回乡途中的学生。其中几位见到染病在身的王澍，心生恻隐，给了几个铜钱作盘缠，但其他人则不予理睬。罗一奎身边还有一两银子、几文铜钱，王澍开口借了一些，说到了衡州就归还。但衡州仍然远在天边，而王澍却病到走不动了。罗一奎倾其囊中所有，为王澍雇了一座抬椅，勉强往钟湘家行去。1724年4月初，清明时分，他俩总算到了钟家。钟湘见王澍再度返回，就留了他俩一宿，供了一顿饭。但次日一早，钟湘就让他们快快上路，不要再逗留他家了。钟湘拿了一双布鞋给王澍，算是尽了地主之谊。于是两人又登上了跋涉之途，而王澍此时已力不能支了。在一条大路边，一家店铺的李姓主人收留他们住了几天，但毕竟怕王澍传病

给其家人，终于也将两人请出了店铺。

他们就是在这种窘境中经过大岭山的。在一家寺庙和茶馆附近，他们见到一个凉亭，于是又在那里歇了几天。有一天乌云蔽日，见着一场暴雨将临，两人不得不离开凉亭，躲进那家茶馆。王澍让罗一奎去一趟钟家，求他再施舍些路资。罗一奎别无他计，只得去叩钟家的门。结果，他带了钟湘给的一小袋米回到茶馆。罗一奎取了一些米为他的这位同伴做了热饭

这也是王澍的最后一餐。不久王澍开始大量呕血。

4月13日，王澍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茶馆主人可不愿有一具尸体留在他的店里，不得已，罗一奎又去求钟湘。钟湘于是拿出了一些钱，买了一副棺木、一小块墓地。因为并无余钱办置寿衣，罗一奎只得让死者穿着生前的衣服下葬。他将一双王澍未曾穿过的缎面鞋枕在死者头下。王澍本来有一顶黑色毡帽、一床紫色棉被，但已去无踪影，大概被茶馆拿去作押，抵销他俩在那里歇脚的费用了吧。罗一奎说完这长长的一段往事，又叹道：王澍至死仍看来年纪不过三十，让人觉得是个颇有教养的人。

承审官们不解地问，既然王澍是一个文人，那他随身带了些什么书籍笔墨呢？罗一奎答说，什么也没有，只一床破棉被而已。那么，何以好好的一个盐贩不做，却去跟从一个衣着破蔽，既无侍从又

无行囊，还会向自己的跟随借钱的人呢？罗一奎又回答，他见王澍看来极有教养，又告诉他将图大事，与这么些皇子结交，况且也许诺，如果病好得了的话，日后会回报他付出的一切的。就这样，一日挨一日，直到有大雨中茶馆那一天。承审官再追问，那么这个自称王澍的行客到底是谁？他究竟来自何方？罗一奎答道：“他临死时，小的也曾问他家住何处家里还有子弟没有。他只两眼流泪，竟不答应就死了。”

## 第十二章 不谐之音

湖南的官员们是在 1730 年 9 月 22 日第一次见到无名揭帖的。揭帖出现在长沙城内显眼之处，号召人们于下周的某一天集会，“共执曾静沉潭。湖南巡抚赵弘恩及观风整俗使李徽向雍正皇帝奏报了这一涉及曾静一案的新近进展，附了揭帖的抄本。当然，奏章中也说其严厉禁止此类聚集及暴动，且已采取措施保证曾静的安全。不过他们并未提到是否已在追查张贴揭帖之人，也未奏报是否已抓了人。相反，两位大臣却有些埋怨，说朝廷宽赦曾静的做法倒产生了相反的效果：“窃思曾静来楚，本欲令其宣扬圣德，化导愚民。今据该司等公禀前来，诚恐草野愚民共生义愤，无益人心，反滋事端。”雍正的答复也同样不多话，只寥寥数字朱批：“览。另有谕旨。”

皇上的回答如此谨慎，是不无道理的。来自湖



南，报告有匿名人鼓动湘民淹死曾静的这份奏折上达宫廷的途中，经大学士马尔赛之手，一封廷寄已由快驿南下，发往湖南巡抚衙门。马尔赛是一位资望颇深的满族大臣，自雍正的皇十三弟允祥去世后，皇上对他信赖有加，已经负起怡亲王在世时的许多机密重任。在这封廷寄中，雍正谕令湘抚给予曾静一千两银子以酬其近来协助查案之功。银子将从省库银中拨给，这样曾静得以“安立家产”。揣摩一下皇帝的心思，可以看出雍正所以要赠给曾静这一千两白银：因为就在这年夏天，曾静查到了冒牌王澍曾给弥增和尚一张面值五十两的银票，而这银票却是假的，连同上面的签字、省布政使的担保，无一不是伪造的。这张假银票已和曾静的密报一起送进宫廷，供雍正细察。如今，皇上亲自下旨由省衙门拨给曾静千两白银（还不只是银票）。当年，冒牌王澍估计他给予弥增的赠礼足以购置十亩地，用来维持寺庙生计。结果这只不过是一场空欢喜。而今皇上的慷慨礼物可是货真价实的，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在当时都可谓是一大笔财富：它足以购买百多亩良田，让曾静为亡母买下一块好风水的墓地，还够他在当地买下过一份绅士生活所需的任何物品。没有比这样鲜明的对比更能证实一厢情愿的空想与活生生的现实之际所存在的差别了。

10月末，赵弘恩将这一来自皇上的赏赐转告曾静。几天后，曾静写了长长的感恩折子，上禀皇

上，当地官府已作下安排，将省府库银子解往永兴县。但实际上，湘抚和观风整俗使私底下可不敢像曾静那样喜形于色。依他们的意思，在一个还有许多人想淹死曾静的省份，曾静要想“采此重资归家”，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巡抚着实动了一番脑筋：他将从各地拢集资金，暗中由粮道送入永兴县库银，然后由曾静陆续取用。同时，官府将密切留意曾静的举动，限制他到长沙城内活动。很显然，湖南的诸大臣对于这名悔悟的谋逆犯并不像其皇帝主人那样热心。事实上，湘抚等已在奏折中向雍正禀报，曾静的报告、书信中常有阿谀奉承之辞，用语偏颇，令其不安而必须提出纠正：他们可从未想到曾静称观风整俗使为“君父”而自称“臣子”。这种称呼是犯上不敬的，违背了“天无二日，人无二主”的基本准则。

事实清楚地表明，还有其他许多人与湖南的大臣们有同样的不安。在 1730 年夏秋两季里，由北京而大城市、州府县镇，直至地方学宫中每一个学生，无数《大义觉迷录》的刻印本正流传到中国社会的底层。雍正相信，《大义觉迷录》在学子聚集的学宫中将会产生最大的影响力。从追查王澍而被拘之证人的口中，人们已不难看到此书已经产生作用：那个替冒牌王澍代笔者就是因为听到乡约中宣讲的《大义觉迷录》而觉悟到，王澍所说的众皇子故事是何等荒唐。为冒牌王澍买了棺木、墓地的那

位钟湘也称是读了《大义觉迷录》才擦亮了眼睛。不过也有人认为该书充满危险因素，让人颜面无存，因而一读之下，十分震怒。这其中最有名的便是整个案件发轫之地的主人、陕川总督岳钟琪。岳钟琪在给皇上的奏折中丝毫没有隐抑他的怒气。他禀报说，他于1730年5月5日收到朝廷寄达的两本《大义觉迷录》，并立即抽空细读了此书。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岳钟琪在卷三中读到了张熙关于1728年10月在陕川总督府见到岳将军的叙述。不必说，白纸黑字所载那个生死攸关的一天里，总督同信使会面的情形与岳钟琪当日精心撰成的奏折极少相似之处。而张熙的说法却要传遍整个帝国，为天下学子所议论！

在张熙的口中，岳钟琪显得无能，缺乏诚意，拙于言辞，而毫无岳飞后人的风采。朝野上下终于得以一睹真面目的供词是这样说的：“是以于去岁戊申之秋，忽有犯师书，命上陕西总督岳钟琪。重犯无知，属在弟子，遂误听师命，冒然前往。及到投递后，岳公始而严审。重犯以受犯师曾静只去献议、不必告以姓名里居之命，且彼时无知之见，误信师说，尚固执为事关天经地义之所在，舍生可以取义，所以宁受三木之重刑，至晕绝不变。

“岳钟琪知重犯死不肯供，不能改移，旋即放夹，许重犯为好汉子，且慰之，谢之，以宾客礼待之，于逆书所言事理无不盛赞以为实。复告以其家

亦有《屈温（翁）山文集》，议论无不与逆书相合。既见重犯坚不告犯师姓名，乃呼天以示之信，及言当身所处之危险，甚至垂泪以示其诚；且具书具仪时告以必欲聘请曾静以辅己。命侄整装，却欲与重犯同行。

“更以长安县李知县扮作亲信之家人王大爷，时刻相陪伴，无一不极其机密而浑然无迹。以重犯当日之固执师说，虽死不肯摇夺者，卒使重犯实情毕露，然后县折奏闻。”

这段供词中最令岳钟琪愤怒的是，张熙称其家藏《屈温（翁）山文集》。当时，岳钟琪曾以此为诱饵，令张熙交待与以明遗民自居的吕留良等，或叛乱反清如吴三桂之辈的联系。而张熙的供词颠倒了事情的本末。屈温（翁）山在当时虽然称得上是一位杰出的文人，但无疑他一再显示出反叛性格。1640年代清军入关时，屈温（翁）山年未二十，为诸生，效忠于流亡中的明政权。明亡之后，他削发为僧，法号今种。至中年还俗，娶败于清军之明朝将领之女，及妻死，又投入吴三桂帐下效力。虽然屈温（翁）山一再反清，但因其诗文负有盛名，所以颇得清初著名文人的赞扬和保护，终于得以安享天年，卒于1696年，被誉为“岭南三大家”之一。

岳钟琪若是完全否定曾经与信使谈到过屈温（翁）山其人，显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而他之被

动在于，他以前的具折竟从未向皇上提过此事。如今之计，只有尽力辩白自己的无辜了。在向雍正递的密折中，岳钟琪禀报说，已细读《大义觉迷录》，其中有张熙所述屈温（翁）山事者，不得不为己作一辩解。张熙所叙当问情形并非属实。因张熙先称“闻得广东有屈温（翁）山者，诗文甚佳，亦未出仕，并云惜未见其文集。其时臣正在诱之使言，随亦云其著作大意仿佛与吕留良及尔师曾静之意略同。其实屈温（翁）山之为人如何并伊之诗篇文集，不惟臣从前并未寓目，抑且并未闻人说及。其书之有无邪说，无由而知。是时臣之所以信口称道者，盖欲探逆恶之实情，使之深信不疑，直言无隐也。”

雍正这次无意安抚这位将军。对于表白过多的臣下，雍正常常显得轻蔑而冷漠。他在岳将军的折子上的朱批便是如此：“此一语非卿提起，朕实未留意，而廷臣亦未有言及者。”即便还可能有种种其他原因大多与岳钟琪征西用兵的诸多失利有关就在这次奏折之后，往日战绩辉煌、年届四十四岁的将军开始日益顿挫。这年夏末，杭奕禄受命赴岳钟琪驻西部军帐中，向正在部署、督导对准噶尔用兵的岳将军传达谕旨，要他进京面圣。其后两年中，清军一再失利，各统兵将领纷纷互相讥弹、推诿责任。朝廷大臣奏劾岳钟琪既不能料敌于先，复不能歼敌于后，雍正乃将其召回京城，解去各项职务，削其公爵，降三等侯。岳钟琪后又遭奏劾，大学士

等议褫夺财产归公、处死，后经雍正裁定，改为监候待决也许部分原因是，雍正姑念岳钟琪当日明白奏告曾静谋逆案时的一片忠诚吧！

而屈明洪在《大义觉迷录》中竟读到与其休戚相关的文字，其震惊可谓更甚于岳钟琪了。屈明洪是屈温（翁）山尚存裔中最年长者。尽管父亲屡屡反清，他却在清朝努力求仕，当时正任广东沿海之惠来县的县学教谕一职。作为教谕，研读并讲解《大义觉迷录》是其职分所在，而正是在此时，他读到了岳钟琪与张熙讨论其先父诗文作品的那段文字。毫不奇怪，广东的其他官员也注意到了屈温山的名字赫然在列，屈明洪遂被带到广东巡抚衙门问话。屈明洪争辩说，其先父三十多年前去世时，他年尚幼龄，因而从未想过其父的诗文中含有反叛内容，但署理巡抚傅泰起初并不信他的辩解，相反却怀疑他蓄意隐藏屈温山著作，甚至意图将著作暗中运至其他地方出售。不过最后巡抚还是信了屈明洪是无辜的。尽管如此，屈明洪还是因此而遭殃：他被免去官职，全家流放至福建。受屈温山“岭南三大家”之一盛名所累的还有三大家中另外两位文人的后裔，官府将他们抓拿审讯，并彻查其藏书。不过这些名士之后最终总算未受处罚。至于到底有多少家庭因《大义觉迷录》一书的公开流传而受到各方压力或者牵连，我们不得而知。《大义觉迷录》中充斥了各式各样人物的名字，在其刻印之初，没有人

去想过这些散见各卷中，但常常和灾难性的文字串在一起的人名一旦公诸于世，会有怎样的后果。

一些普通百姓的命运也以某种方式因《大义觉迷录》而改变，这种情形堪可与因姓名直接在书中被暴露而引起的复杂反应相媲美。其中最为奇特的则是那些将自己与谋叛者串在一起的人物，这些人因为听到曾静一案的街谈巷议，甚至因为听了乡约聚集上所宣讲的《大义觉迷录》，就心生妄念，投机取巧。浙江总督李卫于 1730 年 7 月向雍正皇帝递的一份密折中记载的一个名叫陈诤的杭州人，就属于这类人物。陈诤算是半个文士（因为其功名是捐纳来的），但整天和地痞流氓混在一起，这其中包括他在当地书铺结识的一个驼背算命先生。那算命先生有时让陈诤做个帮手，每月付他三两银子。这个不上不下的文士后来常常吹嘘是张熙的朋友，曾陪他在浙江购买吕留良的著作；不久更添加了新的内容，自称是吕氏门生严鸿逵的亲近门下，常和其师讨论文学之精微，以此抬高自己。陈诤并向一班狐群狗党炫耀，多亏了他精明过人，才逃脱法网。官府将陈诤捉拿审问，但他不退反进，竟然宣称，曾静曾密访杭州，两人因而结识并相善。

尽管陈诤所透露其与曾静为友的说法毫无根据，这种夸耀本身必须认真对待，采取反制措施。陈诤向来以胡言乱语、招摇撞骗得名，所以绝不允许他再四处宣扬子虚乌有之事。于是，李卫下令革

去陈诤功名，判罚他戴重木枷后送回家中，由其父管束，平时不准出门一步。至于陈诤所作所为动机何在，李卫在奏章中认为，陈诤“好作不根之谈，造言生事，哄骗愚民，假作体面狂徒”。

陈诤明目张胆地狂言生事当然必须禁止，而这并不难办到。但也有其他一些不谐之音却只暗中传达，或者仅仅以放浪形骸的处世态度对《大义觉迷录》提出怀疑。不过一旦查明，则犯事者即使出身名门、背景显赫，也不能幸免刑处。而要论家世更显赫，很少有出昆山徐骏之右者。徐骏为康熙朝著名儒士、刑部尚书徐乾学之子。徐乾学与其弟元文、秉义并称“昆山三徐”，乾学、秉义为康熙赐进士及第，元文为顺治朝状元，而徐骏兄弟五人科考虽然不如其父辈那样名列前茅，却都进士榜上有名。徐骏本人是1713年殿试二甲第八名、赐进士出身，并入翰林院庶常馆学习。但几年之后，徐骏以无心学术而被遣回故里。因此，按当时提审徐骏的江苏巡抚尹继善1730年7月间的奏章，此人“为人狂妄，性情乖张，常离家游荡于洞庭山等处，吟咏啸傲，轻世肆志”。在尹继善看来，这种行为本身足以构成逮捕徐骏，搜查其藏书，发掘其与吕留良是否有书信瓜葛的理由。虽说官府并没有查到任何徐骏与吕留良或其家人的通信，却发现其本人诗作中有大逆不道的内容。尹继善将诗作原文呈送雍正御览，雍正裁定，徐骏按大不敬律处斩，著作、文稿



悉数焚毁。尹继善也查抄了其他一些江苏名门，意图让他们也获得如徐骏一样的下场。

雍正对于吕留良家族憎恶到如此程度，与他心怀恐惧也许不无关联。雍正曾密谕在其位已颇长久的浙江总督李卫，务必时刻将搜捕吕氏族人中或有逃脱者列为要务。1730年8月，李卫又接获雍正的特旨，尽其所能寻找所谓“吕氏孤儿，因为有关这一可能的吕氏遗族的谣言甚嚣尘上。雍正在密谕中说：“将逆恶吕留良子孙察访根究，勿使隐匿漏报，并不令逆贼寸骨得留人间。”及至9月，当李卫回复上奏时他确实颇有斩获，又捕捉了以前漏网的十八名吕氏家族后人中的男丁，其中包括吕留良的曾孙（此时，吕留良的一个在1728年搜查中被逮捕的孙子已死于狱中）。李卫上呈的名单中还列有嫁入吕氏家族为妻妾者，这样共有二十四个吕氏姻亲被牵涉进来。所有这些人员中，凡幼年因某种原因离家他居者尚不在内。李卫禀称他并不确定所谓“吕氏孤儿”所指为谁，不过确实发现一个长久以来的漏网之鱼。此人是吕留良的媳妇，姓曹，是吕留良长子、已故进士吕葆中的续弦。吕葆中于1708年突然逝世后，曹氏削发为尼，这次是在一个尼姑庵中发现现年六十八岁的曹氏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曹氏的名字并不在族谱上。

这样一个妇女看来并不构成什么威胁。不过雍正对于那些身怀异术或信仰之人越来越有不安的

感觉，同时又急于获得奇能异士的支持。在那个1730年夏秋的季节里，雍正患了一场大病，曾下了数道密谕征求怀有延年益寿之术者，不管其人属于何种宗教、哲学派别：“可留心访问，有内外科好医生与深达修养性命之人，或道士、或讲道之儒士俗家。”他在谕旨中并称，将善待这些精通医道奇术者，“厚赠以安其家”。同时又替心腹督抚消除顾虑：“不必预存疑难之怀，便荐送非人，朕亦不怪也。朕自有试用之道。”

雍邸旧人出身的李卫一向最擅揣摩皇上的心思。事实上他已经觅得这样一位武艺精深、擅长气功的大师，此人即是名叫贾士芳的京中白云观道士。李卫以请贾道长授其子射箭及武术为名，将他引入总督府。经过一番观察，李卫发现此人确实有刀枪不能伤其分毫的神功，就荐给了皇上。不过，雍正虽然暂得贾士芳调治，后来仍责其用心不正而将其诛杀。另一方面，雍正对于宫廷或朝臣中精通医理的官员，也破格提拔：如一位擢升为左都御史，另一位升迁为户部侍郎。此外，雍正为了求得康复健体，也确实不惜委屈九五之尊，受自称有道之士的摆弄，而其中不乏江湖术士，并无实学真才。那贾士芳曾对雍正“口诵经咒，并用以手按摩之术”，最终被砍了头。

很少有像岳钟琪那样对推荐“深达修养性命之人”持谨慎态度的。岳钟琪曾奉命查访一位隐居西

安、别号“鹿皮真人”的老道。岳钟琪虽然遵旨行事，但仍明白奏称此道人是号称身怀异术，实则不过一奇癩道士而已。不过雍正的追慕之心并未因此打消，次年又下密旨，令心腹大臣用心探访各种异士，无论是能观远窥暗者，还是日行百里者。

当雍正醉心于道医奇术之时，朝中大臣也在陆续酝酿对于吕留良一案的结案。1731年1月，在雍正皇帝下旨内外臣工提出吕氏处理建言之后的整整十八个月之后，六部九卿的审谳结果终于递入内廷。大臣们曾经对于雍正就此案所作的谕旨一再推诿、无言抗争，但如今却偃旗息鼓了。这份请求皇上圣裁的奏疏对于吕留良及所有涉案之人的判决无疑是严厉的事实上，当年一百四十八位大臣共同签署的奏章中，对于曾静的定罪之严厉也不过如此。当然，那份判决是被皇帝完全否定了。现在上呈皇上的议定包括：吕留良戮尸示众，其所遗家产没入官府；吕氏长子、已故进士吕葆中亦戮尸梟示；吕氏其余孙辈等依其与并犯关系之亲疏，按叛逆罪或处斩，或流放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通令全国，凡藏有吕氏著作、日记、手稿者，限一年之内上交官府，悉数焚毁。

令人惊讶的是，对于这样一份期待已久、完全符合当日谕旨圣意的议定结果，雍正竟未裁可。编纂、发行《大义觉迷录》一书的经验显然使雍正坚信，朝廷对于吕留良案的处理过程不仅要有散布于

全国的成千上万文人时参与，更要使数百万寒窗苦读、期望有朝一日学优而仕的书生投入其中，这样做将极有价值。因此，雍正并不急于同意大臣对吕氏等施以严刑峻法，相反，他在朱批中说：“朕思吕留良之罪，以前谕旨甚明。在天理国法，万无可宽。然天下至广，读书之人至多，或者千万人中尚有其人谓吕留良之罪不至于极典者。朕慎重刑罚，诛奸锄叛必合乎人心之大公，以昭与众弃之义。”雍正继续写道，就吕案而言，此种慎重就意味着复议诸臣所提尽毁其著作之议：若以焚毁之令下达而实不能厉行，则有令等于无令；若吕氏著作尽数被毁，则后世子孙何以知其滋生事端之因果，反将责朕及众臣措置失衡。

同样，吕留良对于圣祖康熙帝恶毒攻击虽然极其可憎，但如何依律量刑，却也无先例可循。因此，与其谕令各地以一年为限尽数焚毁吕氏著述，并将其戮尸梟示，无如下旨各省学政，征询各学宫学子对吕氏等人犯处置意见，并焚毁吕氏刊刻著述及手稿是否实际可行。诸学政须“稟公据实，作速取该生监等结状具奏。其有独抒己见者，令其自行具呈，该学政一并具呈，不可阻挠隐匿。俟具奏到日，再降谕旨。

虽说皇帝说得字字明白，斩钉截铁，事实上，生员若实话实说必将受到各方压力，而人们的真情实感总可以设法封杀。雍正皇帝对此洞察烛明。有

鉴于此，雍正是否真正相信他会听到不谐之音，我们只能加以猜度而已。而王朝的官僚确实有办法向皇上隐瞒真相。一个名叫齐周华的文人亲身体会了这一点，但付出了昂贵的代价。齐周华生于浙江书香名门，已经中了秀才。当他读到《大义觉迷录》中皇上对吕留良的驳斥及曾静的忏悔长文《归仁录》时，正在学宫中攻读儒籍，以备会试。

虽说齐周华与吕留良家族没有任何瓜葛，但他一向钦佩吕氏著述，尤其是其《四书讲义》。既然皇帝让人们直言无讳，他就写了一篇疏文认为应将吕氏的经籍注疏与其他文字区别，给予前者以褒奖。设若弥天重犯如曾静都可以因悔改而获皇上宽赦，何以就不能施恩慈于吕氏遗族及吕氏门徒严鸿逵和沈在宽呢？

齐周华在疏章中继续说，他不能相信曾静对清军入关细节知之不详的供称如若非审讯官员告知，他还真不知道明朝是为农民叛军所灭。以曾静对历史及经籍的熟稔，这种自称知的行为应细加审察才是。此外，要说道德败坏和犯上不臣，浙江士人岂能与湖南人相比：“未尝有向陕西总督投以叛逆之书也。”若得皇上之允，他愿意以性命为吕留良遗族中年轻后人的品行担保，务使彼等尽弃或许尚有的反朝廷思想，立誓为大清之臣民。

雍正的谕旨中对于有独抒己见者到底如何自行具呈之程序，并无明确说明。齐周华写毕疏章，

先交到其所在学宫天台县的教谕处。教谕不敢转呈，他又跋涉到省城杭州，要面见道员，因为道员有资格向皇上递密折。结果仍碰壁。这位秀才并不甘心，当了身边值钱物品，换到盘缠，竟直奔北京刑部衙门。刑部官员对齐周华的上疏也不会生同情心；如今新任刑部署理尚书就是审理曾静案背后的重要人物、围捕吕氏家族并搜获吕氏著述日记等罪证的前浙江总督李卫，而刑部侍郎则是曾任浙江观风整俗使一职、于追捕曾静等人之时就任湖南巡抚的王国栋。刑部拒绝受理秀才的辩疏，让他回浙江，将疏文递给浙江学政。因为既然皇帝在谕旨中说过由学政一并具呈此类疏文，其他人便不能自行其事，另辟上达渠道。于是齐秀才又回到浙江求见学政。这时，浙省学官不仅拒受疏文，并将秀才逮捕。历雍正一朝，齐周华被囚禁铁窗之内，惟可令其安慰的是，他在当地文人、生员中获得了直言敢谏的盛名。齐周华仅是我们所知的一例而已，至于有多少文人企图以不谐之音上达天听，却遭遇类似经历，则不得而知了。

雍正恐怕对齐秀才的挫折一无所知，不过他对于山西巡抚罗石麟于 1731 年 3 月 17 日奏折中所提到的更公开的抗辩事件，一定是非常清楚的。该事件于 3 月 11 日发生在距省府太原 300 英里外的夏镇。夏镇位于山西省南部群山深处，黄河以北。那天清晨，学宫看门人见秀才拜过孔子后不入学

堂，却聚在学宫西门处议论纷纷，似乎都在观看墙上的一张揭帖。那看门人并不认得上面写些什么，赶紧去禀告入值教谕高某。两人于是一起到西门察看究竟。

高教谕一望便知那是两则颇有意思的揭帖，一张是散文体，另一张是七言绝句。前者篇幅不短，差不多是一篇短文了，直接针对稍早特赦曾静及近来将吕留良开棺戮尸之议：曾静可杀不杀，吕晚村无罪坐罪，真古今一大恨事也！为此感愤，血脉贲张。吾心向往古之尚好公义诸圣贤，但求将此诗传扬海内。若获上达天聪，圣意或改；杀曾静，免吕氏一门于罪，则人人额首称庆矣！

文中所提之七言绝句是：

走狗狂惑不见烹，  
祥麟反作釜中羹。  
看彻世事浑如许，  
头发冲冠剑欲鸣。

“头发冲冠剑欲鸣”作为一种强烈复仇愿望，表现在古典文学中已有两千多年了，常常用以象征富有正义的刺客图谋刺杀暴君。

这两张大逆犯上的揭帖在墙上粘得牢牢的，但高教谕和看门人并不为其所难，知道如何将帖子完好地取下。事实上他俩似乎精于此道：先口中含醋，喷在揭帖上，等浆糊略为软化后，轻轻将帖子揭下抚平。有两个字因为粘得太紧而破损，高教谕便细

心地将字描到原诗上面。这两份证据连同有关整个事件的报告被立即送往巡抚衙门。

山西巡抚罗石麟在密折中禀报，至今尚未有线索指揭帖为何人所为。但他已令省衙门官吏配合当地通力追查作案党徒，尤其要确定是一个作案还是结党谋逆。雍正的朱批颇有讥讽之意：“若该省司教官悉心根究，自能查出。

果然不出皇帝所料。4月，经过对夏镇及邻近地区秀才、学子等逐一筛选，终于查出作揭帖者。作案者别非他人，竟是最初报告此作揭帖事件、将绝句中两残破字小心翼翼补于原作之上的教谕高振。罗石麟并确定此人乃单独作案，并无同党。不过，就某种程度而言，高振“但求将此诗传扬海内”策略算是成功了，虽然他为此而送了性命。其对于曾静、吕留良案处理的意见及愤慨都传到了皇帝那里，而未落得秀才齐周华一样的下场。在这一年内，向学子公开宣读并与之讨论《大义觉迷录》是身为教谕的高振所必须履行的职责全国的教官都像他一样在做这件事，而这些诗文揭帖则是高振个人企图扭转这种公开宣讲的私下努力了。

1731年3月，还有一件由曾、吕案子涉及的事件引起了雍正的注意。此案因福建西南山区汀州府上杭县一名叫范世杰的人投递词呈而发。范世杰才二十三岁，是一名童生还未通过童试取得秀才的资格，由叔父安排在当地官署作一名低级文员。藉



此机会，范世杰读到许多关于曾静案的材料，并生出一套自己的想法：他一面谴责曾静的谋逆，另一方面又颂扬皇帝授受之际“三兄有抚驭之才，欲遵父命，让弟居之，而圣君不敢自以为是，二揖三让，而后升堂践天子位焉”。福建观风整俗使刘师恕见了词呈，称范“忠爱之心可嘉”。

范世杰后来大概听说了皇帝征求独抒己见者自行具呈的谕旨，乃将原先的词呈修饰了一番，加了一些经典引文，待到福建学政戴瀚按考到汀州，自称是生员，又递给戴瀚，冀图邀功。但戴瀚将其拘禁审问，追查三兄让位之说从何而来，竟指何意？戴瀚会同督抚密审，但并未发现结党谋逆之嫌。鞫审结果上奏京城内廷，称范乃侥幸进身而造言生事，议请押交原籍严加管束，每逢朔望两日，令其宣读《大义觉迷录》，并不得再于乡间滋出事端。雍正于6月朱批裁可了福建疆吏所请。

1731年晚春，已掌握了相当证据的雍正相信，通过编印、宣读《大义觉迷录》及令各地文人生员独抒己见以廓清弥瘴的企图并未达到预计效果。由当年曾静一案引出的所有线索除了那四个往广东的旗人之外，几乎都在穷根追源之后获得了答案。连那冒牌王澍也已一命呜呼，不会再令人寝食难安了。然而事态不但未曾平息，反而从地跨山西到福建的各省传来喧嚣的不谐之音。人们并未因皇帝的敦促而对曾静起敬重之心，也不因皇帝的苦口婆心

或严词切责，而如其所想一般地憎恶吕留良。很显然，为了消除大小疑虑，正本清源，必须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在更高深的思想层次上展开新一轮的攻势，而这是皇帝本人力所不能及的，更不要说是曾静了。文人还得靠文人争取。

## 第十三章 揄扬圣谕

自从曾静和吕留良这两件互相纠缠的谋逆大案引起雍正注意以来，这位位居九五的皇帝尚未正式求助于其武库中最具威力的思想武器：每三年一届殿试中脱颖而出的两三百名全国文人中享有最高地位的进士。眼见宣讲《大义觉迷录》及动员各地学子踊跃参与、献策收效不彰，雍正遂于 1731 年暮春时节首次公开吁请这些饱学之士的襄助。皇帝将目光主要投在新近才高中金榜的进士身上，而其所采取的方法则是召集他们分别组成两支行动组：一队由约四十名儒士构成，将远赴帝国的西北边陲宣扬圣意，从事正本清源之使命；另一组只任命了四人，其任务是将吕留良的经籍注疏，尤其是《四书讲义》细细琢磨，洗垢去瘀，并进行系统性的批判。

雍正首先于 1731 年 4 月 26 日颁布谕旨，筹建儒士征西队伍。其实以文人为远赴各地、正本清源之主力的念头，雍正已持有了一段时间，或许是前一年 11 月间岳钟琪进京面圣时就产生了吧。当时的公开谕旨对岳钟琪褒奖称誉，尤其是其说服吐

鲁番维吾尔头目额敏率众归顺朝廷效力，深得雍正嘉赏。岳钟琪奏请将陕西境内新近剿平叛匪所获边地设为府县之议，雍正也予照准。因为此行将为依令驻守西边的军队提供新的屯田，也符合向西开拓帝国疆界的大计。不过 1731 年 1 月中旬岳钟琪自京返川陕大营时，场面颇有些冷落，并未获得对封疆大吏通常返职时皇上予以的嘉赏。岳钟琪返回军帐不久，雍正便命内阁传谕正在西边视事的杭奕禄回京议事。3 月底，雍正严谕斥责岳钟琪所奏处理准噶尔所控制西陲边疆之游牧部落民族及回民事务的军机事宜十六条大失所当，责问：卿向持稳守大营，步步为营策略，如今驼马为准噶尔所劫掠，乃因愧愤而一改初衷，倡言长驱直入敌据腹地。以今之势，何以能保必胜？因此，雍正对岳将军无疑是失去了信心：“朕详细批览，毫无一可采取之处，朕心深为忧烦。”

数月以来，雍正也一再表达对于驻守陕西之军队及军屯区内农民的关切。北京遭受地震灾害之后，雍正立即遣使往西部向驻军将领通报，要将官安慰八旗士卒，称虽然有房屋毁损，但人员损伤不过千万中之一二而已，且对毁坏屋舍者已予银两补偿，故无须为在京家属担心。1731 年初，一千驻藏之陕籍兵丁依令换防，使其得以回家访亲。

在 1731 年 3 月末的另一道谕旨中，雍正询及岳钟琪治辖之下的陕西、甘肃两省军需后勤的供应

问题。雍正指责说，此地一向是对准噶尔用兵的要害屯田之地，但情势不稳，当地官吏徘徊于冒失躁动与谨小慎微之间，无所作为。西边疆吏务须明白，其处事乃为下属之楷模，若其治理松懈，下属必定懒散而无所作为；若其严酷失当，则部属亦必依则而行，有失宽仁之心。雍正又具体针对军需采购中不公平政策，谕令所有用兵有关之物资、劳役必须照市价偿付，不得限定低价，强逼百姓出售物资。此外，务须机密行事，勿使不肖州县官吏闻得风声而乘机向朝廷过度索取。

在 1731 年 4 月 26 日所颁谕旨中，雍正向内阁传达了其筹建特别小组的圣意：朕欲于在京官员内拣选老成明白者数十员，命往陕西内地州县，办理宣谕化导之事。”雍正并说，将从三处挑选官员：入选翰林院任庶吉士的新进士（这些进士往往是殿试三甲进士中名列前茅者）；六部各属科中见习官吏；国子监六堂中在学之贡生、监生等。雍正并未明示各类候选官员的数目，只称由翰林院拣拔数人，六部属吏中一二十人，国子监二三十人。内阁负责与六部尚书侍郎或国子监祭酒等协调，简拔候选官员，然后入内廷陛见，由皇帝亲自考察。

至于 1731 年 5 月 31 日，特选宣谕的所有官吏皆已确定，雍正宣布带领这支宣谕队伍的三名大臣中第一位便是杭奕禄。杭奕禄于曾静案发后往湖南审案，又协调京师所有与曾、吕案有关调查；目

前刚从西边奉召回京，担任刑部侍郎，兼任满族镶红旗都统。第二位大臣是年届四十九岁的史贻直。史贻直是年进士，仕途顺达，如今身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及署理两江总督之要职。史贻直出身名门，学识卓越，是当年深获皇帝恩眷的年羹尧的同年，也是策划倒年并主审年案的主要人物。这些经历使他具备了丰富的经验，深知宫廷内部政治及朝廷对西边行政的关注。此外，在其两江总督的职务上，史贻直也显示出对于军队驻守及供应种种方面细节的了如指掌。第三位领队大臣是署内各府总管郑禅宝，其职责是专管宫廷财务与供应。此前他曾任盐道，不仅精通制盐技术与盐运，且擅长征税及银、铜价格之间的换算等金融事务。

在雍正面试后正式入选的四十多名北上宣谕官员中，除了上述三名大臣外，我们只有另外两名文人的名字和科考记录。不过从此两人不同的出身背景中，仍可看出，雍正属意在宣谕队伍中安排不同类型的官员。虽然他俩都是 1730 年新科进士，但其中一人是来自浙江的汉族儒士孙人龙，考绩优异浙江士人被允许参加该年科举考试，孙为殿试二甲第五名。另一人是满族色通额，此人正黄旗出身，几乎入选进士者之殿后（殿试三甲二百六十九名，而所有三甲进士总共二百九十六名）。两人都被选入翰林院庶吉士馆。显然，孙人龙凭其真才实学跻身其中，而色通额则得益于满汉蒙各族士人的配

额，因为身为满人而精通中国儒学经典是殊为难得的，故受到特殊关照。

雍正在宣布这支宣谕队伍的领队大臣的谕旨中，重申了往西北内地宣谕的诸多理由。有一些考量是历史上的原因：雍正归纳总结了四百五十年前蒙元政权以来一直存在的准噶尔扰边的问题，解释与准噶尔部的恩恩怨怨一直是处理中央政府与蒙藏族裔与地区之关系的重要部分。皇帝也详细列述了长年来因西部用兵而对陕西百姓在经济上及征调兵役方面所造成的搅扰。不过，雍正强调，令他最为困扰的是，这些本来完全可以解释明白的历史和经济现象却为流言恶语所扭曲，并导致了对他本人的恶毒攻击，“竟有怨朕而私相谤议者”。而这些误解和诽谤至今仍然猖獗，难以平息。

然后雍正点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流言诽谤之所以在西边广为传布，与多年来年羹尧的经营布置不为无因，西陲也是皇八子、皇十四子当年用心策划之地，所有这些人从未隐藏对于当今圣朝天子的不满。而他们又长年豢养了一批下人，如亲信、侍卫、邪恶道人、巫师等，以致西边民风堕丧，道德不彰。因此，目前选派士人往陕西、甘肃等地，以“开导训谕，觉悟愚蒙。倘合省民人等果能笃尊君亲上之议，消亢戾怨”，则“将见和气致祥，必邀上天默佑”。虽说雍正在这道谕旨中并未提及曾静或吕留良的姓名，但却可在皇帝的字字句句背后听到此两

逆案的回响。在对抗奕禄等三大臣的口谕中，皇帝再度强调宣讲《大义觉迷录》的重要性，并下旨为包括杭奕禄等在内的全部西行宣谕官员准备《大义觉迷录》一书。

6月8日，当西行宣谕出发事宜准备妥当后，皇上召杭奕禄、史贻直、郑禅宝等三人人养心殿陛见。雍正仔细将行程等事项检视一遍之后，乃面谕道，决定让张熙与宣谕使者一同西行。张熙虽已同其师曾静获得朝廷正式宽赦，却未曾南下返湘，而是在京候命，当时去向并未明了。雍正已通过内阁告知张熙准备西行事宜，随时听用。按照皇上的意思，张熙此番西行，包括回到两年半以前他拦轿递信，引发那许多逆案、逆犯的西安，将使三位大臣得以观察张熙对其谋逆大罪的悔过程度。史贻直的一名亲信侍卫将依令与张熙随行，寸步不离，并暗中记录其一路上的言行。

这支宣谕队于1731年6月离开北京。考虑到此行所赴地域十分广阔，杭奕禄等三大臣如今已获钦差身份将陕甘两省划分为三个地区，每区又分为五个小区，然后抽签决定由谁负责哪个地区。由于陕甘一带大多为人口稀少的山区或不毛之地，各集镇相距遥远，因而路途艰难。三个分队花了整整一个月之久才各自抵达第一个目的地。在向雍正呈具的一份奏折中，钦差郑禅宝描述了他所分到的地区：覆盖陕甘两省至西宁共五府，每府占地数百平

方英里，总共涵盖了五百五十四个州县镇。从一个小小区到另一个小区常常要走数周。每个钦差都得用上一个多月时间才能走完其分到的五个小区中的一个。

按照雍正的谕旨，三位钦差必须将圣意揄扬至每个基层角落，从集镇到山区中人烟稀少的乡村，皆不可遗漏。因此，钦差们又将其所属的随员分成小队，深入各府不同的州县角落。由于有效地采用了这一办法，当地众多的百姓直接听到来自京城的信息。京城官员告诫，为了对外用兵，朝廷需要百姓诚心服役以提供军需等；目前从事的西征战役缘于准噶尔扰边南侵而导致的中央与准噶尔之间的冲突；宣讲并讨论《大义觉迷录》展示宫廷派系斗争与流传于西部的种种悖逆恶语之间的关系，以及浩荡皇恩如何导致个别逆犯的悔悟转变。

身居京城的文人所经过的有些地区乃是荒山野岭，人迹罕至，甚至匪盗出没。这使钦差们将他们分遣下去时很有些担心。尽管如此，这些进士、新任官员们所到之处，都特意暂时建起一座“龙亭”，在这样一个吉祥庄严的气氛中大声宣讲皇上旨意及讲授《大义觉迷录》。三位宣谕钦差定期于约定的地点见面，一次是在西安，另一次在陕西西南的凤翔府，以交换从内廷或内阁及六部下达的指示。由于路途遥远，加上地形险峻，京城的消息往往要花三周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抵达西部边陲。



钦差之一的署内各府总管郑禅宝于 11 月末到达甘肃省府兰州，并向雍正皇帝递折报告宣谕详情。在从陕西边境走到兰州的十多天里，每日沿途经过许多乡镇，穿行于往前方输送军需物资的骡马车队之间，总有好奇的百姓伫立于途迎接他们。甘肃巡抚数周前已接获礼部来的公文，得知宣谕钦差等将赴兰州。虽然路上见到不少百姓聚集还送，但到了兰州，那欢迎场面仍令他吃惊：大约有一万多军民官兵百姓聚集，聆听他和其他进士们宣读皇上圣谕及讲授《大义觉迷录》。

一个月之后，郑禅宝抵达兰州西北 400 英里外的酒泉府。酒泉府位于长城尽头，人烟稀少，然而出乎意料，前来听宣讲的民众十分踊跃，人头济济，以致郑禅宝只得将其分为两批：第一批约一万人，于 11 月 23 日在当地小学广场，第二场于两天后在中学广场举行，听众多达两万人。这两次宣谕颇具声势，除了闻讯而来的百姓之外，更有甘肃署理总督及两名都察院官员专程前来听宣。宣谕照例在龙亭进行，焚香的馨香弥漫在 11 月的空气中，“风和日暖，虽居冬月，不啻阳春”。随行的两名翰林院庶吉士雄辩滔滔，历数准噶尔对大清边疆形成的威胁，揭发皇上的几个皇弟并其深藏的同谋年羹尧的种种不忠不臣之言行。此后，两名庶吉士深入更西处的边境，一方面检视军需西运的情况，另方面沿途宣讲，听众不仅有汉族军民，还包括丝

绸之路上的哈密、吐鲁番等民族的居民。1731年1月14日，郑禅宝及其随员会聚兰州，准备启程回京复命。

在此同时，雍正的谕旨正在西安等候三位钦差：着杭奕禄留驻西部行帐，监督用兵所需一应粮草等转运；擢升史贻直为兵部尚书，暂时留陕代行巡抚职责；郑禅宝率完成宣谕诸官员、进士等回京。雍正未指明张熙该何去何从。张熙一直由史贻直的亲信暗中监督，随史贻直及随员西行，走过了漫长路。于是史贻直上奏请示圣裁，张熙随其留在陕西，还是随郑禅宝返回京城？抑或径直遣回湖南？

史贻直在奏折中还回顾了皇上6月谕旨中在西行时察看张熙是否真心悔改的指令。按史尚书的判断，张熙的确有悔悟之心。史贻直询问了这位当年的信使1728年西安之行，及是否在西安与同谋有过暗中接触，却从未向承审官坦白。张熙的回答似乎是发乎内心的：“我以前虽到过陕西，住居不过十余日，投递逆书之后即羁禁在监，并无一人认识。若有平日认识之汇类，今日受皇上如此天恩，我虽狗彘不如之人，然具有良心，还敢不出首么？”他并称与曾静师徒关系已尽：“从前因曾静误听流言，我又误听曾静之言，遂致犯此弥天大罪。此外实未另有奸党。但曾静陷我于不义，使我身犯赤族之条，我如今每念皇上再造鸿恩，又想起家有老亲，实恨曾静误我。我与曾静师弟之义已绝。”史贻直

在引述张熙之言后又具奏，张熙不堪长途跋涉之苦，身体虚弱，时常患病，虽加以汤药，但收效不彰。

这份关于张熙西行途中表现及身体状况之奏折于该年3月送抵宫中。雍正的朱批十分简明：“张熙着他回原籍去，不可远离伊乡土。若有用他处，谕旨一到便来。着他在家候旨。可咨明该抚知之。着赵弘恩送交伊家去。钦此。”

张熙及护送其回归故里的数名官差于1732年5月初抵达长沙。三年之前，在接受岳钟琪冗长的审讯之后，张熙曾沿此路从西安被押往湖南。所谓天有不测风云，如今张熙被朝廷善待，而岳钟琪的功名前程乃至身家性命却危如累卵。据湘抚赵弘恩在上呈雍正的奏折中报告，张熙等至长沙后，赵弘恩硬派了他的一名师爷护送这名当年的谋逆犯回安仁县。除了两人有一队官卒护送以策安全外，还给足了路费。6月末，张熙回到安仁县之后，该县县令又接到明确指令，时时留意张熙，不可让他离乡，随时等候皇上下达旨意。不过，除了这点限制之外，张熙再次过上了普通百姓的日子，并藉以养生休息。

雍正是于1731年4月26日颁布谕旨，筹建以文人为主的征西宣谕队的。仅仅五天之后的5月1日，雍正即宣布创设另一支专事批驳吕留良儒学著述的四人小组。雍正在谕旨中表彰翰林院年轻

编修顾成天提出此一构想。顾成天是否听到西行宣谕的旨意之后才想到这个主意，已不得而知。不过，在其条奏中，顾成天称身为儒生，对朝廷负有道义之责任，须据实上闻；且坚信吕留良之注疏经籍虽然名重当时，而论其学之精湛亦未必名符其实，无懈可击。顾成天由朝廷名士大儒着力批驳吕氏最负声名之《四书讲义》讲起，该书有两种版本，吕氏于1683年死后，即由其友人从其笔记中搜罗编纂而成。“四书”《论语》、《孟子》、《大学》及《中庸》由宋代理学大儒朱熹汇编成书，是研习儒家学说并登堂入室的最基本讲义。而吕氏所注之《四书》编排适当、论辩精详，一向是无数科举学子的首选读本。虽然顾成天的条奏中并未提及，但实际上正是这本讲义以及吕氏编纂之进士科考文集，吸引了曾静去追求吕留良的遗著及学说。对于大多数赶赴考场的学子而言，吕留良是理学大师，其说代表了科举考试中解论“四书”的正宗。因此，一旦他们包括曾静在内不期发现吕氏著述中竟深藏反满思想，自然寝食不安了。

西行宣谕的文人中有不同类型者，如来自浙江的庶吉士和出身正黄旗的满洲进士。但被赋予批吕重任的儒士就不同了，悉数来自文人荟萃、人才辈出的江南富庶之地。其中两名是传统科举出身的当朝硕儒，分别为1724年和1730年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另两位的学术背景则显得不同寻常，可见

雍正特意在这支队伍中加入了曾亲身经历过这样或那样异端思想的文人。

承担批吕重任的第三人，亦即顾成天本人，是在前一年间以某种奇异的方式引起皇帝注意的。朝廷因怀疑某个皇室成员不忠而搜查了其文学著述，不期发现了顾成天的一首诗作，其中颇有怀旧及不满现实的情绪，这种不满在吕留良本人及其他浙江士人如令雍正愤怒不已的查嗣庭中间是很普遍的。不过在继之而来对于顾成天其余诗文的搜查中却发现，其作于圣祖康熙龙驭宾天之际的六首诗充满了对先帝的哀思和怀念。这些诗对康熙皇帝极其颂扬之意，将圣祖与中国远古传说中的三皇五帝相提并论。雍正一读之下，为顾成天的一片忠心感动，竟至于涕下，遂于 1730 年春发下御旨，令江苏巡抚将顾由江苏送至北京面圣。顾成天果然不同凡响，言语对答，颇见其学问卓越，令雍正龙心大悦。虽然当时殿试初考已经结束，雍正仍特准顾成天与其他考生一起参加后期的进士考试。结果，顾成天也不负圣望，考得二甲第十一名，入选翰林院为庶吉士（在这次殿试中另一名幸运者是来自广州的贡生，因为举发其上司供奉吕留良牌位有功，也奉特旨入京城参加殿试）。顾成天身为翰林院编修，视维护儒学正统为其职份所在，乃有上条奏议检讨吕氏著述之举。

批驳成员中最后一位乃是大名鼎鼎的儒者方

苞方望溪。方苞经历与众不同。他生于 1688 年，年长其他三位甚多。1706 年，方苞在京准备参加殿试时，突闻其母病故。根据当时的仪礼，方苞立即放弃了科考，赶回老家为母亲守孝。在其后的数年间，方苞以其精深的学问和思考赢得了士人们的敬重，享誉大江南北，直至 1713 年因卷入一场文字案而被捕下狱，并被判极刑。不过，方苞获得康熙皇帝的赦免，改判流刑至满洲极北之地。流放结束后，方苞得到任用，入值内廷南书房，成为康熙信任的枢臣。雍正登基后，方苞身任武英殿修书处总裁官，并极可能以此身份参与了《大义觉迷录》一书的编撰。方苞的名字也曾在李卫搜捕吕留良余党时浮现，因为车氏弟兄正是在方苞府中偶然遇见了名叫孙用克的文士，并雇佣其为车府塾师的。方苞之加盟使这支特别的批驳队伍顿见起色，增加了许多分量，也使曾以舞文弄墨而卷入政治风云的成员占到了参与批吕之文人的半数。该计划由两名枢机大臣负责，一位是大学士并兼任皇子弘历的太傅朱轼，另一位则是礼部侍郎。

四位儒士接获皇帝的钦命，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检阅吕留良儒学著述的使命之中，于 1732 年 1 月月完成了一份批吕初稿，而这时，远赴西边的宣谕钦差等还未回京呢。事实上，方苞等儒臣的工作从一开始便有些古怪，因为吕留良本人算是一个正统的理学家，其儒学著述多持论平正，就是有一些偏

激之说，也已为后来编辑其著作的学者删除了。因而，批吕诸儒真正能够拿来做文章的地方实在有限。例如，孔子论管仲一臣事二主的那段是批吕的重点。尽管吕留良或编辑其著述者并没有直接引述孔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这几句话，吕氏的评注显然是认为孔子亦持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一说的。由于历来对孔子本意众说纷纭，所以方苞等的策略是不碰孔子原话，而直接引述吕留良倾向性极为明显的评论，然后引经据典，在文中充斥历朝各代的忠臣事例。然而，凝聚同一民族的责任也许远远超越正史中一贯推崇的忠君道德，关于这样一个基本性的原则，肩负批吕使命的诸儒仍持不予触及的策略。

同样，方苞等在面对吕留良论注《孟子》之论分封制和均田制的文字时，也颇感棘手。吕氏连篇累牍地阐发这些古代政治制度的价值，讨论了在当代实行的可能性。谨奉御命的儒士们很清楚，这些源于孟子，为吕留良一再宣扬的观点深得曾静并许多当代儒者的支持，但也为雍正皇帝断然否定。于是，他们重施故伎，先是选引吕留良的一些评注，予以归纳，并引征了儒家经典，然后再对吕氏加以批判，认为僵硬地照搬已不适合当代中国现状的故例会导致混乱，对于社会的稳定是有百害而无一益。以这样的批判方式，方苞等苦思冥想所撰成的八卷共三百五十四页的长篇大论，与其说有力地驳

斥了吕留良的思想，不如说自相矛盾地向好奇的读者介绍了吕氏的种种观点。

雍正御览过这份初稿，对其钦命的四名儒臣颇为满意。他的朱批说，方苞等所作之批驳显示，吕留良乃“口谈圣贤之言，言行不符之小人”。不过雍正同时也称学者的研究印证了他早先不欲尽毁吕氏之书刊的谕旨：“若因其人可诛而谓其书宜毁，无论毁之未必能尽，即毁之而绝无留遗天下，后世更何所据以辨其，道学之真伪装乎？”

雍正并回溯当初翰林院编修顾成天上请驳斥吕留良著述的条陈中曾说，吕氏议论其实粗糙不精，亦非独创一格，因而诸儒士文人实不必奉其说若神明，不敢质疑。廷臣既知方苞等著文批驳吕留良《四书讲义》等刊刻著述，乃上奏疏请求雍正将此文刊印并发往全国学宫。雍正准可了这一奏请：

“朕以逆贼所犯者，朝廷之大法也；诸臣之所驳者，章句之末学也。朕为秉至公以执法，而于著书之为醇为疵，与驳书者或是或非，悉听天下之公论，后世之公评。朕皆置之不问也。”

刊刻印发《驳吕留良四书讲义》并未如当初对《大义觉迷录》那般紧张、迫切。以此之故，刻板更加精细，校对也一丝不苟，力图使儒臣的观点、论证更准确并具说服力，而关键的原文引述更得绝对不可出错，以免落人口实——因为批驳是写给“后世之读书者”看的，而吕氏著作早已广泛流传，任



何对吕留良及对他的批驳有兴趣的学子都会去查一下吕著原文的。此外，《驳吕留良四书讲义》全部由内廷修书处印刷、装订，将不再施行转由地方出资自行翻刻、翻印的老办法，以此避免粗制滥造、错误百出的情形——《大义觉迷录》后来各地转刻的版本出错甚多，有的印本与宫廷原版相差太大。

《驳吕留良四书讲义》将只作学宫藏书，而不分发到遍布中国的每一位士人。此书和先前的《大义觉迷录》的主要相似之处是发送的方法：先由吏部和兵部派驿卒将驳书送至各省督抚提镇，然后再由封疆大吏负责将书本运至其所辖的每个地方。

现存记录中最早收到该书的行文来自山东省孔夫子故乡曲阜附近的一位总兵官，他于1733年9月接获由山东布政使带来的八卷《驳吕留良四书讲义》。碰巧的是，该大员正是前署内各府总管郑禅宝，两年前赴陕甘宣谕的钦差之一。郑禅宝是于1732年初回京后由雍正放任外官的。直接印自内廷的驳书倒提醒了这位总兵，吕留良的学说在山东一省仍然影响极大，便密奏雍正，是否可请皇上特旨恩准山东督抚在本省依样翻刻印行，使各学宫中童生、生员等人手一册？雍正对此奏请显然不以为然，朱批之后发回具折之总兵，令其勿开此议，当满足于现有之书本。毫无疑问，任何有提出相似奏议的臣工都获得了同样谕示。

若非当初曾静以悖逆的眼光阐发吕留良的著

述，弄出这么一件大案，决不会有西行宣谕和儒臣批吕这类费时费力的功夫。但如今曾静已无份于这两件事，既未远赴西边宣讲，也未提供更多的证据来批判自身之谬误。自从去年受到沉潭威胁之后，官府以保护曾静人身安全的名义，实际上将他软禁在长沙了。他在观风整俗使衙门的差使也只在长沙附近，主要是参加每月朔望日地方官、绅衿和文士参加的乡约宣讲，而《大义觉迷录》同《圣谕广训》一样，列为标准教材。

这样一种生活令曾静感到不耐。他最为殷切的盼望是有机会花费雍正皇帝于1730年秋天赏给他的一千两银子。1731年夏，曾静向湖南观风整俗使府衙提出给予一年假期的请求，以便，他能“葬亲置产。起先没有人理睬他，但到了1731年7月1日，湖南巡抚态度有所软化，将这一陈请上奏朝廷。8月22日，雍正的批复到了湖南：允其所请，给假一年，期满须回长沙向观风整俗使报到。曾静在几天里就安排妥当回乡的一切事宜，9月22日，再次回到了永兴县。

如今，曾静有了足够的银子为母亲买一块上好的墓地。他也有了充分的财力去照顾他的两个儿子，其中年长的那位当年曾去张熙家中，说服他前往西安向岳钟琪递书，另一位尚幼，不过也已有过随祖母囚禁于北京炎热的监狱中的经历。安排下这些之后，曾静仍有一大笔钱用以购置良田，以及享

受由一个地主身份所带来的人们尊重的目光。

至于曾静到底买了什么样的财产，买于何时，查无所据。但我们至今仍能看见，在邻近安仁县的永兴县北部曾为清代富庶的地主所拥有宽敞屋舍，这些气派的屋舍与周围低矮、灰暗的乡村民居形成鲜明的对照。财主们屋舍的石筑三角形屋檐映衬于蓝天之下，曲线优美，从狭窄的山谷远远地可以望见高大的木雕大门和灰色的围墙。在这些富户的门前，穿过宽阔的打谷场是网布于水田之间的小道。这些小道多年来是乡村田界的标志，还铺了石板，农民们脚不沾泥就可以走到水井边和他们的土地边。多年以前，那个冒名王澍的神秘行客和替他代笔的随从曾盛任离开弥增和尚，留下那几张不值分文的银票后，从耒阳翻山越岭来到永兴时，一定曾将这些山村的景象尽收眼底。而堪舆陈帝西、中医陈象侯等在这一带走动谋生时，又何尝一日不见此光景呢！

那么，回乡的曾静此时此刻是否就站在这样一栋气派屋舍的门前呢？他怀里揣着的是皇帝的赏银，抬头便是油漆一新的屋檐，打谷场平展、洁净，静静地躺在他面前。曾静是否避开夏日刺目的阳光，穿过细雕精刻的门堂，进入昏暗而空阔屋舍中阴森逼人的祠堂呢？祠堂中早已置备下棺木，正悄然等候下一位主人。

以当年九月到第二年九月，曾静在家乡滞留了

整整一年。其中最后三个月，即夏天到初秋的这段时间里，张熙也获准回到了他的家乡，与永兴相邻的安仁县养病休息。曾静、张熙师徒上次见面是在1728年的夏天，那时两人还自由自在的，曾静给了门生两份手稿，就是他著述的《知新录》和《知己录》。在经过了这场巨大的变迁后，这两人是否还放着胆量，或者愿意走出家门，穿过俯瞰丰收在望田野的丛林中那熟悉的山道，去拜访昔日的师友呢？我们对此一无所知。

只有一件是有案可据的：曾静一年假期刚满，9月末，他就离开了永兴县，再次踏上前往省城的大路。湖南省观风整俗使李徽正在衙门等他复命，他不敢有所耽搁。

## 第十四章 尘埃未定

1733年1月27日，曾静回到长沙之后的三个月，雍正终于颁布御旨，对拖延已久的吕留良一案作出最终裁决。雍正回顾了两年前六部九卿关于吕案的议决。在此上呈内廷圣裁的议决中，臣工们奏请戮尸、灭族、毁书。当时，他认为各地的文人儒士都应获得发表意见的机会，乃御令全国进行讨论。如今，两年过去了，各地知书达礼之人无不见到《大义觉迷录》中对吕氏的暴露，以及对于其著述批驳，并有机会各抒己见，上达学政并朝廷。雍正信心满满地说，无人对吕氏大逆之罪的判定有任何异议。

雍正称，吕氏罪大恶极，人神共愤，无可赦免。依大清律，已故之吕留良及其长子吕葆中戮尸梟众；吕留良之第九子吕毅中（时已年届七十）接纳张熙，又馈赠其父反清遗文，着斩立决；坚称只见过张熙一面，与案犯毫无关系的吕留良之第四子此时已死于狱中，不追加刑责。吕氏其他子孙凡年十六岁以上者依律当斩，雍正悯其人数甚多，从宽免死，改判俱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吕留良著述不予销毁，但财产没官，充浙江工程费用。

五天之后，雍正又宣布对其他涉案在押人犯的定审裁决。吕留良之门徒严鸿逵日记中充满叛逆不实之词，又将其师及自己的反清思想灌输张熙，此时已死于狱中，依律戮尸示众。

严鸿逵之门徒沈在宽着斩立决。车鼎丰、车鼎贲兄弟及其塾师孙用克均应处斩，判斩监候，秋后议决。其余与案有涉者众人，依其犯罪轻重，或流放至各地服刑，或处以杖刑。惟严、沈学生朱霞山、张圣范等四人因年幼释放。

曾静应该在 2 月中旬读到登载这份宣判的邸抄的。此时的曾静，这位牵涉了这么许多人于案中的主犯，确实很是悠哉，本来就不重的责任眼下变得日益轻松。

，所以有许多闲余来读这样一份发自朝廷的公文。湖南官府上下没有人知道该拿他怎么办，就连皇帝也想不出什么新招了。一年前，雍正恩准曾静的假

期时，曾指示湖南的官员转告曾静，期满返长沙候命。但赵弘恩和李徽于 10 月末联名报告曾静已回衙门销假的密折递上去后，雍正正在折尾的朱批就只有一个字：“览。”

与此同时，湖南省观风整俗使李徽本人却显然碰到了极大的麻烦。事情的起因缘发于离长沙 55 英里外的平江县，时间亦是在那年的 10 月间。当地有一位和尚被发现死于路途，平江县令草草验看后，断为自杀。但有其他人发现死者身带五处伤口，便起了疑心。首先是管辖该县的知府，然后由湖南按察使重审该案。他们发现，死者伤口带有某种搏斗痕迹，显系他杀致死。于是，原案判被推翻。此时李徽十分突兀地插了一手，其原因不明，或许由于死者是个和尚，或许是因为平江县令是他的一个朋友。李徽坚称，依其观察，此案实属自杀案，最先质疑初审的知府应予纠劾。

如今悠闲自在的曾静眼看着他的顶头上司越来越深地卷入此案。按察使并不因李徽的铁口直断而退却，反而重申，仔细复查五处伤口，遍布全身不同部位，自杀之说，无法成立；知府复审确实有欠彻底，然并不足推翻其判断。李徽闻此言后勃然大怒，开始将矛头指向按察使本人，而后者亦不甘示弱，还以颜色。巡抚赵弘恩此刻忙于监督三年一度、数千生员参加的本省乡试，试图平息事态，责令按察使克制。然而李徽这方面却有恃无恐，更激

烈地攻击对方，并向赵弘恩递了弹劾按察使和知府的正式公文。赵弘恩至此不得不抽空仔细调阅案子的全部档案。他查看了李徽弹劾文中所提到的各个日期，立即发现，李徽在根本不可能复审全案情况下就遽下结论，正式具文告状。不过，既然是行了公文，就得依章程办事，记入官档，决不能因据事不足而私底里押下不发。赵弘恩就是想帮李徽也是力不从心了。

湘抚赵弘恩于是向雍正具折密奏此事的前因后果，并称对该观风整俗使处事能力疑心已久，但因其所处之事还不足以有扰圣心，故一向容忍，并未上奏。然而，李徽身为方面大员，处事草率，诬告同僚，其事不能不上奏皇帝天听：“李徽素性迂腐，事不谙练。因其天良未失，是以三年共事，去短取长，婉转感化。凡有受辱骂属员，臣俱谕其忍耐谦和，再三劝释。此人所共知者也。”如今李徽泄一己之私愤于大庭广众之下，则实无再忍之理。

雍正回应这份奏折的朱批中坦露了自己的想法。他在赵弘恩所奏“天良未失”四字旁批曰：“此人朕亦用其四字，之外实无一长可取。”雍正并说待其定意如何处置后，将另有谕旨。

朝廷任命的几位观风整俗使屡有问题，雍正对此最清楚不过了。大清朝的第一个观风整俗使之职是由于“浙江风俗浇漓，甚于他省”，令雍正大为愤怒而设置的。1726年11月，雍正谕令内大臣

建言定拟如何劝导、惩治浙江风俗，吏部等以为唐太宗贞观年间曾遣使巡行天下，号“观风使”，可为先例，援用于当朝。雍正采纳建言，略加改变，设置了观风整俗使一职，专门遣往其道德不彰极需感化之地。遗憾的是，前后数位观风整俗使无一使雍正十分满意者。汉军出身的进士王国栋是雍正任命的第一位观风整俗使，出使浙江，当时看来实属不二人选。可是王国栋实在有负圣恩，表现平平，几乎使皇帝的赞誉之词落空，而皇帝为表示信任，曾恩赐貂皮衣帽、暖手炉、珍稀药材，也未得到应得的回报。后来王国栋仍被拔擢为湖南巡抚，也无大作为，任职未久就被调回北京。当时曾静一案的追查正如火如荼，可见雍正对其多么不满。王国栋离开浙江之后，其继任更是不副圣望，1730年12月以平庸罢职。从此浙江观风整俗使一职一直虚位。同样令雍正失望的是福建观风整俗使刘师恕，此人久历官场，年轻时以清廉获得声名，但自1729年赴任之后，再无当年风采，但求无咎无誉。不久以病解职，从此无人继任此职。如今，李徽成为又一位失职的观风整俗使。李徽曾名列陕西乡试前茅，随后又于1723年殿试中进士，本来前程似锦，可现在留在湖南与其说可帮什么忙，还不如说是个负担，而湖南的麻烦已够多了，简直是一切麻烦的源头。雍正皇帝并未匆匆做出决定，直到1733年8月11日才由内阁发下明谕：李徽以肆言无忌、



为官不慎解去湖南省观风整俗使一职。同时，并无新职任命宣布。

在发给湖南巡抚赵弘恩、确定李徽去职消息的一封信寄中，雍正特别指示：曾静从此由巡抚署监管派事。可皇帝仍然没有规定曾静的确切职责。9月，赵弘恩复旨，具报已向曾静转述皇上圣谕，后者感戴万分，叩头谢恩。赵弘恩还很清楚地记得“沉潭曾静”的威胁，指令长沙知府“务好为照看，勿使愚民伤害”。至于曾静职分所在，“臣每于朔望宣讲圣谕，令其随往，俟有遣用之时，再行遣用。”同时，赵弘恩也注意到这位获赦的逆犯似乎有点捉襟见肘，大概在永兴家乡的一年里把皇上的大笔恩赏花得差不多了。所以，巡抚上奏道，他“又赏给养贍，使之宽裕得所矣”。雍正在奏折批了个“览”字，并无再多的朱批。

然而，由于发生了对赵弘恩本人影响甚巨的两件事，就在赵弘恩发出上述这份折子后的一二个月里，曾静本来就极轻微的责任肯定也消于无形。首先是雍正提拔赵出任江南总督这一极为重要的职务，然后是赵母突然去世。这意味着湘抚一方面要料理丧事，另一方面又要办理巡抚衙署交接事宜。赵弘恩的父亲死于1726年，因而实际上他才为亡父守孝期满。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赵弘恩称其父去世后，才携母来长沙同住，以尽孝心。其母年已七十有一，平时吃斋念佛，日日敬拜观音菩萨，身体

无恙。至 11 月 8 日，竟无疾而终，令他毫无防备，加之正在办理公务交接，准备前往江宁赴任的时刻，所以有些忙乱。

在过去的几年里，为了坚持让守孝服丧期间的大臣照常任事，或者至少缩短忧守孝的期限，尽早返职，雍正已经与几名重臣有过数次冲突。这种试图改变汉人传统礼仪的做法有违常理，雍正面临很大压力，引发臣下不满与对立，最后皇帝也不得不让步，改变了强加于人的态度。可以说，曾静丧母后获得从容假期服丧，也是受惠于雍正的这一变易吧，所以雍正对于赵弘恩所处的情形也予以了特别的考虑。皇帝下了谕旨，对赵母去世表示哀惜之意，同时同意赵弘恩留在长沙办理丧事，时间不限。何时料理私事完毕，再赴江宁就任。为了显示其体恤之心，雍正谕令赵的弟弟从军中请假，赶回长沙，扶棺北上安葬于满洲汉军墓地。新任湖南署理巡抚钟保不日将抵长沙履新，届时亦必能分担政务，令赵弘恩不致负担过重。钟保是一个年轻的满族官吏，同赵弘恩一样以孝著称。赵的父亲曾经获罪，律当斩，弘恩愿替父服刑因而应当理解赵的处境，让他有心思和时间为母尽孝。

确实，湖南巡抚衙署的交接十分顺利。赵弘恩上奏皇帝，对钟保表示满意：“署抚臣钟保到任之时，臣将湖南一切地方土俗民情、苗疆事宜详细说知。至封疆大吏，以保固地方元气为第一要务，琐

碎搜查，尤觉扰民，亦俱切切详言。臣见钟保为人正气和平，虚心询问。”雍正的朱批中称，钟保长于财政，亦确系为人平正者，唯其或有“洁己而不肯实心任事”的顾虑，所以赵弘恩宜时时留心观察，据实奏闻。

在其后的数月之中，忙于新职所赋之重任的赵弘恩和钟保分别向京师递了不少奏折。这些奏折中所提到的政务，从天气、收成、沿海及内地贸易、剿匪和征收内陆商税，到储粮系统、苗疆事务、驿递制度、盐运，几乎无所不有，但唯独没有提到曾静。雍正的朱批也再无提醒封疆大吏去留心、监管这位昔日朝廷重犯的字样。曾静及其谋逆案曾经占据了雍正君臣多少时间和精力，如今，一切似乎尘埃落定，曾静在他们的心中渐渐淡出，而更重要的国家大事正等待他们君臣去处理。看来，曾几何时人人得闻的要务已成为琐碎小事了，赵弘恩也告知钟保不必再为曾静个人的性命操心。

然而，曾静在长沙本地为人渐渐忘却并不意味着他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也被完全遗忘了。1734年，驻湘西苗疆的一个总兵上奏雍正说，在该驻守城中，每月朔望两次的宣讲上，《大义觉迷录》是必读的内容。该总兵还建议将宣讲与大清律中有关条文结合起来，以收彰显之效。其理由是，大清律卷目众多，共分1266部分，所以一般民众望而生畏，实不存窥探之意。如能以简明扼要的方式扼其有关

公共秩序方面的大要，诸如涉及习魔幻之术、私藏禁书、暗匿兵器等之律令，晓谕百姓，则民众自能了解日常生活中何者可行、何者为律法所不容。

对于新任署理湖北巡抚而言，宣讲《大义觉迷录》也有极大的价值。在具折密奏中，他告诉皇上，根据他自汉口渡江的亲身经历，在这样一个舟楫繁忙的水陆要道，宣讲《圣谕广训》及《大义觉迷录》对于感化每日由此经过的数千商人、行客，甚至宵小大恶之徒，极具实效。该抚常常亲自从武昌渡江至汉口督视宣谕，他相信，通过宣讲“，汉口街衢市巷之间莫不交相警勉”，所以打算今后每年春秋两季亲自宣讲。

不过曾静一案及《大义觉迷录》传布的结果也并不是官方文章所能全部涵盖的。实际上还是有一些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如今已被提拔至直隶总督一职的前浙江总督李卫对此有亲身体会，而且他的这个经历与当年岳钟琪之被牵涉进曾静谋逆案还真有几分相似。根据李卫的奏折，那是在1734年夏末，他在监督了属员考核之后回府衙的途中，一个在路边久候的男子突然趋前跪在大道当中，说有事上禀。李卫猜度此人有冤要诉，便命衙役将其带往军营盘问。一开始，承审官不知其所云为何，慢慢地才有些明白事情的究竟。此人姓孟名辅世，来自陕西，以行贩谋生，赡养老母。他在西部游荡多年，曾远至甘肃。至于如何到了直隶，则不甚明了。

他也曾数度拦路告状，但每次总落得被捕的下场。

李卫并未详述此人的诉请，只说其辞“有狂妄悖谬之语”引起李卫注意的是，此人的言行不能不令他想到数年前张熙投送逆书的情形以及曾静本人。他在折中写道：“孟辅世一案，臣察其语言意见，似系穷困无聊，到处上书，羡慕曾静之身犯弥天大罪，得以幸偷余生，暖衣饱食，遂思仿效。其所为者虽不至如曾静之狂吠逆乱至极，而凭空造谣，诽谤军机，罪大恶极，断无可容。”

从李卫的奏折看，孟辅世大概是因为听了《大义觉迷录》的宣讲，而且很可能就是从西路宣谕特使那里听闻之后，才生出拦路递书念头的。不过，雍正的朱批并未对孟辅世的效颦之举有何评论，仅指示应将人犯发回原籍处理，且须仔细押解（李卫在奏折中说过，孟犯曾在西部灌醉看守而伺机逃脱，雍正显然是对此而发）。

曾静案本身虽然渐渐淡出，但此类案件令人觉得其余绪未了，尘埃难定。几个月后的1734年9月，在西南偏远的云南省昆明也发生了新的案件，又与曾静案及其后的一连串事件有异曲同工之处。这回犯案者是三十九岁的算命先生兼药贩黄琳。黄琳才从位于西北的宁夏迁居昆明不久，其父是西路军中的一名兵卒。虽然其亲友等并未目睹任何犯罪迹象，他们都认为黄琳有些行为诡异。

黄琳在昆明散发他写的揭帖，因而为官府注

意。这份分为三节的简短揭帖，对于雍正严辞批驳的人物大加赞扬，于曾静悔过自新则不屑一顾，似乎就是为激怒皇帝而写的。揭帖第一节是为曾深获圣眷而后以叛逆、贪墨等罪赐死的年羹尧大抱不平。黄琳特别赞誉年在邻接西藏的青海立下的功勋，却突获罪谴，“朝廷令天下臣工禀公直言，而臣工未尝一言申执”。然后将话题转到吕留良：吕夫子“乃明末大贤，生于明，食明之水土，是必尊于明。宜进赠品秩，以勉天下为学之士”。对黄琳来说，吕留良与另一位被清廷抬举为喉舌的人物曾静之间有天壤之别：夫子论“本朝衣冠宜遵古制，不宜冠外冠、衣外衣”，实乃正本清源之宏旨。

云贵总督尹继善立刻密奏皇上这一案件。他具折称黄琳言辞狂悖，虽然彻查其寓室未见其他叛逆文字，严刑之下该犯亦未吐露新的阴谋，或与年羹尧结识，但其以卑微小人而于西南边陲重镇诋议国政，足可定死罪。尹继善请将黄琳尽速正法。雍正正在该折折尾裁可了这一奏请。

曾静案在中国的其他地方继续回响不绝。在四川，曾受雇于一位官员的仆役们举发其主人私藏吕留良的著述，并将该官员本人的文字交给官府，因为他们认为其中含有叛逆内容。而人文荟萃的江苏更为类似的揭发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书香名门之家藏图书和刻板都逃不过检查，亲友俱被提审逼供。不过，最为离奇的还是于 1735 年夏日在广西某一

小镇上发生的事件。那天，一个衣着破烂的人闯进了当地守备的衙门。

此人看上去与当地其他小贩没什么不同，一根扁担，两个箩筐。衙门守卫拦住他，质问其身份来历。此人声称负有特殊使命，曾与当今圣上的皇九弟、皇十弟秘密往来。官府于是将他拘捕严审。几天里，此人屡改姓名，一会儿说原籍山东，一会儿又改口湖南人氏。但他坚称时年五十二岁，因负秘密使命而假扮一个现挣现吃的流浪者这一点和当初的王澍倒是惊人地相似。对批览这一事件奏折的雍正而言，更令他惊奇于这种相类的是，此人也出示了一份官方的凭证证实其来历不凡。这张类似官防的文件是于1734年9月由北京刑、兵、吏三部签出的，授权持件人查访有关皇上之皇九弟、皇十弟一切事宜，又奉旨“领得皇上各条誊写黄《大义觉迷录》壹拾肆本。巡察各省文官以及武将，果有实心实力忠正报国者，定有加升；若有贪贿滥派之官，着令各省巡抚、布政：官则飞章参处，役则毙于杖下”。持件者尤将于广西境内调查皇十四弟允禔的活动。此人的头衔是朝廷钦差。其随身所携还有一首某村老者所撰、称颂其德行的短诗。

广西总兵霍升将此事奏报雍正，并附上所有搜获的罪证。他奏称，虽然此人闯营在先，数度改称姓名于后，又语涉天家，自称钦差，却绝非一狂癫之人，其中必有别情。为求稳妥，他已将案子发往

广西总督、巡抚，查究是否有类似持朝廷关防而策划阴谋之人于境内活动。雍正的朱批显示，皇帝对此案并不十分在意，但也不愿全然弃之不顾：“狂人也，然亦应严究。”

雍正从未在明发谕旨中透露过曾静当年追查王澍下落一事，但关于这个行踪无定的旅客的传闻也许早已从湘西传到了广西北部。这位自称钦差的行脚小贩即使与王澍没有直接的关系，却再次揭示出一种类似的方式：这些行走四方、行踪迷离的行者凭着精心杜撰的故事，有着无中生有、散播谎言的弥天本领，所以一个衣衫跛蔽的小贩也能够大言不惭地宣称，两只空箩筐中装的是皇上亲赐的《大义觉迷录》，能够引起忙于国家大事的君主和大臣们的注意。

即使广西的封疆大吏再度深入追查那位肩上一根扁担、两头悬着空箩筐的“钦差”的底细，雍正也永远不会在其奏折上批下朱笔谕旨了。就在雍正于广西总兵的密折上批了那八字谕旨的两个月之后，离五十七岁生辰只有两个月的大清皇帝突患重病，进药罔效，只两天的工夫，便龙驭上宾矣！

## 第十五章 补偏救弊

大清帝国的新皇帝乾隆登基时年方二十四岁。同其父世宗一样，乾隆在众皇子中排行第四。但不同的是，乾隆继位并未遇到任何挑战，也无人对于其继承大统的合法性提出疑问他没有其父皇当日



继位后所面对的诸多麻烦。虽然雍正生前未立太子，但满朝文武对于雍正的用心十分清楚，肱股大臣之间对皇上偏爱哪个皇子也向无异词。皇四子弘历已受封宝亲王，实有将授大宝的涵义了。雍正数年前即设置秘密立储的办法，将皇四子弘历名字写下，密封入锦匣内，藏于乾清宫正中“正大光明”匾后，谕令于其身后方可取出。10月7日，眼见上疾大渐，张廷玉、鄂尔泰并诸总理事务王大臣等取出锦匣请传位诏书，次日，雍正驾崩，皇四子弘历即帝位，依例明年改元为乾隆。尽管秘密立储程序不同寻常，然内外臣工对于皇四子继位并不意外。许多枢臣多年来一直认为乾隆自幼就是按照圣祖康熙和世宗雍正的心愿去抚养和教导的。

乾隆继位之初的六周内，集中精力于遵照礼制办理其皇考的丧事，以尽嗣子之孝的义务，并任命辅政大臣等以保证朝廷权力的平稳延续。为求稳定，乾隆并未罢免前朝留下的任何京城和外省的官员。凡遇到有待改变雍正朝政策之处，必定谨小慎微。但是，1735年11月21日，乾隆改变了作风，开始检讨前朝施政利弊。乾隆召集九卿等于乾清宫发布谕旨：他相信惩罚先皇诸悖逆皇弟，尤其是其皇八叔、九叔的所有后裔，致其永失皇室尊严、待遇，一如庶民，惩罚过重，并不符合皇考的心愿。乾隆谕令九卿议奏阿其那、塞思黑子孙回归宗室一事，且务须知无不言，不使任何意见有所疏忽，即

耗时持久亦无不可。

同一天，乾隆又下旨提到了另一件要事，不过皇上并未寻求群臣的议奏：

“曾静大逆不道，虽置之极典，不足以蔽其辜。乃我皇考圣度如天，曲加宽宥。夫曾静之罪不减于吕留良，而我皇考于吕留良则明正典刑，于曾静则屏弃法外者，以留良谤议及于皇祖，而曾静止及于圣躬也。今朕绍承大统，当遵皇考办理吕留良案之例，明正曾静之罪，诛叛逆之渠魁，泄臣民之公愤。”

乾隆继续颁谕道，逮捕曾静并其徒张熙之谕令即发湖南，着奉旨办理，不得有误。两犯归案之后，着押送京师议罪。逮捕一事，事关机密，各臣属务当尽力，不使消息有所走漏，违旨者绝无宽贷。曾、张两犯族人、后裔等一并锁拿，于当地关押候旨。乾隆命刑部倾其全力速办此案。

乾隆皇帝的这一谕旨由兵部快驿加急发往湖南。湖南巡抚钟保于12月10日中午收到圣旨。虽然钟保并未向朝廷报告过曾静近况，但他完全清楚在何处可以找到这位前朝被赦的逆犯他就住在与其目前的直属上司、长沙知府衙门邻近的地方。钟保立即命按察使知会长沙知府，一起前去逮捕曾静。两人迅速找到曾静，加以锁拿，并彻底搜查其住处，取走所有书本、手稿及其他随意涂写的文字。

一如当年拘捕一样，行动果断敏捷是防止曾、张族人获悉朝廷重审案件并逃脱的关键。就在拘捕

曾静的同一天，钟保派遣了两支小队前去围捕曾静家人及张熙及其亲属：一队由住在长沙的善化县知县带队，前往安仁县搜捕张熙，并指示安仁县衙逮捕并关押与张熙一应有关人等；另一队由驻长沙标千总率领南下永兴县，将曾静家人一网打尽。

一切按计划进行，湖南方面的拘捕行动毫无纰漏，进展顺利。张熙被立即押解至长沙，其余人等就近关押县大牢。12月29日，钟保向新主子具折奏告：在收到京师廷寄之后的第十九天，曾静及张熙在严密的守卫之下，已踏上北赴京城的漫漫长途。同时，钟保行文沿途各地方衙署，通报朝廷重犯及押送人员将经过其所辖地域，得随时准备增加警卫人手，确保安全。与人犯一同递解入京的还有在曾静住处搜到的一些物证，其中很可能包括悖逆的文字。当然，钟保在密折中也不失时机地向新皇帝表示，以其之见，曾、张所犯系弥天重罪，依律当斩，惟因先皇悲天悯人，才法外施恩，让他俩苟活至今，如今则是罪有应得了。

当湖南官员们进行拘捕时，皇帝也在准备会审逆犯事宜。既然该案将由刑部主持，那么乾隆就得有一个绝对信任的官员执掌刑部。11月22日，也即颁布逮捕、重审曾静谋逆案谕旨后的次日，乾隆发布其登基以来的第一项最重要的人事任命：工部尚书徐本调任刑部，原刑部尚书转任工部。一周之后，更拔擢徐本任军机大臣。

徐本杭州人氏，出身富裕人家，五十一岁。他可谓学而优则仕的典范：康熙末年（1718年）进士，翰林院编修，历任五省封疆大吏及京城诸部院。徐本早年曾在满族总督鄂尔泰麾下任职，被视为鄂尔泰的亲信。而大学士鄂尔泰本人又是雍正最信赖的枢臣，如今也是乾隆的辅政四大臣之一，最具权势的军机大臣。因此，正如鄂尔泰是推行乾隆新政策的最佳人选，徐本也被推到了执行乾隆、鄂尔泰君臣政策的位置上。

不管是乾隆本人还是鄂尔泰的主意，选调徐本这一步骤的理由很快就通过徐本本人的行动而明了了。在一份字斟句酌的奏章中，徐本以新任刑部尚书的身份提出了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逮捕曾静的谕旨已经下达，如今应该如何处理成千上万册充斥关于皇室流言蜚语及恶意诽谤的《大义觉迷录》了。《大义觉迷录》可是由先皇钦定并传布于全国各个角落的。

徐本首先介绍了《大义觉迷录》的成书过程，并回顾世宗宪皇帝下旨将其有关曾静吕留良案的旨意，质问曾静之口谕及后者之供答、忏悔等编成一书的历史。徐本着重指出此书流传之广泛、深入，上至省府，下至乡镇，每逢朔望乡约聚集，必宣读讲解。徐本称，虽然此书之中颇多悖逆诬蔑之词，先皇之意是以“逆贼狼嗥犬吠之词”而“使穷乡僻壤感发其忠爱之天良，共明夫尊亲之大义也”。

然而如今时势已不同当日。经过几年的宣谕，愚昧之人皆已发蒙，正所谓流言止于智者，而世宗宪皇帝宾天之后，人人所忆所怀，无非先皇之盛德仁慈之心。在这个时候，再以诬上谤言每日宣之于口，实非当日颁书之意，亦“实为天下臣民所不忍听闻者”。按照这个逻辑，徐本得出的结论是：“伏乞皇上特颁谕旨，将《大义觉迷录》于每月朔望停其讲解。”这正是乾隆所想得到的奏请。乾隆于12月2日向各地大臣发出一道简明的谕旨：“《大义觉迷录》着照尚书徐本所请，停其讲解。其颁发原书，着该督抚汇送礼部，候朕再降谕旨。”乾隆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所有原书由礼部回收后再予销毁。12月12日，徐本完成了处理《大义觉迷录》的关键部分，也封杀了任何可能出现的异议，遂解下军机大臣一职，专心去做刑部尚书了。因此，在曾静被押解到京城之前，他在先朝庇护下参与编纂的这本流行一时、由官方出版发行的著作就已经成为禁书，私藏《大义觉迷录》与隐匿吕留良的反清著述一样，属于灭门大罪。

曾静、张熙大约是在1736年1月20日前后被解到京师的。这是他俩第二次由湖南北上入京了，等待他们的是死亡一途。1729年时，虽然也被囚禁在大牢之内，曾静住得还颇像样，有灯、有笔墨，因为杭奕禄及其幕僚时时为他带来皇上的一个个问题，又有一大堆公文要看，而他又一直忙着

写他的回答，他的忏悔。而此时此刻，没有人再来问他什么了，也再没有人在乎他想些什么了。

囚禁曾静的监狱如今是一片死寂。但奇怪的是，还是有一线声音透过重重屏障传出，使我们得以猜度到当年曾静被囚的光景。而这个声音竟来自于方苞——担负批吕使命的儒臣中资望最深的那位文人。当年，在张熙那次致命的拜访之前，车氏弟兄就是在方府遇见儒生孙用克并聘其为西席的。方苞因为卷入一场文字案而在刑部大牢内度过了1712年至1713年间的大多数日日夜夜，并时时有被拖出斩首的危险。当他侥幸获赦，经过了许多年之后，方苞写下了这场九死一生的经历。如今的曾静就被关押在三十多年前方苞蹲过的同一监狱。根据方苞的记忆，一个监狱分成四排牢房，每个牢房都是同一样式：中间是一个长形的房间，供牢役居住，两头分别有窗以透光、通风。夹着这房间的两边便是牢房，既无亮光也无出气孔。每边牢中关押五十多个犯人，日夜锁成一排。一到晚上，大门便关死了，一早打开牢门，将夜间断气的犯人拖走。牢房于是稍稍空一些，但很快就有新犯人被关进去，顶上死囚的位置。如此周而复始。如果那犯人有有钱的家人亲戚肯到牢里，买通牢头，则犯人可以去除去手铐脚镣，关到另一间情况好些的房间去。

曾静、张熙就是被关在这样的牢房之中。不过他俩都不必在此种恶劣的状况中等待很久。复审和

议决迅速而秘密，1月31日，乾隆皇帝亲自颁下谕旨，宣布裁决。皇帝的措词冷酷而简要：“曾静、张熙悖乱凶顽，大逆不道。我皇考世宗宪皇帝圣度如天，以其谤议止于圣躬，贷其殊死，并有将来子孙不得追究诛戮之谕旨。然在皇考当日或可姑容，而在朕今日断难曲宥。前后办理虽有不同，而衷诸天理人情之至当，则未尝不一。况亿万臣民所切骨愤恨，欲速正典刑于今日者，朕又何能拂人心之公恶乎？曾静、张熙着照法司所拟，凌迟处死。”依律，曾静、张熙家族中十六岁以上男丁亦当诛，十六岁以下幼龄男子及妇孺遣至满洲宁古塔给披甲人终身为奴。一切家产俱没入官府。

对于曾静和张熙而言，此谕旨一发，便只等死期了。但据方苞的回忆，即使是这类凌迟处死的大案，钱还是用得上的：将刑之日，行刑者候于牢门之外，牢役则入内索取财物。被判斩首之死囚家属若以财物贿得行刑者，则可取回人头，让死者落个全尸入葬；若是判绞刑，钱财能使那根催命索干脆利落，绝不拖泥带水。即使是最严酷的凌迟处死，钱财也能让死者死得干脆：若你叫我满意，我便一刀刺在心口上，让你一命归天，否则就是手足尽去，却仍气息奄奄，受尽难忍之疼！

这次审判和裁决不再会出现宽赦的奇迹了。对于乾隆的裁断，也无任何官员表示任何异议。不过，倒是有人对此判决发出了欢呼之声，那人就是数年

前听到雍正号召文人对曾静不到一周就完成了确审定拟，奏请皇上圣裁了。吕留良案独抒己见的谕旨后，一再上书的浙江儒士齐周华。此时，齐周华仍被关在杭州大牢之中，有一位友人前来探监，将新皇帝重审曾静投书谋逆案，并将曾张二犯凌迟处死的消息告诉了这位书生。齐周华听后十分开心，在日记中写道：“不胜痛快！惜乎吕氏子孙犹未赐还也！”

前后经历近十年的曾静一案至此可谓尘埃落定了。年末，乾隆降旨，命徐本兼任礼部尚书。这一任命显然与礼部主持销毁《大义觉迷录》有关：乾隆再次选派其信赖的大臣来监督这一事宜，以便让曾静一吕留良案随着该书的灰飞烟灭而彻底结束。不过，尽管布置如此周密，仍然有极少数印本成为漏网之鱼，保存下来。一些学者认为《大义觉迷录》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千方百计私下藏匿；甚至清朝内务府库档也收藏了一本，以备将来参考之用。还有一些印本以秘密的途径流传到了日本，在那里，幕府的将军急于获得任何得以了解中国政府运作的著作。还有一些原著被胆大包天的书商暗中收藏，因为他们相信有朝一日，无论是由于人们的好奇心还是本身提供的历史资料，此书都将身价百倍。通过每逢朔望日的乡约宣讲，《大义觉迷录》的某些部分无疑早已浸入人们的记忆深处，难以磨灭，尔后又告诉后辈这样一个令人兴致盎然



的故事：从前，有这样一个皇帝，为了身后的名声而汲汲于清流言、辨是非。这个故事口耳相传，代代不息，但许多部分也随着人们的意愿而改头换面：

其中最为世人津津乐道的就是吕留良的一个孙女暗杀雍正的传说，称吕四娘为复仇而拜高人为师，学成绝顶功夫，冒名进宫成为侍婢，趁机行刺，令雍正身首异处。

今天，我们不妨说雍正、乾隆皇帝父子都下了一着错棋。一个皇帝以为，只要将所有的诽谤公之于天下，就能澄清事实，谣言自灭，而子孙后代亦将因其坦荡诚实而尊崇他的英名。可惜，他的子民只记住了流言蜚语，而早已将这皇帝的恳切自辩忘得干干净净。另一个皇帝相信，只要将《大义觉迷录》荡涤殆尽销毁，就能让父皇英灵以此安息。然而，天下芸芸众生就是怀疑毁书的惟一理由是其中透露了太多的真相。

就是因为这样一本书，其中这么多故事，以及这本书引发的这么多线索，才有那众生相在我们眼前一一呈现：身穿紫色夹袄、头戴黑毡帽的冒牌进士王澍，谎话连篇的堪輿陈帝西，衡州同年桥畔的大胡子算命老道，义愤填膺的师爷唐孙镐，流戍南方烟瘴之地、沿途散布流言的太监，行旅江上窃窃私语的商客，听得太多、又散发揭帖为年羹尧和吕留良鸣不平的昆明药贩黄琳，四个在凉亭歇脚，

说官话、穿马褂的旗人官爷，衣着破烂、一根扁担两个箩筐独闯军营的“钦差大人”，以及许许多多其他人物，有的是名声显赫战将枢臣，有的则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面对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场面，雍正皇帝挽救其一生英名的努力恐怕得付之东流了，而欲以禁书、毁书的手段杜绝皇室内幕一再曝光的乾隆皇帝也终究禁绝不了街头巷议的口耳相传。

这样一场堂堂大清帝国的皇帝和僻居山村的秀才之间的恩怨，一则牵涉进无数人物角色的公案，全是缘于湘西安仁县的大路边有一个学馆，一个不起眼的教书先生，缘于这个教书先生差了他的门生充当信使，揣着一封将掀起狂天波澜的谋逆书信，踏上漫漫北上之路而发端的。

